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与香港友人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陈毅在外交部

萧克将军与《炎黄春秋》

八路军向国民政府领饷记

我们获取第四次「围剿」计划

2001/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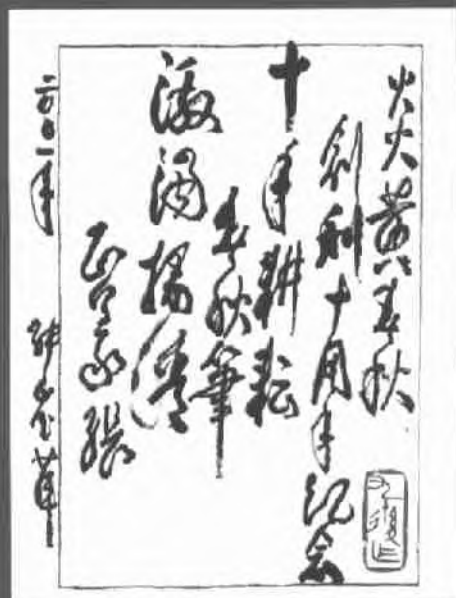
总第 113 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庆祝《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庆祝会，7月21日在北京举行。详细报道见本刊第17页。新闻图片及部分老领导题词载本刊封二、封三。上图为大会主席台，在一排就座的有（从左至右）方实、杜导正、范敬宜、李锐、杜润生、费孝通、李之继、李昭、李宝光、冯桓



右上，习仲勋题词：

《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上，张爱萍题词：

十年耕耘春秋笔，
激浊扬清正气长。

右，任建新题词：

炎黄子孙共同努力，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炎黄春秋》
办得不错
已仲勋
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贺《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炎黄子孙共同努力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二〇〇一年二月
任建新

炎黄春秋

历 谈 录

- 2 与香港友人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吴 江

闼 星 篇

- 7 陈毅在外交部
——纪念陈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柯 华
12 宋庆龄与《中国建设》..... 张 彦

本 刊 特 稿

- 14 萧克将军与《炎黄春秋》..... 洛 松
17 炎黄春秋杂志社集会庆祝创刊十周年..... 本刊记者

人 海 浪

- 18 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在西路军..... 谢景星
21 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 无 文
28 清末王爷载涛新生记..... 冯彩章 李葆定
30 献“常林钻石”姑娘的曲折人生..... 石为开

学 友 情

- 33 继承欧远方遗志..... 李 锐

文 萃 园

- 34 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人生轨迹..... 尹 骐
39 白族文豪赵藩..... 刘冠群
42 《毛泽东自传》的译者汪衡..... 沈仁干

选 录 录

- 44 在美军监狱的中共党支部..... 张泽石
46 八路军向国民政府领饷记..... 窦孝鹏
52 迥异的家庭 奇特的爱情 悲惨的结局
——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俞秀松及其夫人..... 高凤英
56 二战初为犹太人开绿灯的中国外交官
..... 伍法祐 伍法同

亲 历 记

- 59 我们潜入河南获取第四次“围剿”计划..... 李 云
62 目击中国远征军救援英国盟军..... 王楚英

群 言 堂

- 68 写好自己的“起居注”..... 刘恩启
69 副部长与院士..... 李 普
79 琐议“父母官”..... 马 悦

古 镜 台

- 70 列强畏忌的清末刚烈名臣李秉衡..... 魏文华
74 林则徐还是个抗洪英雄..... 刘葵华
76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 李 凌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凌 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杨继绳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深圳市亚大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4.80 元

与香港友人谈 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 吴 江

吴江同志的《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一书,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就其认识,在书中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龙去脉;二是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该书汇集了作者的13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今天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一位香港友人的谈话》,内分11个部分,最后两部分的小标题是:《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及其社会主义事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搞好社会主义》。本刊征得作者同意,将这两部分冠以《与香港友人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的总题发表,以飨读者。文中“甲”为友人,“乙”为吴江同志。

——编者

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及其社会主义事功

甲:我接触国内理论界不多,但也翻阅一些刊物杂志,给我的印象是,内地在理论上还是四平八稳,不敢进行认真的反思,不敢重新审视那些写在书本上的条条,有人甚至还没有放下教条主义的棍子。自从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以来,理论界似乎仍然滞后。奉命写作者多,或者竞相构建邓小平理论体系,但真正有研究的论著很少。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乙:原因不容易说清,大概是因为要改变过去那种教条式的理论思维定势很难吧。我想,刚才我们所谈的,可能对于理解邓小平的理论有些帮助。因为在今天想要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或者说重振马克思主义,只有严格的自我反思、自我创新、自我发展一途,

并且从历史上追根究底,弄清是非功过,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也唯有如此,才能懂得什么是邓小平的理论思想及其价值。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和他的社会主义事功了。“文革”后,邓小平面临着空前艰巨的任务:极左思潮根深蒂固,“文革”的残余势力到处存在,“文革”后的党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实际上要从头做起,而苏联当时对中国的改革又采取反对态度。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改革的任务是难以启动的。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开创一个新时代。

甲:邓小平并没有留下专门的理论著作,像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那样,他本人好像也没有这种打算。邓逝世后,世界上几乎异口同声地称他为当代伟大的政治家,他对社会主义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很少有人谈他在理论上的建树,香港也一样。内地一般将邓小平的理论观点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理论”，围绕着这个提法做文章。现在官方又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并将邓小平的理论称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香港人只知道邓小平有一个“猫论”。

乙：我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法并没有能够概括邓小平在理论政策上提出的新东西，但这个提法是邓小平同志自己认可的，本意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应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与政策，走自己的路。我个人认为，即使照此本意，这个提法应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比较全面些。因为邓小平本人着重于政策与实际事功。他将“实事求是”四字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精义，也就是最高原则。他并不空谈理论，不受条条的束缚（有人宣传邓小平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说邓小平倒是着意打破旧的教条主义理论体系）。他对于当时来自苏联的反对声音也置之不理，他的理论观点常通过他的政策表述和简单的论断表示出来。在邓小平同志那里，理论与政策（也就是理论与实际）浑然一体，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特色。

举两个例子来说，邓小平同志提出当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一提法奠定了中国内外政策的基础（例如，中国宣布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军备竞赛），在理论上（依我看来）却要胜地过整部《帝国主义论》。我说胜过，当然是在一定意义上说的，是指《帝国主义论》虽是煌煌理论巨著，但邓小平只用简单一句话，并没有附加多少论证，就正确点明了当前时代的特征及世界形势的特点，并且不声不响地修正了《帝国主义论》用千言万语阐明的那个至今尚被一部分“左”倾空想共产主义者奉为“经典”的所谓“帝国主义时代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代”的论断，意义重大。邓小平的话当然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但这句话无疑是真理，它对建立当前世界新秩序和对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有深远的意义。第二，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各方评论很多，苏联的理论家反对，中

国的“左”派反对，他们像你所说的那样又举起了教条主义的棍子，称之为“散布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然而一般头脑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则表示赞同，并且评价很高。邓小平提出这一问题以及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答复——包括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种种措施，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位，是将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引上了新的轨道，也就是对于在原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创造社会主义新因素”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十月革命以来，包括列宁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获得政权就是获得社会主义，或者认为在这些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并非难事，只要经过很短的时间，十几年，数十年，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但是，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空想、幻想。列宁最后也承认了这一点。

邓小平同意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旨在说明：获得政权并获得社会主义称号并不等于获得了真正的合格的社会主义，从这里起步到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像中国，从现在算起，至少需要百年以上的准备时间，包括整个21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还要不走大的弯路。所以我曾为此打了一个比方，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好比是社会主义大学的预科，修完这个预科才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2期拙作《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很长的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成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将和其他非社会成分并存。这时候，在政治上将认真补上民主革命的课，以创造自由、公平、民主的社会生活；在经济上则将长期处于商品市场经济阶段，这种市场经济虽然总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并且是和国家的宏观调控相结合的。但是，必须容纳其他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如此等等。因此可以说，这些理论的提出和相应的政策的推行，实际上使社会主义进入了它历史上的第三个阶段。

你提到重建意识形态的问题，历史上任何生机勃勃的革命性学说，年久必生弊端，甚至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被弄得面目全非。1978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可看作是重建意识形态的开始。邓小平为重建工作作出了贡献。但是,真理是一个过程。最优秀的人(包括马克思在内)也只能在其中的某一方面作出某种一定的贡献。时代不同了,马克思时代还是欧洲工业化初期,现在已是电脑资讯时代了。新时代,新问题,新知识,必当有新人来承担并逐步推进这项工作,并且其中还要不断地修正错误。

甲:你的这番宏论使我对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和事功顿开视野。如此看来,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有重大历史背景的,是科学地务实地回答了(或扭转了)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照有的理论家的说法,这就是向一直猖獗并制造无穷祸害的“左”倾空想共产主义势力提出挑战。邓小平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记得,他的反面回答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搞僵化的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闭关锁国不是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真正的自力更生,等等。而他的正面回答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此就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任务摆在首位,使人民生活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等。我想知道的是,邓小平有没有为

社会主义下过定义,国内有人写文章说邓小平为社会主义下了新的定义。

乙:据我所知,没有。估计邓小平不会这样做。恩格斯说过,一切定义只有微小的价值。下定义有时等于自缚手足,或者只是提供某种僵化教条的公式,于实践不利。邓小平只是指出社会主义(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理想目标。我还要请你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对历史上社会主义者长期面对的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涵盖

面很广,这里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邓小平的回答表现出惊人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

甲:这正是教条主义所忌讳的一个问题。你几次提到这个问题,这里的困难是否在于容易混淆两者的界限?姓“社”姓“资”的争论就是这样引起的吧?这里是不是也真的包含着某种风险?

乙:马克思的解放“新社会因素”,是从资本主义的胎胞中解放出来,是在资本主义胎胞中孕育成熟的。列宁的“创造新社会因素”也不是凭空创造的,更不是用“土法”创造出来的,这里首先要继承、吸收人类社会(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那些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形式及其先进管理经验以及先进科学技术等。而这又必须依靠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排除自然经济遗留下来的一切旧因素。这里我想说明一点:商品市场经济是在自然经济之后的一个必经的自然发展阶段,并不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创造了商品市场经济,而是西方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了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将商品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看成一个东西(虽然资本主义是将商品市场经济大大地推进了),商品市场经济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从苏联开始,公有制一直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这一形式如果不在政治上、经济上作出严格限制并正确加以规范,往往容易轻而易举地蜕化为特权或特权阶层所有制,阻止向社会所有制过渡。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企分开,有可能摸索出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某种形式、途径——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为摆脱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旧模式所提供的一种可能的演变途径,是值得经济学家研究的。

我们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吸引大量外资、先进技术到国内来,开办合资企业、三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等,大胆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而又与经济霸权势力作斗争,并在国内一些特别地区(港、澳、台)长期采取“一国两制”政策,即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个别地区可以长期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两种制度在政治上和平共处,在经济上收互补互助之效。总之,举凡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好东西,无论市场、计算机、股份制、跨国公司等等,只要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助于提高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的,都应当拿过来,经过吸收与改造,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所用。这样做自然也会有某种风险,但比起闭关锁国以及“左”倾共产主义造成的风险来要小得多。

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 搞好社会主义

甲:“一国两制”问题,我们过去从政治方面着眼,而未从经济方面着眼。像你所说的,“一国两制”的前提固然首先在政治上、主权上,但同时也在经济上。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原先就有紧密的关系,实现“一国两制”后,香港的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经济无疑将会对祖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同时,这样做也可以消除世界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疑虑(像列宁时候那样),以便吸引大量外资注入国内,中国的经济也容易进入国际市场。所以“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处理现代社会主义

与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一点,我想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应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乙:再拿内地的私营企业来说吧,我们对私营企业(亦称民营企业)采取扶持发展的政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自然不是为了资本主义而搞资本主义,其方向最终还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不妨计算一下,中国现有的私营企业已吸收了多少剩余劳动力,向国家缴纳多少税金;而在私营企业中从事劳动的人又并不是马克思书上所说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大多数是家有生产资料又有余力出外打工挣钱的人。我想,如果国家能够对于私营企业的利润分配规定一个合理的办法,并监督其依法纳税,积极引导其发展方向,例如,发展容纳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等,那么,这些私营企业在性质上也就不应看作就是《资本论》所说的那种纯粹的私人资本吧?这是我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跳出框框想问题。

甲:现在,无论香港也好,国外也好,内地也好,都有一些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的狗肉”。内地的“左”派朋友则直说现在还有“走资派”——这是一条最凶狠的棍子。我看内地理论界也似乎在回避这个问题,回避正面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所以被人称为“羞答答”。不可不说,这是邓小平的理论思想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缺,至少是一个弱点。

倒是邓小平本人旗帜鲜明,他屡次直接论述了这个问题,回答从各方面来的挑战。1997年,香港一家杂志有一篇文章,记述邓小平在接见香港某知名人士时曾提到他在1992年6月间(那正是南方谈话以后)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他说:“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给我来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其实,我是马克思主义信

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穷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是要垮台的，必定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列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走圈子看一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那些极严重的错误？”

乙：没有坚强意志和非凡气魄的人讲不出这样一篇话来。这是回应 1990 年和 1991 年那次“批邓”风潮的。批判针对邓小平提出的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以及市场和计划的关系问题，其目的是要将中国重新拉回到“计划经济为主”的道路上去。邓小平不得已亲自上阵，南方谈话。谈话的重点就是指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不要害怕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要有“恐资病”——这不是一个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为。邓小平不客气地教训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闭上嘴，不要在市场经济问题上争论姓“社”姓“资”。这场斗争表现了邓小平的政治强势，也表现了邓小平的理论勇气，这种勇气来源于面对现实，即面对邓小平所说的“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极严重的错误”。从自己的严重错误中学习，邓小平开拓了一条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道路。以我为主，资为社用，“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当年列宁曾这样想过但没有做到，如今邓小平做到了。是否会冒风险，全看是否做到了“以我为主”（这里包括主权不容侵犯、独立自主以及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等项原则）。看来，现在不仅应当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应当弄清世界资本主义的情况。近几年，中国突然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常到香港去，你如果有机会同他们接触，不妨向他们请教，问问他们：究竟研究清楚香港的自由经济没有？进而也可以问问他们：是否到过不同的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像马克思一样深入研究过它们的经济？譬如，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法国社民党的“新中间派”经济，等等。

甲：现在西方的经济学研究，大都以市场经济为对象。我请教过一位经济学家：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听了后仍不得要领。

乙：我们已经谈得不少了，时间不多了。说到理论问题，我想还应当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老一辈在有些问题上也很难和旧的一套完全脱钩。例如，明知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有弊病，仍无法下手进行改革，也许认为目前尚非时机，目前首要任务是经济改革。然而有一点也很清楚，就是教们（尽管他们是一些非常杰出的领袖人物）大都没有能够从马克思、列宁的国家学说着眼来弄清这些弊病的根源所在，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够从这个空想成分较多的领域中跳出来。

甲：对不起，最后我还想冒昧问一句：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你奉献了大半生，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谈谈你的感想？

乙：实际上我只是一个业余研究者。我曾在我写的一本书的前言中说过：自从 30 年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至今我无悔亦无愧于我的选择，我认为我的选择并没有错。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成为绝响。但我在研究中亦曾人云亦云，受教条之累，在一些问题上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一个场合用苏东坡的两句话来表达我的歉意：“垂死初悟道，平生误读书。”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他们的学说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时间了。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信奉者和阐释者，各人有各人的说法，或者说，各有各的侧重点。我想现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应当重新认识，我们的思考应当达到一种新的自由的境界，自我反思，独立判断。没有思考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发展的。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应当允许有不同的见解存在，也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学派存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如果说有什么感想的话，这就是我的感想。

陈毅在外交部

——纪念陈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 柯 华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央决定陈毅同志参加外交部党组会议，为接手外交工作做准备。1956年秋，在印度大使举行的一个招待会上，陈毅同志晕倒了，经检查有心脏病，休养了一年多。1958年2月，才正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1960年1月我出任驻几内亚大使，因此这段时间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只有两年。1964年我回到国内，在西亚非洲司任司长，又亲眼看着他并且伴随着他度过了“文革”前期困难的时光。

最初印象

陈毅同志最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首先，他到外交部上任连个秘书也没有带，孑然一身地来了。干部司找我商量，我们把杜易同志，非洲司的一个科长，推荐给他当了秘书。这件事看起来简单，但有些人新到任必随身带几个老部下，相形之下，就可以看出陈总对干部不讲亲疏，不搞帮派，大家也因此更加敬重他。杜易同志对陈总非常忠诚，关心陈总的安全、健康，在“文革”中有些关键场合帮助出主意，在困难时期安慰陈总，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后来写了本书，名字就叫《大雪压青松——文革中的陈毅》。我看过这本书，既赋予对陈总的深情厚敬，又大量保存了“文革”中的重要史实。

第二个印象，他对干部非常爱护。陈总对干部要求很严，批评起来也很严厉。反右的时候，他批评外交部的几位比较负责的同志，严厉的程度令人惊服。他批评起来直言不讳，但是批评完就没事了，他反对把这几位同志定为右派，将他们保护起来。他对党组会的个别同志也曾做过很严厉的批评，但是他不仅批评

别人，也常以自己犯过的错误来教育大家，他自我批评的精神深得我们的敬仰。

有一次我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做非洲当权派的工作建议。康生看后批了几个字，说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于是，在外交部司长以上的会议上，把我批斗了三天，有人还提议召开全体大会批斗。结果陈毅和廖承志同志知道后制止了此事。

陈毅同志对干部的生活也是很关心的。当时外交部对国外干部的津贴费提出一个削减的方案。这个方案发给各驻外使馆征求意见，我驻埃及大使回电表示支持，但说要把卫生纸肥皂牙膏等等日常用品从国内带出去，他说这样津贴就够用了。在会议上念了这位大使的电报后，会议主持人说他是支持削减的。我知道这位大使是喜欢说反话的人，我说我看他不是支持，而是说反话。陈毅向毛主席汇报了大家的意见，主席说，对外不要过于寒酸，津贴还可以增加一些。结果，津贴按主席的指示增加了。

每次我们和陈毅一起外出，他总是和我们住在一个宾馆里，一起吃饭聊天，谈笑自如。

1958年，美国入侵黎巴嫩。我在部党组会议上提了十三条意见，讲对美斗争策略。陈总很仔细地听，听完后说，柯华你提的这十三条很好，但是你不知道中央的一条，有了中央这一条，问题就解决了。他把中央的这条传达给我们，真是运筹帷幄，足以令敌人丧胆。陈总的传达，也说明他对干部的信任，但他同时要求大家保密。当时参加会议的共十八人，陈总叫把这十八人的名字记录下来，如发生泄密，就从这十八人中查问。

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外交工作一度面临很多严重的斗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十分尖锐，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很嚣张。这时候陈总有一段很有名的讲话，说你



周恩来、陈毅与作者在一起

们都一块来吧，霸权主义和反动派一块来进攻吧，我们等着，等得头发都白了。当时全世界都很震动，这么大的气魄，只有中国敢这样讲话，陈总的外交战略思想和胆略气魄也充分体现出来。我们做外交工作的人听了，深感心情振奋。

在“文革”中坚持自己的主张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毅同志就很不理解。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也同样不理解，但是他们凭着党内斗争的丰富经验和马列主义水平，凭着他们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凭着他们个人的高贵品质，他们在“很不理解”的情况下，一开始就直觉地从行动上毫无掩饰地反对林彪和江青一伙。可以说，他们是从不理解开始，但又迅速地自觉地逐步参与和影响了一场尖锐复杂残酷的路线斗争。而且，由于他们代表的是真理一边，因此在“文革”中吸引了大批的老干部和革命群众，形成了一股无组织形式的强大的革命力量，而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实际上成了这股革命力量的无形的领导核心。而陈毅的个性——敢说，敢做，敢当，无所畏惧，顽强地表现自己……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异常突出，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爱戴。列宁说过，群众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选择他们的领袖的。我觉得列宁

的这句话，用来描绘“文革”中几位人民群众所敬爱的领导人与群众的关系，也同样是适用的。

陈毅同志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有自己的一套思路。他觉得“文化大革命”应该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讲政策，不能乱搞，要抓革命促生产，外交工作更不能耽误等等。他在许多场合积极宣传这些观点。他也多次将矛头直接指向林彪。陈毅很了解林彪的历史，1927年，林彪是七十三团的一个连长，而陈毅是这个团的领导人。他当时就觉察到林彪这个人很有投机性。

“文革”开始不久，外交部的造反派耍了一个笨拙的手腕，或许是他们的所谓策略吧，他们请陈毅当红色造反派的司令，给他带上红袖章，请他在

大会上讲话。陈毅上台后，开始还平心静气地讲了他的思路，他的一贯主张，用意当然是在教育外交部的人员。可是讲着讲着，语气一变，说“你们让我当司令，可不要当面叫司令，背后又使绊子。”他又激昂地说：“一些红小鬼，陈丕显、方毅，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革命？我要为他们说话，奋不顾身地说话。你们不同意我也要讲。革命历史证明，整人的人最终是要失败的，能团结人的人最终是要胜利的。我说这些话，可能会坐牢，老婆离婚，甚至杀头。我不怕。我从来不靠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我就不相信，就你革命，我陈毅就不革命。你不就是个连长嘛。”

陈总讲话的时候，参加会的有几百人，地点是六国饭店的大礼堂，当时我们听了，心里很痛快，只有陈总敢这么讲。他讲话讲到激动的时候，就把麦克风推到一边去，自己大声地说。

对造反派的混淆黑白，胡作非为，陈总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有一次，他在外交部全体人员的大会上讲话，没讲多少，就把袖子一捋，喝道：“你们要造反啊？！”第二天，围攻他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贴出来了。我也写了一张，从二楼一直挂到一楼，写了十二个大字：“陈毅同志的脾气发得好得很！”三个人签名，我的签名在中间，写的很大。另外还有两个人签名，一个是甘野陶，被说成是叛徒，他是外

交部第一任驻朝鲜的临时代办；另一个是龚普生，被说成是叛徒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的夫人，当时任条法司司长。他们的名字写的小一点，写在两边。好心的对我说，你写也可以，为什么要带两个叛徒呢？我说，我不认为他们是叛徒。后来，我为这张大字报又挨了不少斗。军代表给外交部每个人发毛主席像章，特别指名不发给柯华。

当时外交部的一批干部子弟，对揪斗陈毅和老干部很不满意，围着外交部质问为什么要打倒陈毅，和造反派辩论。陈总知道后，把他们召集起来讲话。陈总说：“他们要造反，我现在没有人，以后有人了，我再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我大儿子当时就在旁边站着，说：“老总，我们都是你的人。”陈总说：“现在不是时机，等时机到了再说。不是不报，时机不到。”

在此期间，陈毅热心于宣传自己的主张，到处讲他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进行的看法和思路，有请必到，苦口婆心地规劝大家。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很生动地劝大家不要头脑发热，不要无限上纲，不要越左越好，要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不要有一点错误和缺点就把人打成走资派，打成黑帮。他说这样太简单化了，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们一样简单化，我犯过和你们一样的错误。他谈自己的经历，这对当时的青年人有很好的教育作用，使很多人能正确地坚持斗争。他的讲话传得很远，在全国范围内流传，而且传得很快。在“文革”中能够形成一种与造反派对立的力量，陈毅同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造反派面前，陈毅同志也直截了当，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有一次到飞机场迎接外宾，陈总去了，造反派的一个头子也去了。他向陈总提出来，欢迎客人的名单中要把自己的名字排在陈总后边，排在其他副部长前边，陈总不同意，他恼羞成怒，摔门就要走。陈毅当面痛斥他说，什么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你就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当时我们都担心，怕陈总说话太多、太冲了，会引起麻烦。有一次他在钓鱼台接见外宾，我和一个翻译，一个记录也在场。我怕他又说多了，一见面，我就抢先提醒他说，陈总，现在都分派，我们三个人就三派，我是当权派，他是造反派，他是保皇派。陈总这次总算注意一些，就只与外宾谈工作了。

事后他单独对我说：“你的好意我知道。但是我不说谁说？不说就不是共产党员！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这

样的共产党员不值一文钱。”我知道，他这话对其他一些同志也说过，应该说，这是陈总对全国共产党员说的话。

有一次，周总理召集外交部的一二百人在中南海开会，总理正在批评造反派拆掉一些司长以上干部的电话和取消他们的汽车，总理要造反派即刻把电话安上，把汽车恢复给这些领导干部使用。正在这个时候，陈总走了进来，一边走一边喃喃地说，这都搞成什么样子了？总理安详地望着陈总说：“陈总啊，你还是耐心点嘛。”陈毅说：“我还不够耐心吗？”说着就听从总理的话坐下了。

另有一次，总理召集一个小会，参加的大约有十几个人，陈总是后来的，他一进门，就边走边说：“接班人应该是你嘛，怎么是他呢？”这时总理把手一摆，谦虚地说：“我只能当个助手。”陈总很不服气地坐下了。

“文革”初期，林彪就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大讲所谓的政变经，说“文革”就是罢官的运动，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陈毅同志有一次就在全外办全体人员大会上说，有的人嘴里说的好听，实际上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别看他毛主席语录举得很高，实际上是什么人，我还要看。

陈毅简直压制不住他对林彪的愤怒。在许多场合，他都毫不掩饰地揭批林彪，有一次他对上海来的同事讲，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说的比他的亲生父亲还要亲，斯大林死了，他就焚尸。现在毛主席的威望这么高，有的人还要捧。历史是很相似的。他要是当叛徒，我就不姓陈。

陈毅同志与江青和林彪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化了。那是1967年2月16日，在一个中央的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元帅，还有谭震林等老同志，公开与林彪和江青斗争。陈毅同志当时讲，历史不是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要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子交给赫鲁晓夫了吗？不是搞了个修正主义吗？江青等向毛主席汇报了上述情况，毛主席大发雷霆，当面训斥陈毅同志，这就是有名的“二月逆流”的序幕。

造反派曾经问陈总：“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这时候，陈总义正词严地答复说：“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陈总实事求是的赤胆直言，谁还敢说他是反对

的呢？

在批斗会上

“文革”开始后，各种工作几乎都处于停止状态，外交工作也很混乱。当时外交工作发生了许多事情，火烧英国代办处，围攻印尼使馆，我国某一驻外使馆在楼顶上立霓虹灯大标语等等。大使请客，我们的服务员不给端盘子，而由大使自己去端。还把抄家抄得的埃及总统送的礼物拿到大街上卖，被埃及大使买了去，向我们提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实在忙不过来，希望陈毅同志尽早解放，因此请他带头做个检查。陈毅说自己没有错误，为什么要向造反派做检讨。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又想为总理分担一些工作，就耐着性子答应做检查。

1967年8月1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由陈毅做检查。造反派让我去参加大会“接受教育”。会前，周总理对造反派提出要求，不许在会场上悬挂打倒陈毅的标语，不许揪人，不许侮辱陈毅的人格。为了安全，总理还安排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坐在前两排。陈总进来的时候，正好碰到姚登山，他拒绝和陈总握手，以表示和陈总划清界限。大会开始后，周总理讲了一些话，讲完就先走了。总理一走，打倒陈毅的标语就从二楼放下来了，几个造反派冲到台上揪陈毅。战士们保卫陈毅，把他们推开了，但陈毅的脸上已被抓出血来。

周总理走的时候，会议交给谢富治主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言不发，根本不管。周总理听说后，就赶回大会堂，批评造反派违背诺言。会议结束后，总理安排陈毅的座车和他的座车一块走，以确保安全。

那天上午开完批斗会，中午陈总在钓鱼台招待非洲外宾，我出席作陪。我看他平心静气，和客人谈笑自如，他向客人敬酒后对我说：“柯华，你给客人敬一杯酒么。”我说：“你都敬了，我给你敬一杯吧。”他说：“你给我敬什么，我是走资派。”我说：“我就敬你，祝你健康。”我敬酒的时候，造反派就在一旁瞪着我，后来这当然成了斗我的一个理由。

当时民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传说，说在批斗陈毅的时候，陈毅请大家翻开毛主席语录第271页，而毛主席语录只有270页。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陈毅已经朗朗念道：“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当然这只是个传说，实际上没有这么回事。1972年1月，毛主席在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才对陈毅的夫人张茜同志说了这句话。这句话对陈毅同志的家人和我们都是极大的安慰，但是在这以前并没有这句话。这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却可以说明，人民群众对陈毅不屈的精神是多么敬佩和爱戴。

1967年8月26日下午，在外交部又举行了一次批判陈毅的小型会。当时毛泽东对陈毅有个“一批二保”的指示。周总理也是亲自到场，他先派人进会场看看有没有打倒陈毅的标语，他自己拿个凳子坐在门口等着。检查的人说里边有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总理就不肯进去，在盛夏中坐在门外太阳底下，有同志给他草帽他也不戴，一直到大标语撤掉了才进去。这天下午，外交部的造反派勾结北京外语学院造反派数百人来揪抢陈总，把陈总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周总理事前安排了卫兵保卫陈毅，周总理走后，造反派来抢人，卫兵在外交部保陈派的帮助下把陈总藏到洗澡间。那一次，陈总被困在洗澡间中达五六个小时，最后还是周总理令卫戍区派警车把陈总从后门接走了。

这样的批判会，陈毅同志先后经历了八次。所谓批判，实际上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八次批判会对陈总的身心是严重的摧残。

陈毅在“文革”中这样“猖狂”，林彪为什么没有杀害他呢？林彪在“文革”中害过许多领导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主席既已提出“一批二保”，林彪也就不好露骨地动他的血手，而是伙同江青一伙对陈毅同志的病采取慢性折腾直至最后以误诊、错诊、错治这样杀人不见血的办法置陈总于死地。

陈总在困境中的心情，其烦闷可想而知。有一次，我在钓鱼台见到陈总，我说外交部的老同志托我向你问好，希望你保重身体。他说：“哎呀，犯错误了。”我说：“我们都认为你没有犯错误，你是大功之臣。”陈总打断我说：“唉，不说了。”其实并没有人托我向陈总问好，但我相信我的话是代表了许多革命老干部的心情的。

龚澎和我是同学，“文革”期间关系很好，感情很深，我还写过一篇洒泪忆龚澎的文章。当时我对陈总说，我和龚澎约好了，要去看你。其实我们并没有约好。陈总当晚就给龚澎打电话，说柯华说你要来看我。龚澎说是啊。我和龚澎也是心心相印，都有心安慰陈总，虽没有约好，她是会想到我的用意的。

陈总生病的时候,正在石家庄的一家工厂劳动,周总理亲自批准将他接回北京治病。回到北京后,三〇一医院推说没有房子,其实是有房子的,邱会作占了一层楼的六间房,他只住一间,其他五间都空着,结果陈总等了五六天才住进医院,进去后住了56天,一直感觉肚子痛,但医院一直没有请医生来会诊,最后说是急性阑尾炎,开了刀才发现是肠癌。那次手术没有做干净,扩散了。后来周总理找了肿瘤医院吴院长亲自给他治疗,吴院长虽很认真负责,但已是无能为力了。

陈总最后留给张茜同志和儿女的遗言是:“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最后的告别

1972年1月10日,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

原来因江青等操纵,追悼会安排的规格很低,出席的人很少。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由叶剑英致悼词,周总理出席,其他政治局委员一律不参加。许多民主人士表示要参加,但是不允许。宋庆龄要求参加,也不允许。相比之下,江青的帮凶谢富治的追悼会却隆重非常,地点也选在人民大会堂。这样明显地厚此薄彼,使广大热爱陈总的同志无不感到心情沉闷、不满和气愤。

那天中午一点半,毛主席突然叫车,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他平时睡到三四点钟,这天睡不着了。周总理当机立断,立即通知宋庆龄,通知西哈努克,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去参加。其他人也都可以去,悼词也改由周总理亲自致。

毛主席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什么其他的规格都比不上了。谢富治的规格也不值一谈,大家的心情也就平静和兴奋了。外交部的干部对谢富治有特别的恶感。当时陈毅多次被造反派揪斗,外交部系统的很多单位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周总理提了四条要求:不许提打倒陈毅的口号,不许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不许冲击外交部,不许泄露外交机密。当时这四条被拥护陈总的一派写出来,贴在外交部的大门口。一天谢富治来外交部,看到这四条,当时就反对说:



陈毅和张茜(1971年)

“这样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

周总理在追悼会上致的悼词,讲到陈毅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好干部,努力为人民服务等等,评价就是这么几句话,主要内容是介绍简历。评价简单,这在当时也是可以理解的。

毛主席亲自参加陈总的追悼会,并对张茜同志说:“陈毅同志是好同志”,这是毛主席对生死与共的老战友的一句公正的评价,这也许是林彪叛逃后,毛主席开始在纠正对老战友的错误态度。在“文革”中间,大批的中央领导人被揪斗,大批的老干部被揪斗,这使毛主席在干部和人民中间的威望大为降低。毛主席可能觉察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通过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的方式加以补救。的确,这对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也是有补救作用的。

陈总离开我们将近三十年了,而我们这些人,陈总当年的老部下,仍然深深地怀念他。他的思想作风深深地刻印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

陈总:您锐利的眼光所预见的那个叛徒已摔死在异国他乡,而您仍是我们敬爱的陈老总。

陈总:您的最后遗言“一直向前战胜敌人”,将永远鼓励我们向前,向前,向前!

陈总——青松长青!

(责任编辑 吴思)

宋庆龄与《中国建设》

● 张彦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正在美国乔治亚州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的宋庆龄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文章里有这样一句不同凡响的论断:“是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一件看来是不幸的实际却是造福人间的喜事。”当时,她才20岁。

以后她和孙中山共同为革命奔波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特别是在外事工作方面。孙中山与来自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的代表人物会谈时,她都在座。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她在武汉创办了《人民论坛》,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她又在上海先后支持出版过两本进步的杂志:《中国评论》和《中国呼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她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继续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赢得了世界各地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的斗争在道义上的支持和在物质上的援助。在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不久,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便向宋庆龄建议,由她办一本杂志,向国外报道新中国情况。宋庆龄欣然接受并且亲自为这个杂志定名为《中国建设》。

这个杂志之所以在国外深受欢迎,除了内容都是外国读者所渴望了解的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所有文章都是用英文专门为不熟悉、甚至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外国读者写的。

编辑部遵照宋庆龄的指示,特别重视与读者的联系,做到“有信必复”。一般每月总要收到读者来信好几百封,除有专人负责处理外,读者的反映、问题和意见都要经过主编过目,并作为制订编辑计划的重要参考。复信工作被视为杂志的“补充”,有的复信长达数页,俨然一篇短文章。这样认真地与海外读者的信件来往,确实有利于建立读者对杂志的信任,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有的长期老订户,书信不断,成了杂志社的老朋友。一位热心的美国读者,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将杂志上的文章编成索引目录,输入电脑并给杂志社寄来。

宋庆龄以身作则,重视联系读者。自《中国建设》创刊以来,直到她1981年逝世,她每期都要亲自书写信封,给她在世界各地的几十位好友寄去杂志,并征求意见。

在纪念创刊十周年之际,宋庆龄特别以《真实报道的传统》为题,给杂志撰写了一篇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她说:“当《中国建设》出版第11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回顾过去的10年。在这段时期里,我们保持了

真实报道的传统。我们把这一点看成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争取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伟大斗争所作的贡献的一部分。当第二个10年开始的时候,读者们无疑可以期望:我们将同过去一样,忠诚地为真理效劳。”

刊物每期出版后,宋庆龄总要抽出时间来看,觉得有进步,就加以表扬。如发现什么错误,她也会提出严厉批评,她很不喜欢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通过口头、书信或电话,她经常和杂志社保持密切联系,并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具体的选题。

对她自己的文章,她总是谦虚地要求编辑部提出意见,而且总是以她坦荡胸怀和求实的精神对有益的意见和修改表示感谢。她的亲笔文章都是用英文写的,一般都由对她文风非常熟悉的爱泼斯坦负责编辑处理。一次,她看过修订稿后,立即来信说:“我同意在我的文章第四段中所作的修改。改得确实好,那句话原来太含糊了,现在读起来好多了。”1975年,当她听到有人说过她写的东西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允许别人改动时,她真生气了!她说:“这简直是诽谤!”每当杂志社给她寄去稿酬,都被她退回。

对于《中国建设》来说,宋庆龄既是它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同时又是它最具有威望和最丰产的一位作者。自1952年创刊号起,直到1981年她逝世之前4个月,她为刊物撰写了30多篇文章,大多涉及重大题材。这些文章,有的是应约而写,有的却是她有感而发,主动写了送来的。不过,无论是什么情况,都绝不是空洞的应景文章,都有她独到的见解和她与众不同的独特文风。她的英文也是自成一格,高雅、简洁、朴实而又带感情,外国作家也不能不对之赞赏。她写文章,就和她平时对满座友人谈话一样,循循善诱,亲切感人,从不说教。她总是把自己摆在与文章读者同等的位置上,从不强加于人。然而,谈到重大问题时,她总是高瞻远瞩,立场非常鲜明,观点毫不含糊。她讲的是大形势、大道理,用的却是最朴素的语言,平易近人,使人爱读、易于接受。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标

志着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文革”中已被迫沉默了5年的宋庆龄,重新提起笔来,在《中国建设》杂志上颇有感触地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篇文章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并不是尼克松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时代,而是中国和亚洲的新时代把尼克松带到了北京。

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在这历史转折的时刻,宋庆龄十分兴奋地为国庆30周年写了又一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文章:《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在这篇文章里,她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指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景。她说:“今天,我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当我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大好,我们新中国的航船在战胜险遭颠覆的命运之后,又乘风破浪、昂然前进的时候,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幸福。我又看到了祖国的新的光明。”

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宋庆龄还特意在《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篇她署名的《致读者》,向海外广大读者亲切地谈到她在庆祝人民共和国30周年时的心情:

“我们的30年是一次广泛的新生,它的开始是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斗争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在我们长期斗争的实际过程中,真正为这种思想所鼓舞的许多外国朋友都和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我们永远不忘记他们。

“在不同的时期,中国人民有过挫折、停顿和错误。我们曾面临过,现在也还面临着,巨大的物质和文化发展的问题,如何在所有方面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潜在力量的问题,以及改造社会、自然和人本身的问题。”

现在,宋庆龄虽然离开我们20年了,但她的精神却在杂志社里永存,并成为鼓舞他们沿着她所指引的方向继续迈进的强大动力。

(责任编辑 刘文)

萧克将军与《炎黄春秋》

● 洛 松

1990年,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萧克将军参与发起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翌年5月在北京宣告成立;7月,这个研究会主办的《炎黄春秋》正式创刊。从此,《炎黄春秋》在执行会长(现为第一会长)萧克将军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走上了由初创、发展到逐渐成熟的过程。

十年耕耘的辛勤中,十年收获的欢乐里,都有着萧克老将军的身影。十年来,萧老对《炎黄春秋》的指导、支持、呵护,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然而都是深刻的,久远的。

难忘的初创的日子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1990年8月经民政部批准注册之后,萧克同志就积极倡导创办一个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刊物。11月25日,他在关于创办《炎黄春秋》的申请报告上批示:“同意。最好快点办理。”熟知萧克将军经历和秉性的同志都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大家以将士请战、受命的心情“快点办理”:翌年3月完成正式出版的审批手续;当月通过《炎黄春秋杂志社试行方案》;4月1日全体工作人员在北京景山后街北京市少年宫院内集中办公。

租用的是一家招待所坐西向东的几间平房,“化缘”来的几张桌子有的还残留着“文革”时写大字报的痕迹。如此简陋的办公室,竟使前来看望大家的萧克老将军立刻想到了延安,想到了“抗大”。他笑着说:“这比当年住窑洞好多了,窑洞里能培养革命干部;你们在这里也能办好杂志。”

社长杜导正将大家一一介绍给萧老,萧老专注地听着,端详着每一个人的面孔。办公室

的同志端来沏好的热茶(那是为招待萧老特意用七元一角钱买来的二两茶叶),大家围着萧老品茗畅谈。萧老既关心着大家的工作,又关心着大家的生活。谈话中洋溢着领导对部属的关怀,长者对晚辈的关爱。

两个月后,一位副社长前往萧老住所请示工作时,萧老还特别嘱咐说:“杂志社来了新同志,一定领他们到我这里来。哪能有连长不认识他的排长、班长,班长不认识他的兵的道理呢?”他还特别说:“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的时间,只要我没有特殊的事,都欢迎大家来。”

借用古人的话勉励我们

萧克老将军最为关心的当然是刊物的方向,刊物的品格,刊物的质量。《炎黄春秋》以主要篇幅记述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萧老便把“求实存真”四个字看得格外重要。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

1996年7月,《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纪念,萧克将军又把王充的话题赠我们,以资告诫和勉励。同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举行《长征·世纪丰碑》系列活动,他应邀为编辑、出版的《长征大事典》写序(载本刊1996年12月号)。他在《序》中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时,不无讥讽地说:

记得70年代初,我有幸去井冈山,正遇上两个县的同志在争论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在何时、何地任命林彪当团长。甲说在甲县,乙说在乙县。双方争论不休,虽然没有说明争论的目

的,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概不外是争点“光”吧。

同是这个林彪,在摔死前,有些人说他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说他是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的代表。而摔死后,则连他在南昌起义时的连长职务也“贬值”了,改成为见习排长了。

接着,萧老严肃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这很不好”,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他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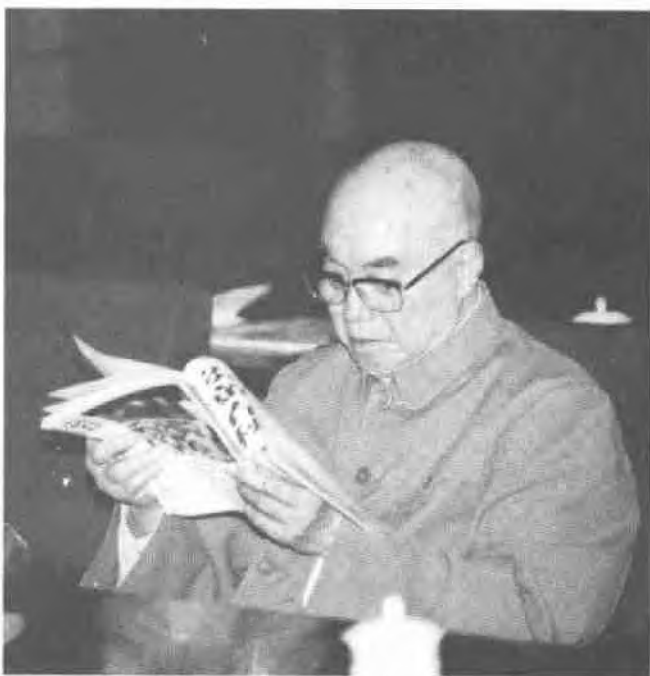
探求真理身体力行

戎马一生,素有儒将之称的萧克同志,晚年曾任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离职后受中央军委委托主持编纂八路军史料丛书。他在党史、军史研究中力倡实事求是,反对人云亦云。他不管来头,不看风头,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纠正一些讹传,在军界学界传为美谈。(见《炎黄春秋》2000年5月号冯建辉文)

这里举另外两个例子。

一是关于对陈独秀的研究。早在1981年8月,萧克在纪念中共建党60周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这个问题要不要全面研究呢?我看要。毛泽东同志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和李大钊等把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集合起来,……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周恩来同志也说:“陈独秀创党有功”。我想,对于这样光辉时代的



正在阅读《炎黄春秋》的萧克将军

“总司令”和创造了党有功的人物,即便他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开除出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萧老在谈了这段话之后,毫不含糊地说,“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他明确批评,从纪录片《先驱者之歌》中“看不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而“‘南陈北李’(大钊)”之说才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萧老在1993年欣然为《陈独秀诗集》作序,并对该诗集的几位编注者说:“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以上见本刊1994年6月号)

二是关于勇于承认错误以及重视记取失败的经验。1969年萧克同志被下发到江西永修云山国务院农林部“五七”干校。“因祸得福”,他在干校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少著作,帮他“清理了时下流行的被颠倒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996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创建75周年,又恰恰是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发表的75周年,本刊特请萧老将1971年冬写在列宁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书眉上的读书笔

记核校后发表。

萧老在笔记中称赞列宁“最伟大最感人之处，就是他敢于公开承认十月革命四年来所犯的重大错误，深刻分析了错误的由来，并提出了切实措施坚决予以改正”。他说：“我重温列宁这些论述，深深感到列宁无论什么时候，对革命事业和他所领导的党和国家都极端认真负责，表现了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的继续做下去，错的便承认错误，切实改正。”

对于列宁文中这一段话：“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萧老反复阅读后写道：

“我认为，这句话非常重要。想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生产和产品分配，这是错误之一；想用热情的浪潮来直接实现经济任务，这是错误之二；想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来达到上述目的，这是错误之三。回顾我们自己有些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实践，这三条不值得我们特别认真地思考一番么？”

我们读了萧老的这篇读书笔记，联想到1971年冬国家仍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对于萧老这一辈革命家的政治洞察力和治国安邦的远见卓识，我们能不感叹吗？

谦逊中透出令人吃惊的睿智

萧克同志是一位十分谦虚的长者。他身经百战，指挥过千军万马，但对于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即使布置工作，也从未有命令的口吻。《炎黄春秋》的记者随他出差，他走到哪里都是询问，倾听；他出席各种学术研讨会，需要讲话时他一定事前听取有关同志特别是学者的意见，作认真的准备。萧克讲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平实无华中常常透出令人吃惊的睿智。试举几例：

——文化不等于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文

化现象，并不是只有阶级内容。文化形成比阶级的形成早，“寿命”也比阶级长，人类的全部文化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劳动人民以及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的勤劳创造，其中一部分如意识形态可能在历史上曾经属于某一阶级，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成为人类既成的全部文化成就的一部分，不再是某一特定的阶级所专有的了。（见《炎黄春秋》1994年5月号）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有两重性，即精华与糟粕并存。我理解，人们所说的“精华”，是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起积极作用的部分，这是传统文化的主体。“糟粕”是对社会进步、民族振兴起阻碍作用的部分。……这里还强调指出的是，文化遗产中的“糟粕”和“精华”有时是很难一下子分清的。我还认为，文化现象不一定只有“精华”和“糟粕”非此即彼两极。文化现象复杂得多，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处理。（见《炎黄春秋》1994年5月号）

——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中有一个“恕道”，就是以“推己及人”的精神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记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末期，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同志同我说过，要重视这个“恕”字。要以“恕道”来解决民族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中国素来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天，大家都能“推己及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形成一种人们之间互相支持的祥和气氛。在党内，也利于民主集中制和优良作风的发扬；在国家，能够健全民主与法制，这样，我们才能集中力量聚精会神地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见《炎黄春秋》1996年12月号）

我们欣赏萧老这些语言的片断，与其说着眼于它的真理性，不如说是更敬慕萧老探求真理的精神，独立思考的态度。

常说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过去的十年中，在萧老的直接领导下，我们确实是受益匪浅的。如果说《炎黄春秋》在反映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有其特色，有其成就的话，我们就不能不首先感谢教我们这样做的老师——会长萧克同志。

炎黄春秋杂志社集会庆祝创刊十周年

7月21日,中央和首都有关部门负责人、著名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150多人在北京隆重集会,热烈庆祝《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习仲勋、费孝通、程思远、任建新、季羨林、张岱年等数十位老领导、老学者为《炎黄春秋》题词致贺。习仲勋的题词是:“《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庆祝会由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方实主持,社长杜导正作汇报讲话。他说:《炎黄春秋》在1991年由以萧克、费孝通、程思远为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创刊至今已有十周年了。创刊以来,她在宣扬爱国大团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特别是在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态度是鲜明的。她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近代史、现代史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论述,力求客观公正,秉笔直书,争取给国家留下一笔观点正确、真实无误的史料。杜导正强调,《炎黄春秋》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决定的因素是办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加之众多高水平作者、志同道合者以及广大忠实读者的鼎力支持。最后他表示,《炎黄春秋》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今后全社同仁愿意继续在上级和作者、读者的监督下努力改进。

会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教授讲话,对《炎黄春秋》的十年成就表示祝贺。他说,历史是出戏,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我们都走过了几十年,参与了时代的变化。《炎黄春秋》批判地记载了历史,它是一面镜子,它说了真话,反映了真实情况。一些已经过世的朋友不能说话了,《炎黄春秋》讲了他们的经历,替他们说了话。我们通过《炎黄春秋》再次认识了过去的人和事。大家都爱看《炎黄春秋》,认为它办得不错,希望继续办下去,办得更好。一直关心和支持《炎黄春秋》的国务院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上将因事不能到会,特地委派秘书贺茂之来祝贺。他让秘书告诉大家说:“我很喜欢看《炎黄春秋》,《炎黄春秋》办得不

错,希望《炎黄春秋》越办越好。”他还让秘书在会上宣读贺诗:“十年耕耘春秋笔,激浊扬清正气张。”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石峰在讲话中代表新闻出版总署对《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他充分肯定了《炎黄春秋》十年来的成绩,指出:一百多期《炎黄春秋》是一份厚重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越来越显得弥足珍贵。希望《炎黄春秋》再接再厉,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炎黄子孙谱写新的篇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光添彩。

本刊顾问、国务院农村研究室原主任杜润生,《炎黄春秋》特邀编委、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李锐,老新闻工作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范敬宜,中国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楚辞专家文怀沙,著名作家周而复,中国警官大学尹骐教授,中央文献研究室杨明伟副研究员,以及《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离休干部刘德纯等也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书面发言)。

出席会议的还有:杜星垣、凌云、柯华、李昭、张西帆、吴象、王强华、沈仁干、张黎群、何东君、郑惠、李之璉、庄炎林、李宝光、冯征、戴逸、张岂之、张锲、冯其庸、鲁瑄、吴塘、王俊义、李耐因、李慎之、曾彦修、李犁、张彦、张培森、马仲廉、李维民、苏双碧、王景山、刘恪山、王戎笙、王春瑜、赵淮青、赵棣生、刘志琴、章学新、谢景星、薛德震、薛攀皋、高放、戴煌、金凤、杨兆麟、何标、解力夫、许人俊、楚泽涵、钱听涛、汤文选、徐明远、申春、冯健、马京生、庄志霞、朱继功、张士景、丁济沧、陈春森、纪希晨、刘野、袁鹰、黎白、黄爱平、王志光、王科元、王才、朱地、续志先、刘洁尘、舒云、王泽洲、顾永高、刘溪萍、陈清泉、方徨、林耀、张沪、张广友、张天来、张秀平、宋文茂、徐孔、程理嘉、刘家驹、舒元璋、吴思、杨继绳、郝爱存、赵友慈、徐庆全、洪炉、王恂、丁洪章、洪卓民、陈崇保、彭彰庆、敖本立、杨秀芝、蓝英年、薄会川、谷秀敏等。

(本刊记者)

谢觉哉夫人 王定国在西路军

● 谢景星

1950年，我从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调北京军委办公厅工作，一个星期天，我请假到内务部看望时任内务部长的叔祖父谢觉哉。当时谢老公务忙，不在家，由叔祖母王定国接待我，叔祖母是谢老的秘书兼机要科长，我和她是首次见面。她的第一句话是：“谢老说今天你要来，我叫炊事员为你准备了中午饭，生活上你还缺点什么？跟我说……”临走时再三叮嘱：“到了大机关要勤奋工作，刻苦学习，听党的话。”从此以后，每逢节假日，我都要去看望、聆听她的教诲。如今，她已89岁高龄，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学会、中国长城学会及中国干部教育协会的领导职务。她还积极投入挽救失足青少年的工作，足迹遍布全国，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她还是《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杂志社特约编委。她眼不花，耳不闭，思维依然敏捷，仍笔耕不止，出版了《留在昨天的情思》和《后乐先忧斯世事》两本著作以及上千幅字画作品。还有几十万字的日记在党的80周年纪念日前已付印。

王定国1913年2月4日（农历除夕）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农村，父亲是佃农。1930年，父亲病故时，母亲卖了一个弟弟换回一副棺材板安葬父亲；因生活无着，才16岁的王定国被嫁到邻村李家做媳妇。1931年春，在舅舅家结识了避难的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通过杨克明，又结识了一批进步学生和

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王定国逃离了李家，参加党领导的秘密农会。她在妇女中积极宣传放足、剪发和男女平等的思想，并在四川南充地区第一个带头放足、剪发。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集中所属红四军、红九军和红三十军的主力约五万人挥师南下，解放了营山。

10月6日，营山县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王定国当选为内务委员会委员，内务委员会主席李禹候在战斗中牺牲后，她代理了主席职务。11月在营山县党代会大会期间，王定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12月，县政权组建妇女独立营，由县委书记王崇道兼任营政委，王定国任营长，随即率妇女独立营到三元、五块石、消水河等地抬担架、送弹药、围剿土匪，在营山的战斗历时五个月。

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决定扩大宣传队伍，将原有的剧团规模扩大。王定国因平时爱唱爱跳，组织上就调她到剧团工作，负责服装、化妆、演出杂务。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的中央机关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懋功会合，在庆祝红一、红四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在联欢会上，王定国所在的剧团和中央军委文工团联合演出了精彩的节

目,李伯钊跳了苏联舞蹈,大家合唱了陆定一写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

随后,中共中央举行了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共同抗日,王定国随剧团经过毛儿盖来到卓克基,为过雪山作准备。一天,一位老同志手拿衣物从山坡上走下来,面带笑容走到王定国面前说:“小同志,要过雪山了,请你帮帮忙,把这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王定国当即伸出双手接过来,满口答应:“行,



晚年的谢觉哉与王定国

我今天就缝好,明天就给你送去。”老同志连忙道谢说:“那就谢谢你了。我叫谢觉哉,就住在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第二天,王定国将缝好的羊毛衣送给谢觉哉,谢老远远地迎上前去,接过羊毛衣看了看,高兴地说:“谢谢你,缝得很好。”并将身旁的董必武、徐特立给王定国作了介绍。王定国也自我介绍说:“我是红四方面军剧团的,叫王定国。”在向他们告别时,谢觉哉特地嘱咐她:“小王同志,你们过雪山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回去告诉同志们多准备一点辣椒,可以御寒。”谁曾料到这次偶然相遇,竟使后来他俩成了终身伴侣。

1936年10月底,部队过黄河后,准备配合河东红军部队攻取宁夏。这时河东战场形势急变,“宁夏战役计划”不能实现。中央军委命令过河部队红五、九、三十军组成西路军,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命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率西路军部队向河西走廊行进,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直接打通由新疆至苏联的国际通道。剧团

也改称“西路军前进剧团”,跟西路军总部行动。

11月9日,西路军经过万里征战还未得到休整的英雄健儿两万多人,包括上千的伤病员,1400多名女战士,高唱战歌,在空旷的、陌生的河西走廊上急进,时值数九严冬季节,风沙扑面,呵气成冰,食不果腹,衣不御寒。沿途同围追堵截的马家军不断发生激战,加上中央军委对西路军任务不断变化,又没有主力红军后续部队的支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历时四个多月,取得

先后歼敌两万多人战绩。但由于当时没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又没有很好的群众基础,1937年8月中旬,西路军被数倍于我之敌围困在荒山雪岭之中,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兵败祁连,九军政委陈海松、25师政委杨朝礼壮烈牺牲。陈昌浩召集西路军余部全体指战员开会,宣布组织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就地疏散,各打游击,自找出路。

这一悲壮惨烈的历史事实,沉重地深深刻在王定国的记忆里。1996年王定国看了《炎黄春秋》杂志第三期刊登的刘明钢写的《西路军的失败与陈昌浩的检讨》一文后,她说:“这篇文章写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公道的。”

在这场战斗中,王定国腿部曾两次负伤,右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结成了冰块。王定国是排长,晚上还得查岗查哨,当她发现有个战士该换班却没有人来接班,便自己接替战士放哨,因腿伤只好坐着放哨,刚好徐向前出来查哨,见她坐着,便问:“你这个同志怎么坐着放哨?”她说:“腿受伤了。”徐向前又问:“腿受伤怎么还出来站岗呢?”她答:“是

来查哨,我替战士站岗。”徐向前听了,忙叫另外的战士换下她。

12月5日,剧团奉命从永昌到东里铺慰问红九军军部,不料与军阀马步芳的骑兵部队遭遇,剧团立刻抢占一个三层楼高的土围子据守待援。总部派三十军武杰(吴俊平)带领骑兵支援,哪知这些马匹是从敌人那里缴获过来的,敌人用马语一声吆喝,连人带马都跑到敌人的阵营去了。敌人开始认为剧团驻地是九军军部,采用重兵包围,当我们的子弹打完后,只好用马刀和石头同敌人奋力拼杀时,敌群蜂拥而上,十几个对付我们一个,苦战一天,大部牺牲,余下三十余人被敌人抓住。被俘后王定国等被押往武威后转青海西宁关押。在关押期间,剧团被俘人员秘密地组建了党支部,王定国任组织委员,开展了同敌人新的战斗。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全国一些大城市先后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十分关心失散和被俘的战友。7月,党中央派谢觉哉等同志在兰州成立了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简称八办),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转送延安。这时马匪军正在大批杀害红军战俘,用活埋、枪杀等极其残酷的手段,一片白色恐怖。据1958年张掖县统计的数字,马家军在张掖杀害西路军俘虏的情况:活埋2600人,枪杀575人,烧死56人,其它手段害死27人。遭遇最惨的是那些被俘的女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1000多人,前进剧团30人,全部落入马步芳之手。马步芳见抓到的红军剧团,大都是二十来岁的女人,就强迫为他们唱歌跳舞,寻欢作乐,或作妻妾、女佣。敌人为了控制剧团,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把王定国和孙桂英等20多人押送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县城,由旅长韩起功负责临时监管。“八办”得知这一情况后,谢觉哉通过地下党,结识了宗教界爱国人士、甘肃福音堂医院院长高金城大夫,谢觉哉同高院长回到张掖,重开福音堂医院,秘密地开展营救工作。王定国和剧团的徐世淑就成了福音堂两位特殊

身份的护士,以医院为掩护,接待西路军的伤病员和外出寻找失散人员。

据后来的统计,经王定国和“八办”的同志寻找到的西路军失散和被俘的同志共300多人,其中有刘瑞龙、魏传统、丁世芳、吴建初等负责干部。

1983年秋,王定国回到阔别40年的甘肃省进行访问。这里是西路军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的疆土,是当年失散的红军定居地。王定国经常收到他们的信件,诉说心中的委屈和面临的种种困难,她一直深感不安。这次是应甘肃党史部门的邀请,她和伍修权专门到了兰州,在兰州军区政委肖华的组织下,成立调查组,他们来到西宁、银川和河西走廊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走访了尚健在的一部分西路军老红军战士。他们是当年西路军兵败祁连后,一批被俘和失散人员,大多是从敌人的屠刀下及活埋战俘的万人坑中逃出来的。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重返革命队伍,政治上长期受到歧视,把他们当成“逃兵”、“叛徒”。“文革”中,更是备受摧残。他们生活上面临许多困难仍无法解决,没有医疗保障,住房条件很差,没有生活来源。面对这种情况,伍修权感慨地对王定国说:“世界上哪有只打胜仗的军队,西路军当年的失败,这些同志有什么责任?!竟长期忍受这么多委屈!今后还要不要有人当兵?这件事一定要解决好,不然会给党和军队造成不良的影响。”王定国和伍修权商定,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地向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组织部写了个调查报告,并提出调查组的看法和处理意见。不久,在胡耀邦、宋任穷等中央领导人的关注下,由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对西路军散失人员的安置办法作出具体规定,恢复这些人政治上的荣誉,不再叫红军流落人员,改称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增加生活上的抚恤,发放生活费,实行公费医疗,改善其生活状况,妥善解决他们的家属子女就业和就学问题。

(责任编辑:刘文)

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

● 无 文

两年前，我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几位前共产党人的事写成论文，提交学术研讨会讨论，一家学术杂志报道了这件事，国内史学界开始注意到原“中央非常委员会”在西安事变中的活动。后应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之约，写出了《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稿，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

书中说的“西京兵变”，就是由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前共产党人”主要是指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反对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而被开除的一些早期的共产党人。他们不服米夫、王明等的错误决定，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以示对抗。对于这个“中央非常委员会”，1945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毛泽东在1969年4月“九大”期间还说，罗章龙“他在上海另立中央不晓得为什么，不管那时中央怎么不行，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

“中央非常委员会”的这些人，后来或被捕牺牲，或被开除出党后沉沦下去，甚至当了叛徒。其中少数有抱负、有思想的人，虽处境艰



黎天才

难，仍不改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初衷，寻找机会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

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处于军阀混战的后期，东北军正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处于国难家仇中的张学良，受世界革命新潮流的吸引，渴求了解革命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那些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除了党籍但仍胸怀抱负的一些人才，就成为张学良千金以市的对象。张将军邀请他们到自己的身边，委以重任，视为心腹，共谋重振东北军之大计。直至

联络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他们都是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些人中，最突出的一员干将便是黎天才。

从中共要员到张学良的心腹

黎天才，山东蓬莱人，约1900年生，原名李伯海，也称渤海，又名黎经天。受“五四”影响，黎天才很早就投身社会运动，与李大钊、罗章龙等熟识。1923年“二七”大罢工爆发时，李曾参加罗章龙、史文彬等领导的北方区委组织的声援罢工的大游行，黎天才任游行副总指挥。此后，即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介绍人是“五四”时的风云人物高君宇、何

孟雄。

加入党组织后，黎天才主要在全国铁路总工会参与工运，并参加过学运、军运等，逐步显示出工作能力。1926年起负责中共北京市委宣传工作兼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李大钊避难苏联使馆期间，与外界的联系就倚靠黎天才奔走。其间，他还代理李大钊所兼任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一职。李大钊遇难后，黎天才接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1927年夏秋，中共北方党组织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北平市委改组，撤去黎天才市委书记职，指令他负责宣传教育工作。不久，在参加一次撒传单的活动，黎遭张作霖的军警逮捕，入狱后，组织营救的线索断了，还被同案人出卖，面对酷刑，他登报声明脱离政治，出狱转向。

黎天才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在北京大学文科旁听时就“为人有才干”（见未刊的《罗章龙自传》）。他曾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市国民运动的报告，得到李大钊的赞许，列入党内机密文件保存。此报告后来被北平当局编入李大钊案的所谓“苏联阴谋文证”中。黎天才的才华学识也很受张作霖的重视，所以当他出狱后，就被留在东北军中做事。张学良继其父任后，黎天才更加得到信任，逐步成为少帅倚重的心腹。

1931年春，“非常委员会”在北方的组织也遭到统治当局的进一步破坏，大批骨干被捕。黎天才利用张学良委派他办共产党案的方便，暗中出力，先后释放了吴雨铭、韩麟符、李希逸等人。此间，还保护了被捕的原中共中央秘书潘文郁，并根据中共“北方特科”的意思，将潘引荐给了张学良，当伴读老师。

1933年，张学良从海外归来，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他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对日本侵略不抵抗的做法日益不满。刚驻武汉，张学良就急召黎天才赴武汉组织机要处，吴雨铭、李希逸等也陆续赶来参与，逐渐成为围绕在张学良身边的智囊人物。

这里提到的吴雨铭是中共“一大”以前的党员，“五大”的中央候补委员，他在潘文郁身份暴露被南京方面逼死后，经黎天才推荐到张学良身边，继续随行讲座，向张介绍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国内工农革命的实践经验。罗章龙本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吴雨铭讲解时，又经常提到罗章龙的名字，因此，罗章龙这个人也就深深印在张学良的脑海中，这是后来张学良几次秘密会晤罗章龙并引以为“教授”的重要原因。

1935年，红军经万里长征进入西北，蒋介石窥见红军有立足陕北的可能，有意要移张学良部去对付中共和红军，拟任命张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一度犹豫不决，不想受命。黎天才主张他接受此令，理由：“西北是我远祖发祥地的摇篮，是待开发的处女地，搞得好可以与蒋翻脸抗衡，分治割据，同时也可接近我党（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及联合国内各反蒋抗日之地方武装，以此为抗日后方之大陆基地。”（见1949年8月稿《黎天才自传》）黎天才受张学良的倚重，史家称可与郭松龄相比，同为张学良政治生涯中两个最重要的助手。蒋介石也视黎天才非同一般，不止一次单独召见，曾直接委任黎为军委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副处长，黎天才的“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一职，也是蒋氏所授，可见他十分明白黎天才的分量。

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后，黎天才改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他牢牢控制住了政训处，出色地应付与防备了南京方面对西北数十万大军的监控与渗透。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曾当面戏语戴笠，说他的特务系统对如此大事竟毫无察觉。张学良虽未点破这是谁的功劳，而心知肚明的戴笠，早默默地给黎天才记下了一笔账。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授意黎天才，要他找“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见《黎天才自传》）黎天才推荐了罗章龙。此前张学良曾专程往开封，去过河南大学，秘密造访在那里任教的罗章龙。以后黎天才、吴雨铭又安排了罗、张在西安秘密会晤。

张学良同罗章龙的秘密会晤

罗章龙，1896年生于湖南浏阳，中共创建人之一，二至六届中央委员，长期领导工运。六

届四中全会被开除出党后,领衔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非常委员会”在南方和北方的组织先后遭破坏后,罗章龙转入教坛任职。全国解放前后,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等校任教,晚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为全国政协委员,1995 年在北京逝世。

罗章龙 1933 年曾被当局逮捕,经蔡元培营救救出狱,当时国民党要人多次邀罗到南京政府供职,都被谢绝。罗章龙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他在河南大学任经济系主任期间,张学良曾亲往开封拜访过他。这便是黎天才、吴雨铭等牵线搭桥的结果。

张学良去开封,当时的报纸有过记载。南京 1936 年 4 月 25 日《中央日报》载中央社开封 24 日电:“行营主任张学良二十三日由汴飞抵汴,即于午后检军,并参观河南大学,二十四日晨九时离汴飞西安。”张学良去河南大学,校史上没有记载,其实是去拜访了罗章龙。

张学良初访罗章龙的情况,罗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有记述。这次会面,双方都存默识,见面时省却一切繁文缛节,张直入主题,坦率陈述“个人对目前政治抱负与企图,毫不含糊”。(见罗 70 年代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未刊稿)彼此谈话涉及范围甚广,说到今后如何打开僵局,并为今后双方合作奠定基础等问题。会晤中,张还约请罗章龙能到东北大学讲学,藉便“朝夕聆教”。(见罗 80 年代写《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未刊稿)

张学良再次会晤罗章龙,在罗章龙的回忆录中,是他两次赴西安期间。1936 年春,张学良让黎天才请“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是暗示要黎接罗章龙来西安,参与东北军的政治工作。经过黎天才的安排,1936 年 4 月,罗章龙借带领学生去西安实习之便,与张学良见了面。这年秋天,又经吴雨铭的联络,罗章龙再次秘密访问西安,时间大约在旧历七月间。罗章龙这次秘密赴西安,距上一次携学生来西安的时间并不久,但西安形势已渐趋紧张,张学良及东北军、还有西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增。张与罗为什么选此时会晤,会晤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史料没有留下详细记载,当事人也只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回忆。

1936 年,东北大学工学院已迁西安,其余各院仍留驻北平。作为校长的张学良,对东大校址安排及办学方针是有考虑的。他谋划筹建西北抗日基地的想法已渐成熟,按“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的计划,就是要使东大成为培养基层军政干部的基地,以改造东北军,增强部队战斗力。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不仅远赴上海邀请杜重远出掌东北大学,且有意延揽四方人才。通过黎天才、吴雨铭邀请罗章龙来西安的东大讲学,共作图谋,当然也是张学良的希望了。据罗章龙遗稿记载,张学良曾派其秘书吴雨铭,以西安方面代表的身份,频频与他接触,请罗在东北大学讲演,并正式送上聘书。罗章龙也接受了邀请,言商得河南大学同意,准备秋后来“共起炉灶”。只因罗一度卧病不起,旋即西安形势骤变,“兵谏”事变爆发,罗未能成行,张、罗也从此永隔了。

除了邀请罗章龙参加东北军的政治工作,张学良在同罗章龙的会晤中,还多次谈到对西北独立局面的设计与国际联络等核心大事。据罗章龙在《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一文,有简略的记载:张的谈话“渐渐转到国内外政治问题,从开发西北问题到国际旅行问题均极感兴趣……”而且说“千言万语,最后必须付诸实施,我意已决,以后希望随时聆教……”可见张学良对罗章龙的信任与尊重。

1936 年间,西北局势日紧月紧,此时的张学良胸怀大计,急欲开发大西北寻求出路。其间,吴雨铭、李希逸几次来往于西安与开封,与罗章龙设计磋商,又经西安军中众人共议,曾初步拟定了一个改变当前时局的建议和实行方案,就是罗章龙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中所称的“两项计划”。

“两项计划”内容为:

其一为兵变方案: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行兵变,拒绝独夫一切命令视同非法,并以武力逮捕元凶,迫其就范。兵变完成后,即通电全国讨贼,联合全国各界民众力量成立全国民主政府,对内实行民主政治。对

外联合各省军政实力，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

第二步为建设方案，主要以重兵分据陕甘四川地区，利用关中、汉中、河西、成都殷庶人力物力，实行改革内政，发展经济文化，达成富国强兵，经济自给自足，争取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模范重要地区，如此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这个设计中所说的“兵变”，并非指后来发生的“双十二”的“捉蒋”行动，也不单是通常意义上的拥兵自重，它同时还包括建设西北为坚实的抗日根据地，挽救危亡，力争民主的政治远景设计。根据总方案原则，他们还作出具体的详细方案，以便分期付款实施。如对东北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要动员舆论，在军士、学生和市民中组织力量，尤其要“计策万全以防内奸”。（以上引文与上同）罗章龙还接受了东北大学之聘，预定于九、十月间来西安共举大事。

虽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实上述“两项计划”确如罗章龙回忆写成的这些文字，另外，这一方案又是由何人上达张学良的，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求实。但据现搜集到的资料分析，尚可寻到一些佐证的蛛丝马迹：

1936年4月9日夜，张学良曾在陕北肤施（延安）秘密会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周在随后向中央领导详细汇报会谈的情况时说，张学良防蒋已深，但尚无迹象反蒋。张当时曾坦率表明“现在反蒋做不到，但蒋如降日，他（指张学良——引者注）决离开他”。（见《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情况给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但时隔仅半月，情况则大不一样了。参加肤施密谈的刘鼎会见结束后即回中共中央所在地，当他以中共派驻东北军代表身份返回洛川张副总司令行辕时，张学良立刻表明了自己与肤施会谈时不同的新的态度。刘鼎闻之大奇，第二天（4月27日）即以隐语方式写信给中央详细报告了这一出乎意料的情况。到5月2日，短短几天之内刘鼎三次发出给中央的报告，同时负责与陕甘地方实力派联络的朱理治，负责中央联络局机要电台的曾希圣，也分别向中央发出报告，他们报告的内容全部围绕张学良的大幅转变：决心反蒋，预备以11月为变化期。短短



西安事变前的罗章龙

几天内如此频传迭至的情报，如此相似的内容，完全出乎中共的意料。

史迹已很清楚：刘鼎等向中央报告的张学良“实在可爱”的计划，与罗章龙等计策的“两项计划”十分相近。此时，罗章龙、黎天才等的方案，即使还没有达到推动决策人物投入具体实施的程度，但已经从酝酿磋商雏形到有了大致的设计蓝图。所以，不可忽视罗章龙1936年春天那一次进入西安的活动，与张学良惊人变化之间有着联系。

既定西北策划的核心思路第一步是“兵变独立”，下一步是“长期抗战”。对于如何经营西北的具体步骤，黎天才在《黎天才自传》中，有过极为简略的回忆：“他（指张学良——引者注）曾企图作独立政党活动，什么党纲政策以及战时政府组织，都由我写具体方案……”

此后，张学良切切实实开始了西北大联合的部署：加紧与红军合作的步子，在中共地下组织指导下成立了“抗日同志会”；派人四出活动，先后与广西、山西、四川、山东、新疆等地方

实力派联络，甚至为打通河西走廊至新疆的通道做物质准备；把建设西北抗日基地的设想提上议事日程。

事实上，如前所述，“两项计划”的“兵变方案”不是指年底“双十二”的捉蒋计划。史学界共同认定的事实是：尽管张学良早有西北联合的意图和多方准备，但直至11月底，并未决定要采取临潼捉蒋的军事行动，并告知中共方面，让处境十分艰难、准备二次长征的红军，再坚持一到两个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可是，紧接着西安形势发生急变，蒋介石再度坐镇西安进剿，并作出调换将帅的部署，诸多因素迫使张学良在12月上旬下定决心，引发了12月12日的临潼行动。这一变化是“两项计划”的谋士们在作如此策划时，绝对没有想到的。黎天才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即刻安排夫人回山东“探亲”，也是让她悄悄给罗章龙送去消息，以避免盲动和不必要的自我暴露。随着“兵谏”形势的进展，直至12月25日张学良决意送蒋回南京并被软禁，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罗章龙、黎天才这批原想依托张学良和西北方面的力量，蓄势待发，殚精竭虑希望做好一篇大文章的“前共产党人”们，只好悄然画上一个无奈的句号。

黎天才起草“八项通电”

就在罗章龙再访西安与张学良会晤之时，古城西安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蒋介石多次严斥张、杨“围剿不力”，拒绝他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此时又发生国民党省党部特务逮捕马绍周等人的“艳晚”之事，张学良愤然大怒，认为这是蒋介石直接把矛头伸向自己的身边了，决心要杀几个省党部的特务，要黎天才就此表态。黎根据当时情况，分析了利害关系，反对鲁莽行为。他对张学良说，如果有更伟大的计划，借此而起义反蒋，响应绥东，实行抗战，杀几个特务也无妨；若尚无下一步计划，只为痛快，那只能与人以借口，陷自身于不利之境，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张学良听了他的劝告，收回成命，并按黎天才的建议，采取低调处理，平息了这次的纠纷。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赴西安，这是“西北剿总”成立一年后，他以“剿总”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到来，并随同带来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一切都显示蒋此来目的非小，决心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剿共不力的问题。张学良、杨虎城面临如此险峻的形势，不失最后机会，轮番向蒋陈述利害，决心抗日，仍然受到蒋介石的严词拒绝。29日，蒋介石离开西安，以避寿为名去洛阳，实则调集嫡系重兵分布西安周边。其间，张学良仍多次赴洛，不混净谏之心，面蒋时一再陈述停止内战全面抗日的主张，遭到蒋的无理严斥后，决心改取“兵谏”之策。从洛阳回西安后，张学良向杨虎城交底，分头调兵遣将，只待蒋介石再来西安，实施“兵谏”逼蒋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果然乘专车来西安，住在临潼。住临潼本不是蒋行程中的安排，而是临时决定的。因为张学良在洛阳见蒋时，双方发生多次争吵，蒋对张学良已不再信任了。他此次来西安，不仅带来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高级将领，准备接替张、杨之职，而且蒋的嫡系部队也纷纷西移，眼看在西北的一场大规模内战即将爆发。

11日下午，蒋介石忽然提出要见黎天才。黎天才和张学良商量后，于傍晚赶往临潼见蒋。蒋介石早在黎天才为奉系服务的时候，对他的才华便很赏识，曾多次称黎天才是自己的学生。这次在临潼面见时，蒋便单刀直入地问他：“你知道张副总司令是何居心？要干什么？”黎天才不露声色地回答：“张副总司令对委员长居心无他。他近来的抗日主张，乃由于其所属干部一般的情绪反应。……东北军中各阶层之军官，近来因为绥东为百灵庙战役所受刺激极深，人人都自发奋起抗战之热诚。据我所知，他们义正词严的对张有过表示……张副总司令国难家仇，为环境所迫，他今天也有些进步了。”蒋愤怒地反问：“进步了，进步的意义何解？把共产党引到西安来，这叫进步吗？”蒋还指斥西安有许多共产党的宣传品和刊物，可以自由发行，他气愤地质问：“西安管制宣传品检查邮电的是何人负责？”黎天才直告是由自己负责，蒋更为恼火，面红耳赤地斥责：“你在替谁负责？你负什

么责？”蒋介石还拿出一份由手下特务提供给他 的所谓“反动分子”的名单，要黎天才回答对这些人该如何处理。黎天才看了名单，断然否认他们是共产党，提出把他们送出国去读几年书。蒋听了大为光火，说：“我明白对你说，打不完共产党，就谈不到打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都在我手里，你们附和共产党的宣传阴谋，对国家是严重的犯罪。那么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黎坦然陈词：“往年委员长在南昌的时候，常常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说法，我认为时至今日客观形势与以前不同了，今天应该九分政治一分军事就够了。绥东敌方既已开始行动，我们应该有整体性的应战计划。我看到飞机场 上停着那样多的飞机，我认为都应该开到绥东前线……”蒋介石听了这番回答，按捺不住地咆哮起来：“你的说法，同张汉卿前天同我说的如出一辙，不知是你受了他的影响，还是他受了你的影响？……”（以上对话，均引自《黎天才自传》）

这次蒋介石与黎天才长达一个半小时谈话，蒋介石在后来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也有记载：“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早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之深，痛切诫斥之。……汉卿今日行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天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可见蒋也十分清楚黎天才和张学良的不一般关系。

11日晚，黎天才离开临潼刚返回家，即接到张学良电话，要他赶快来。黎到张那里，已是晚10时多。张学良一见黎天才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前些天，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现在我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见《黎天才自传》）张学良决定在12日凌晨发动“兵谏”，他授权黎天才负责整个行动的宣传 工作，定3时多要发出对全国及各地方当局的通电，其中应清楚写明几项行动纲领，对时局的主张，要求黎天才立即起草。黎长期考虑“处处照顾到我党（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当时的政策”，（见《黎天才自传》）接受张学良布置的任务后，可谓成竹在胸，短短一两个

小时内就完成通电草稿，后随张学良赶往新城大楼（杨虎城西北军驻地），会同高崇民等人斟酌商定，仍由黎天才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张、杨通电，提出了西安事变的救国八项主张。张、杨通电和八项救国主张如下：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切实遵循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輿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事变的当天，通电即向全国发出。如此明确的纲领，使西安事变之举，在政治上历史上立于不败。它果然成为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把金钥匙，事变的当事人、调停者都充分地启用了通电和八项主张的内容。不仅如此，通电和八项主张向世人宣告了西安事变所争的不仅在统一战线、民族独立，更在于政治自由、国家民主。此后，以国共两党又一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在全国形成团结一致的抗日战争高潮，西安事变通电与八项主张之功是不可没的。

事变发生之后,张学良将《西京日报》更名为《解放日报》,由黎天才主管。黎天才作为掌管宣传舆论的负责人,将西安事变之真相及通电八项主张宣告于世界各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西安事变以后的黎天才

据史料分析,张学良决心放蒋并亲自护送回南京之举,事前是与黎天才商量过的。虽然黎天才也曾反对张亲自送蒋,但了解张的苦衷及决心之后,还是细心周密地配合了张的行动。

张学良到达南京的第二天(12月27日)曾发给杨虎城、黎天才各一电。给黎的电文是:“天才兄可勿离陕,切实统制幼稚言论。”(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张学良年谱》)电文之意说明张、黎之间必有约定,在张学良离开之后,黎也要“离陕”。不然,为何有“可勿离陕”之嘱呢。黎天才离陕将赴何处呢?据与黎天才同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李金洲回忆:“张副总司令离西安时,曾令随员人等,搭民航机随后赴京……”(见台湾《传记文学》载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可见张在离开西安时确曾与随从人员有过交代,而其中当然主要是黎天才了。张学良到南京后,发现情况有变,才有给黎天才的这份电文。张学良决心送蒋,此行吉凶难卜,事前曾与黎天才商定到南京后的联系方法,编定了亲译电码,各自秘藏在身。张学良到南京后即被软禁,数日不归,真相不明,西安方面非常焦急。延至12月29日,黎天才拟代表西安三方赴南京探视,便电告张学良,很快黎天才就收到张的回电,暗示南京形势险恶,反对黎等前往。因电码用的张、黎所约之密码,黎断定此时张还没有失去自由,便于30日与李金洲、鲍文樾飞往南京。

黎天才等赴南京时,随身带着杨虎城、周恩来、赵四小姐以及东北军将士给张学良的信。下午,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戴笠派人以安全为名将黎天才接到戴公馆,其他人则安排到别的地方。此时黎天才感到情况有异,灵机嘱咐李金洲把部分行李和文件带走,自己到戴公馆等候见戴笠。见面时戴告诉他张学良已受军法审判,

黎不能见他。随后,黎也被软禁在戴公馆。据戴笠讲,黎天才被软禁的原因有二:“一、天才兄担任华北政训处副处长,未能弭患于无形,有亏职守。二、双十二事变前一日下午,蒙最高当局召见,曾受严厉申斥,翌日黎明即发生事变,黎颇有暗中鼓励之嫌。”(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

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发表之后,黎天才更是被严加管束。他曾两次上书,请求去溪口与张学良同处,恰逢戴笠不在南京,信被郑介民扣下。郑劝他不要作此举,如果真把你送到溪口,那你只有随着张先生的命运去了。

“七七”事变后,黎天才在软禁中肾病发作,送入中央医院治疗,出院不久即去了上海,此时软禁才名存实消。全面抗战爆发,戴笠曾拟聘黎为政治总教官诱其入伙,黎坚辞不就。上海沦陷后,戴笠要黎撤往后方,他严辞拒绝说:“我顶天立地做个人,无论如何不会做汉奸。我什么时候做汉奸,你们可以随时打死我。”(见《黎天才自传》)此后,黎天才依然与方方面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独与汪伪没有干系。

黎天才困居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化名王文德,无正式职业,远离政治,对旧友故交都疏而远之。直至抗战胜利后,他才重新介入社会活动,帮人做一点生意。1948年秋,他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在国民党上海交警局系统内,见机进行策反。1949年春天,为迎接上海解放,他又配合中共做工作。上海一解放,他曾协助市政当局在保证水、电正常供应和保存档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后数年间,他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协助政府,提供线索,清捕隐藏的敌特分子。他还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担任区抗美援朝支会副主席。

1955年5月,黎天才以汉奸罪名被政府逮捕入狱,实际是受潘汉年案的株连。1958年被判为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病逝狱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1年上海地方法院撤销了对黎天才的原判,予以平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第一卷)

(责任编辑 方 徨)

清末王爷载涛新生记

● 冯彩章 李葆定

爱新觉罗·载涛(1887—1970),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组副组长,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

载涛曾任宣统朝禁卫军的军训大臣、军咨大臣。九一八事变后,他拒绝高官厚禄的引诱,宁愿摆地摊卖破烂维持生计,也不去伪满洲国在日伪政权中任职。他多才多艺,喜欢交游,尤精于养马骑术,因爱马而名扬京城。

载涛与毛泽东的交往,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6月,当时担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李济深,向周恩来介绍了载涛,并建议邀请载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周恩来欣然同意,并经毛泽东批准,特邀载涛列席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特意找到载涛,不无歉意地对他说:“载涛先生,第一次会议就应该请您参加,您是几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载涛握着周恩来的手,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接着,周恩来十分诚恳地请载涛向政府提出提案,帮助政府改进工作。这下可难坏了这位脱离政事三十多年的清代王爷。他反复思考,觉得自己好像提不出什么对国家有价值的议案,还是好友李济深、蒋光鼐提醒了他:“发挥你的专长,你懂马,就提个军马方面的议案吧!”一句话点燃了载涛心里深埋已久的那种爱新觉罗氏习骑尚武精神之火。载涛不仅爱马,精于骑术,而且深谙相马之术和养马之道,这得益于他早年在皇室贵胄

学堂、法国索米骑兵学校的学习和对欧洲各国陆军的考察,以及他一生对马的潜心研究。

经过认真考虑,载涛很快拟定了一份《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建议:

查现代军事,以机械化为主体。但我国幅员广阔,交通甚多不便,对于军事运用,仍需依赖马力;我国马种马力向未要求改良,效力比较落后。载涛对于马政稍有心得,愿贡献我人民政府采择研讨,以利军用。如蒙议决,自行拟具详细意见书,交由军委会审核办理。

李济深、蒋光鼐看过议案,认为写得很好,并愉快接受载涛邀请,附签了自己的名字。

周总理对这一提案非常重视,很快交给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对载涛的赤诚爱国之心、渊博的军马知识十分欣赏,批示组建军马局,落实军马生产和管理。朱德总司令也发出指示:“马政局归炮兵领导,为加强国防建设,应将军马加以重视,改良育成均应大力地经营和发展,促其确获成就。”由此,人民解放军开始正式筹建马政机构。

1950年8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笔签发委任令,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定为行政13级。从此,一位清朝的王爷成为新中国的一位高级干部。不久,载涛即以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的身份到西北、东北军马场视察,指导军马改良工作。

1954年9月19日,经全民普选,67岁的载涛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年12月21日,他又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出席了政协第二届全

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这一切来得那样突然，不仅载涛本人激动不已，就是爱新觉罗家族的老少成员也无不感到几分荣耀和自豪。载涛百感交集，心中思忖：“我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他怎么知道我载涛呢？”他从内心发出赞叹：“毛主席真伟大，知我者毛泽东也！”他曾对人说：“解放后我是准备隐居的。但想不到毛主席、共产党不嫌弃我，周总理礼贤下士，又把我请出来了。”“毛主席、新社会给我带来三大好处：当上了人大代表，政治上有了地位；当上了马政局顾问，专长得以发挥；有了固定工资，生活有了保障。”他对家人表示：“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报毛主席知遇之恩。”于是，他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倾诉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

载涛当上马政局顾问之后，立誓要报毛主席的知遇之恩。他不顾花甲高龄，坚持骑自行车到离家20多里的马政局上班，两年多从不迟到，也未请过假。他常年奔波于各军马场视察军马生产，传授改良马种技术，为部队的军马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如果说载涛把提议任命自己为马政局顾问视为毛泽东的知遇之恩的话，那么毛泽东拿出自己的稿费为载涛修缮住房，更使载涛感受到毛泽东对他的深情厚谊。

一天，载涛正在开会，突然家里来电话告诉他北房塌了个大窟窿，要他赶快回去修房。同志们关切地问他出了什么事，他风趣地说：“老天爷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么修得起房子啊！”

新中国成立之初，载涛有出卖房产所得6000万元（旧制人民币，约相当于新制人民币6000元，下同）。他在1950年至1952年购买胜利公债1000份；合人民币2000万元；捐献飞机、大炮约400万元；兴业公司入股500万元；水灾捐款约400万元；前妻埋葬及迁移费约1800万元以上，共用去5200万元，下余800万元补助每月生活费不足。每月顾问薪金1243000元，房租66万元，共收入1903000元，每月开支约200余万元。显然，载涛当时生活上出现的暂时困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慷慨

购买国家建设公债和捐款。

这件事让毛泽东知道了。在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说：“听说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万元，给先生修房。”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的这笔稿费，即由章士钊先生专程送到载涛家里。载涛接到这笔钱，激动得流出了热泪，深情地对章士钊说：“非常感激毛主席对我的关怀。”

送走了章士钊，载涛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他提笔疾书，第二次给毛泽东写信，再次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

毛泽东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位伟人，他与有着特殊经历和身份的载涛之间的情谊，还体现在对待载涛家族的亲情上。

1955年7月5日，载涛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大会休息时，周恩来见到载涛，同他热情握手，并把载涛介绍给毛泽东：“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父。”毛泽东亲切地同他握手，对他说：“听说溥仪学习得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载涛激动万分，连说：“好，好，我去看看他们……”

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派人专程到载涛的住所对载涛说：“毛主席给了你一个任务，去看看你多年不见的侄子吧！”市政府还为他们安排去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溥仪等人的具体事宜。

1956年3月10日，载涛携两个侄女，带着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心，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侄子溥仪等人，互相倾诉了别离思念之苦。溥仪与载涛一改昔日的君臣称谓，恢复了正常的侄叔之情。载涛按捺不住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向家族亲人讲述了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周总理夸奖皇室成员在狱中的进步，关心溥仪的学习，并让载涛专程来看望等情况，使在场的家人都感动得泣不成声。

三年之后的1959年12月4日，溥仪获特赦，回到北京。

（责任编辑 舒元璋）

献“常林钻石”姑娘的 曲折人生

● 石为开

1977年12月21日，山东省临沭县华侨乡常林村21岁的姑娘魏振芳，与生产队的女社员一起扛着铁锹到田间翻整土地。夕阳西下，社员们都陆续收工了。魏振芳挖完自己所分的地块，正要收工回家，忽然发现邻近地头上还有一片茅草没有挖完，也不知是谁撂下的。于是她便走过去，挥动着铁锹挖起来。当她挖第二锹时，突然从茅草里滚出一块鸡蛋黄大小的东西，魏振芳好奇地捡起来一看，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据县志记载，临沭县处在沂沭断裂带上，1668年常林村一带曾发生过8.5级的大地震，被称为“旷古奇灾”。正是因为地震作用，地下岩石错动断裂，使经亿万年间形成的天然金刚石被冲击到地表，于是，临沭县成了我国著名的金刚石产地。

魏振芳没有上过一天学堂，自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她知道眼下手中的这颗晶莹的矿石“是块大金刚钻”！惊喜不已的魏振芳捧着宝石急忙赶回家，父亲那双发抖的手托着钻石，脸上的表情很难看出是惊喜还是惊恐。这位从旧社会过来的饱经苍桑的老人，不由地浮现出40年前罗佃邦老人一家的遭遇。

1937年秋天，离常林不远的罗家莫疃村罗佃邦老人，在金鸡岭做农活时，从雷草沟内捡到了一块重达281.25克拉的巨大天然金刚石。有个叫王善新的老乡，在上海做皮货生意，得知罗老汉捡到了大钻石，便提出用40亩地、两头牛、一辆车换这块钻石。罗老汉不换，把钻石藏了起来。到了1938年，附近南朱庄的朱英三和朱喜品投靠了日本鬼子，两个人找了借口把罗老汉抓到据点，关押了一个多月，逼迫他交出钻石。罗的家人为了保住性命，无奈地把钻石交给这两个汉奸。惨无

人性的汉奸为了不泄露风声，竟残忍地把罗老汉一家七口全杀了。村民不满这两个汉奸的行为，向李庄警察局局长李学俭举报。李学俭派人捉来朱英三和朱喜品，把钻石弄到手后，又把这两个汉奸杀了。不久，驻临沂的侵华日本顾问川本带着一队人马来到李庄，把李学俭请到临沂城，就再没见他回来。后来，这颗钻石终于被日本人掠去带回了日本。

全家老少围坐在炕头上，听着父亲讲述往事，看着那块不知

能给家人带来福还是祸的钻石。母亲瞅着眼前这个在磨难中长大的女儿，禁不住热泪长流。魏振芳的父母一共生了8个儿女，4男4女，她就是老七，下面还有个弟弟。魏振芳是母亲在讨饭的路上生下的。

“娘，你是说俺命里担不起这个金刚钻？俺是要饭的命？那就把它扔了吧，谁拾去咱也不眼红，只要咱全家人平平安安。”魏振芳说完，扑进母亲的怀里哭起来。

最早获悉有人捡到钻石消息的是附近八〇三矿的领导。矿党委童书记听说后，立即乘车赶到临沂市，向地委书记朱奇民反映了此事。朱书记听后非常重视，马上派地委的朱胜利等人随童书记一起到临沭，找到公社党委书记玄德印和李加廷的宿舍。童书记说明了来意，并传达了地委朱奇民书记的指示。一是抓紧时间找到捡钻石的人，把钻石保护起来，绝不能让投机倒把分子弄去；二是要注意保护魏振芳一家的人身安全；三是请公社负责同志配合，做好魏振芳家人的思想工作。

李加廷等人走进魏家，已是深夜。魏父说：“别听外边瞎说，俺闺女拾的是块马牙石，哪有什么钻石啊？”李书记笑着说：“小魏拾的是钻石还是马牙石，让矿上的

技术员用仪器一测就知道了。”

魏振芳坐在父母身边，欲言又止，眼睛里隐藏着一丝不知所措的神色，一会儿望望父母，一会儿看着满屋的来人。

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魏振芳终于开口：“那块石头被大哥拿去了。”李书记便让小魏去找大哥，大家等了两三个小时，魏振芳回来说：“大哥说给了二哥了，我到二哥家，二哥说给三哥了，我又去了三哥家，三哥说给了四弟，我去敲四弟的门，他说又送给大哥了。唉，转了一圈也弄不明白在谁手里。”

听了小魏的话，李书记当下决定，派管区老卓同志找村里的干部，让一位村干部陪一位随李书记下来的同志，分头到小魏几个哥哥家，耐心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不久，小魏几个哥哥陆续来了，李书记询问了几句，断定他们不是在做游戏，一个转一个地传着，是防备外人摸清底细。

拂晓时，魏振芳的几个哥哥终于把钻石拿出来，大家睁大眼睛望着，这块钻石用红白两种布包裹着，八〇三矿技术员小刘通过鉴定，又称了称，告诉李书记：这是一颗罕见的天然特大钻石，重量是158.7869克拉。

天已大亮，县里的领导就闻讯赶来了。

魏振芳一个哥哥发话了：“这块钻石是俺魏家的传家宝，俺要自己留着，好传给子孙后代。”

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坐在那里一直不声不响的魏振芳父亲身上。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似乎是经过深思熟虑，突然发话了：“自从振芳拾到这块钻石后，这两天全家人没睡个好觉，没吃顿安稳饭。俺也说不清这块钻石会给魏家带来福还是忧，俺寻思着，要是在旧社会一家人就要大祸临头了，断送了全家的性命啊？当然啦，现在共产党当家了，这块钻石是谁买也不卖，谁要也不给，俺要领着闺女到北京，亲手把钻石交给华国锋主席……”

父亲的话一锤定音，几个儿子再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的。

1978年1月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向全世界发布了魏振芳拾宝献宝的消息，使她一夜之间成了轰动国内外的名人。

为了表彰魏振芳的爱国精神和贡献，国家要给些物质奖励，领导征求她的意见，她想了半天，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俺大队里太穷了，连台拖拉机都没有，要奖的话就给俺大队买台拖拉机吧。”再问她自己要什么

时，她摇摇头再没说什么。在场的人听了，一股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把宝石献给了国家，她想到的是大队，唯独没有想到改善一下她那贫穷的家庭。

1978年1月7日上午，中共临沂地委、临沭县委、原炭山公社党委在公社驻地曹庄召开了千人庆功大会。会上，领导给魏振芳披红戴花，奖给她千元奖金，给她办理了农转非户口，安排她到八〇三矿当了工人。国家也答应了她的要求，奖给常林大队24马力拖拉机一台。

国家在奖励魏振芳的同时，也对临沭县及炭山公社给予一定奖励。国家奖给临沭县100万元，后来县里用这笔钱建了一个常林针织厂。奖励炭山公社20万元，公社利用这笔钱建了岭南头电灌站，大大地改善了当地的水浇条件。

很快又传来消息，这块特大天然钻石被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命名为“常林钻石”。中国科学院经全面鉴定，认为它色泽透明，呈淡黄色，具有金刚光泽，折光能力特强，光彩夺目，是迄今我国发现并保存下来的最大的一颗钻石，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科学家认为，这颗金刚石对于地球科学的研究、寻找原生矿及研究天然金刚石形成的环境等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魏振芳成了大名人，全国各地纷纷邀请魏振芳前去作报告，让她讲如何发现钻石，又如何献给国家的。每次报告都让魏振芳感到别扭和犯愁。因她没上过学，作报告前两三天，领导便安排秘书根据当时时髦的政治口号，为她写好讲话稿，再一句句地念给她听，教她背。

后来不管上边开什么会，也不管跟她有无关系，县里都要派她跟着参加。时间久了，魏振芳感到自己好像是供人们观赏的一件展览品，一个被人们摆来摆去的木偶人。

魏振芳说她是幸运的，1978年8月，魏振芳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第4次妇女代表大会。期间，她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颖超和当时的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的亲切接见。1995年9月，魏振芳还参加了联合国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并被大会定为重点采访对象。9月16日，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播放她的专题节目，使人们又重新目睹了这位17年前献宝姑娘的风采。

魏振芳17岁，母亲就给她找了婆家。未婚夫叫李

洪轩,是离常林村5里路的东郭疃村青年农民。他们于1972年12月22日正式订婚,魏振芳因献宝一夜之间成了大名人,那时他们已经恋爱8年了。

李洪轩是勤劳朴实、性格内向的农村汉子,平时喜欢独来独往,不善话语,但却很有个性。当他看见未婚妻因拾宝而身价骤升时,感到自己配不上了,白天躲着魏振芳走,夜里一个趴在被窝里哭泣。有时魏振芳到婆家找他,李洪轩便找借口不见面。渐渐地,魏振芳意识到了未婚夫的顾虑。她找到李洪轩,动情地说:“洪轩,你放心吧,在我心目中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如果你同意,咱们就结婚吧。”为了表明自己的感情,不久两人便领取了结婚证。

魏振芳结婚1年后,国家又给农民身份的李洪轩转了户口,在县水泥厂做供销工作。接着,魏振芳生下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叫李明。双喜临门,小夫妻沉浸在幸福和快乐之中,对美好生活充满了憧憬。

在八〇三矿场时,魏振芳本来可以任意挑选一些轻松的工作,但她却向组织说,自己没有文化,能力有限,要求到劳动最繁重的水晶石车间当一名拣石工。这项工作整天用锤子敲打挑选闪光的石英石,不比她在家做农活时轻松。不久,她被调入临沭县矿产站工作,还是做那种“铁锤声声石尘飞扬”的工种。她早晨总是第一个来车间打扫卫生;收工时总是最后一个走,不管有多累,她心里都感到充实,觉得人活的有价值,这样一干就是十几年。

1984年矿产站改为公司,在选举公司领导班子时,魏振芳以全票当选,当领导找她谈话时,她却说:“我能

力有限,当个助手吧!”于是,又进行第二次选举,还是以全票当选。最后,还是遵照她的意见,当了经理的助手,因她工作勤奋,没有名人的架子,关心职工的生活,被职工称为自己的“贴心人”。

1998年6月,她被选为厂工会主席。由于她工作勤奋,群众威信高,先后被评为“山东省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可魏振芳又是不幸的。1980年,魏振芳患了乳腺癌,在领导关心下,在山大医院做了手术。直到1985年才痊愈。

祸不单行。1990年,李洪轩到临沂城办公事,被扒手掏走了数百元公款。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回到家,在妻子面前失声痛哭:“振芳,你跟着我……没用啊!”当时,妻子已经8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和其他特困职工一样,家庭生活非常艰难,李洪轩觉得愧对妻子。魏振芳得知详情后,含泪笑着安慰道:“他爸,别难过,破财免灾,伤了身子可不值得。”

不久,由于李洪轩在单位的压力太大,又因公款被偷精神受了刺激,精神失常了。自己是特困职工,丈夫又患了精神病,这日子可怎么过啊!生活的艰难对魏振芳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面对着神志不清的丈夫,魏振芳流着泪说:“他爸,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治好你的病。”从此,她领着丈夫跑遍了山东、江苏等地的大小医院,用了数不清的偏方,借下了一屁股债务,把一腔爱倾注在了丈夫身上。期间,她流了多少泪,吃了多少苦,自己也说不清楚。3年后,妻子无微不至的关爱,终于唤醒了李洪轩的神志。

近几年李洪轩单位也不景气,一对夫妇都拿不到工资,还要供孩子上学,生活更加艰难,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更没有阻碍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去年,儿子李明高中毕业参了军。今年,儿子要考军校,来信让妈妈凭她的名人身份找找关系。魏振芳回信说:“儿子,不要靠妈妈,要凭自己的努力,人吃苦才能有甜。”李明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他在电话上说:“妈妈,我能理解你。”谈起儿子,魏振芳的脸上写满了自豪。

尽管魏振芳夫妇生活陷于窘境,可她从不好意思向组织要求帮助,倒是县委和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看到她生活的清贫,考虑到她的贡献,主动给她调动了工作。1999年7月,魏振芳被调入县建委做工会工作。她是个知足的人,她说:“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生活清贫一些又有什么?” (责任编辑 刘家驹)



魏振芳和丈夫在自己后院劳动

编者按：本刊特邀编委欧远方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1年4月不幸去世。李锐同志写来祭文，特发表如下，以示悼念。

“以文会友”，“一见如故”，正好形容欧远方同志与我的相识。我们过去没有见过面，近年来由于对一些问题的共识而接近，他寄我《陈独秀研究》的期刊，远道赠《安徽老年报》。去年他到北京，来我家中见到第一面又是最后一面。那天我还找到我的邻居老同学杨纯，他们在新四军共事过，一起话旧并议论形势。

这次来合肥参加第十四届中华诗词研讨会，第一天在会场上见到欧远方夫人邹人煜，她将《悼远方》的四首七绝与我，读罢为诗中真情感动不已。五十年患难相依相伴，突然永别，“琴声戛断失和弦”，怎能不“后行实比先行苦”！散会后，夫人同我谈到，远方有心脏病，一直忘病工作，去世前八小时还在写文章，“扼腕岂因伤寿短，才思满腹付东流”。战争年代和解放后，远方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在宣传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担任领导。这方面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其中甘苦与磨难自有同感。夫人简要地同我谈到远方一生的三大段：早年实现自我；中年丧失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可说是反朴归真。从安徽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联谊通讯》（2001年第2期）“纪念欧公”的专辑上，十多篇老同事老朋友怀念文章反映，“丧失自我”的第二大段时间，他并非完全丧失，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而且尽可能地保护或照顾一些受难的同志，大家都怀念他“为人忠厚和善，作风民主”；“许

多老记者、老编辑、老工人都热爱欧公”。欧公晚年的辉煌，大家都共知乐道。他的“博学多才，敏于思考，勤于钻研，厚积薄发”，在晚年得到充分的发扬和施展。这是一个不怕死的老头，利用一枝笔，为中华民族百年向往的民主与科学的实现而奋斗不已。他反复研究《共产党宣言》，认为“宣言”也很注重个人和人类的自由与民主，丢掉老祖宗这一追求，就不是真马克思主义。虽然遭到某些“左”的同志的责难，他一笑置之。

夫人谈道：在最后二十年，远方日夜所思、尽付笔端的有三件大事：一是上述为马克思所追求的国家要民主化、科学化，如何得以实现。二是，“常忧风雨问民情”。他非常关心并了解农村情况，认真总结过去这方面走过的弯路。他曾为粮食收购中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三是，重新研究党史上的一些重大旧案，反复查阅资料，组织座谈，写出文章，如对陈独秀问题的重新探讨，追究历史原貌，认识陈独秀晚年回归民主、科学。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影响，过去不为史界注意，现在也正还历史以公正。关于项英的问题，也作同样的努力，认为当年下结论太快了。

重新研究认识1949年至1976年大弯路的老同志和专家学者是很多的，但从理论到实际，作深入全面的清理与研究，得到大的成果的，却不很多。因此，我们对欧远方同志的突然

辞世，感到深深的痛惜。

2001年5月27日于合肥

继承欧远方遗志

• 李锐

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人生轨迹

● 尹 骥

人们创造历史,历史同时又决定着或改变着人们的命运。在非常年代的历史关键时刻,对于一个人的命运改变乃至对于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往往是始料不及而又是影响深远的。

茅盾在1927年的经历便大抵如是。我们要了解他的思想发展及其文学道路,考察他在这一年的丰富而又独特的人生经历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因为这一年不仅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大转折的一年,同时也是茅盾个人在革命道路和文学道路上的大转折的一年。

一

出生于1896年的茅盾,20岁的这一年(1916年)的夏天,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开始了文化人的职业生涯。最初他只是翻译一些外国通俗读物,参与编辑《学生杂志》一类的小刊物。“五四”运动后才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1921年初,他参与发起成立了著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文坛上竖起了一面“为人生”而写作的旗帜。同时他接编了影响很大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文艺批评论著,着重介绍了外国各种文艺思潮,包括1925年发表的当时被认为是最激进的苏俄文艺思潮《论无产阶级文艺》。经过上述数年间卓有成效的活动,茅盾确立了他在文化界作为一位著名文学活动家的地位。在文艺思想方面,他以敏锐的眼光和“拿来主义”的态度,吸

收并接受了以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为主的思潮,同时又以不断进取的精神,开始介绍苏俄的“无产阶级艺术”。虽然当时的所谓“无产阶级艺术”还是很“左”的拉普派占统治地位,茅盾也只是泛泛地介绍而已。

和上述文学活动相比,茅盾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发展及其实践活动是更值得重视的。还在1920年底,他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并为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共产党》撰稿。1921年春天,他正式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他成了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在此后的数年间,他的公开社会职业是文学活动家,但他同时担当起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家的角色:根据党的工作需要,接受党和组织安排的各项政治任务,如担任党中央和各地的联络工作,到党所办的平民学校、上海大学去任教,参加党领导的罢工斗争和群众运动等等。尤其重要的是茅盾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积极参与了国民党左派的一系列活动,直到担任国民党左派的上海特别党部的宣传部长,被选为代表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又出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成了代理部长毛泽东的助手。

历史表明,茅盾在1927年之前的人生道路大体上是平坦顺利的。无论是文学道路,还是政治道路,都可以说是积极进取,勇往直前,并且成绩卓著。如果没有1927年的风云突变,没有1927年的曲折坎坷,茅盾的人生道路沿

着原有的轨迹发展下去就可能是另一种前景，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二

1927年新年伊始，茅盾就按照党的要求从上海到达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

中央军校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在广州时期，学校里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以蒋介石为代表实际上占了主导地位。武汉建立的这所分校，虽然名义上仍是蒋介石担任校长，但实际上已经完全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担当主角了。蒋介石远在南昌前线已是鞭长莫及，学校的实际领导工作由教务长邓演达负责，日常的校务则由恽代英主持。武汉分校的这种局面正是当时国共合作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形容国际政治斗争领域的特点时引用《红楼梦》里的那句有名论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历史实践证明，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在反帝和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方面两党有着共同的或相似的目标，但也勿庸讳言，合作从一开始就有着同床异梦各有所图的内在矛盾。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便使这一矛盾直接反映到了各个领域和各个具体组织机构之内，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更使这一矛盾日益尖锐化表面化，直到发展成为公开的冲突。如果说在1926年3月之前，国共合作还处于相对平稳，即被某些史学家称之为“蜜月期”的话，那么随着共产党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影响和力量的不断攀升，到了3月中旬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后，国共之间矛盾就日益公开激化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党虽然都表示要继续维持和推进合作大业，但又都在实际活动中继续加强与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更加紧了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共产党内的左派则大力推进工农群众运动，特别是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运动。而国民党内的左派和中间派以及共产党内的右倾人物面对上述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则忧心忡忡，举棋不

定，虽然仍在不断努力维护国共合作局面，但又很难有所作为。

茅盾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于1927年1月赶到武汉任职于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不过他在这里工作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4月初就又被党派到汉口《民国日报》去当主笔。此次工作调动再次反映了国共两党当时在各个领域争夺阵地的错综复杂形势。当时武汉只有两张大报，一是《中央日报》，一是《民国日报》。前者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部长顾孟余对该报抓得很紧，其新闻导向受国民党右派势力控制。《民国日报》则完全由共产党包办，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新闻导向不言自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张报纸更多的是反映了以董必武社长为代表的党内左派观点，而右倾的中宣部长彭述之的意见则往往受到抵制。例如大量报道各地的工农群众运动，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逆流等。茅盾作为报纸主笔，其言论也代表了党内左派意见。



1923年的茅盾

茅盾在《民国日报》任职只有3个月时间（从4月中旬到7月上旬）。这3个月正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国共从合作走向分裂的最严峻时刻，其中包括上海的“四一二”事变，湖北的夏斗寅叛变，长沙的“马日事变”等等，最后则以宁汉合流为标志宣告了国共合作的结束。国共合作破裂后，茅盾立即辞去《民国日报》工作，表示了同国民党的决裂，并且不理睬汪精卫的“挽留”，随即按照党的指示于7月中旬从武汉赶到九江。中共中央的意图原是要让从武汉撤出的一批党员经九江赴南昌参加计划中的南昌起义，但因从九江到南昌的铁路交通临时中断而使许多人行程受阻。在此历史转折关键时刻，有的人千方百计（包括徒步行走）辗转前往南昌，茅盾则设想先上庐山然后绕道去南昌，不料忽患疾病而难以成行，最后不得不选择党曾经交代过的“不行就回上海”这条路。茅盾的这一选择有很大偶然性。然而正是这一偶然的选择，却从此结束了他作为一位共产党员、一位大革命时代左派政治活动家的历程。

三

8月中旬，茅盾回到上海后由于已经知道自己上了国民党政府通缉的黑名单，就隐蔽在自己家中，足不出户。除邻近的叶圣陶、周建人以及稍后到沪定居的鲁迅外，基本上杜绝了和外界的交往。这样的隐居生活整整过了10个月，直到次年6月去日本。这段时间在茅盾的人生经历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接连写出了三部连续性的中篇小说，即《幻灭》、《动摇》、《追求》。这三篇作品的面世，不但标志着茅盾在文学领域内活动空间的重大拓展，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兼翻译家的同时，又以文学创作家的姿态挺立于文坛之上，而且具体实践了他的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文学创作思想，并由此而开创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作为文学巨匠的发展前景。

在这段时间里，另一件值得关注的事就是茅盾作为一位革命政治活动家的历程的中断。

这在茅盾的人生道路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转折。因为在这长达10个月的隐居期间，他没有设法去寻找党的组织，接受党的新指示和新安排。这是违背了党的既定“党规”的。在此期间先后回到上海的许多党员都是先找党的关系而后决定个人的行止，例如创造社的潘汉年几乎是和茅盾同时从江西回到上海的。他一到上海很快就找到了党的组织接上关系，此后就一面从事文化活动，一面接受党的安排，不久就到中共江苏省委去工作。茅盾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客观上他的名气大，熟人多，已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一旦被人认出，就有被捕被迫害的危险，但主观上的原因也是不能回避的。茅盾在回忆录中说：“那时，我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但是这个习惯在我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立思考一番”。按当时的实际情况，以茅盾的社会关系要找到党的组织或取得和党的联系应该并不困难，问题就在于他要“停下来”“独自思考”，而不愿像别的人那样“紧紧跟上”。然而作为以严密组织和严肃纪律著称的共产党组织，在通常的情况下是不能允许她的成员“停步不前”和游离于组织之外的。直到1928年6月，茅盾决定到日本去也并不像郭沫若东渡那样按照党的指示精神行动，而是自己独自的安排，这就意味着他已脱离了党的固有轨道。他这10个月的行动后来被认为是“脱党”性质问题也就并不奇怪了。他到日本后虽然已可公开活动，但也没有同党组织联系上，直到1931年他向瞿秋白谈到上述情况并要求恢复党的关系时，也没有能够得到党的同意。这固然和当时党的路线“左倾”有关系，但既事出有因，茅盾也无可奈何。从此，茅盾的政治身份事实上就成了一位非党的革命

“同路人”，虽然仍被称为革命文化战士，但同党的关系确已今非昔比。这只要看一看他后来在左联内外的活动情况及特殊的某种“桥梁”、“中介”地位便可明白。1940年茅盾在延安时，曾又一次提出恢复党组织关系问题，但这时的国内形势发生巨变，党从更高战略角度考虑，认为把他留在党外比回到党内更有利于革命大业，茅盾也就只好把自己的心愿搁置起来，从此更加积极而温顺地担当起“朋友”的角色。此后又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直到1981年3月在他病危临终前夕，才又将自己的心愿提出。虽然他自己未能亲耳听到中共中央在他死后4天才做出的“恢复”他的党籍的决定，到底也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的历史和长久的心愿有了一个交代。

四

茅盾在1927年秋冬之际所写的小说《幻灭》、《动摇》以及次年春夏之交所写的小说《追求》，对于了解和研究茅盾的文学思想和政治思想都具有重要价值。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茅盾以真实反映现实生活为创作主旨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可以透过他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看出他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还被反映到了他后来的长期生活历程之中。

谈到写作《幻灭》等小说的动机时，茅盾坦言：“过去大半年的波涛起伏的生活正在我脑中发酵，于是我就以此为题材……写我的第一部小说《幻灭》。”“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历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写作了。”关于写作的态度，茅盾说：“我提倡过自然主义，但当我写第一篇小说时，用的却是现实主义。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实

践证明，茅盾的确是真诚地严格地按照自己的主张写作的。

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茅盾自1921年加入共产主义小组，随即又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以后，对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是坚定不移的。在国共合作期间，他一直坚守共产党员的立场，按照党的要求工作。即便是在1927年上半年的武汉，在国共两党矛盾已日益激化、政治斗争形势极为复杂严峻的时刻，他也仍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坚定性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例如在他主持的《民国日报》上，积极支持各地的工农群众运动，对国民党的右派势力进行反击，直到毅然辞职并拒绝汪精卫的拉拢。然而当国共分裂、大革命遭到完全失败后，茅盾的表现却有他个人的独自特点：他没有像很多党员那样“紧紧跟上”党的步伐，立即追赶并加入革命队伍的战斗行列（例如像粟裕等人从武汉撤出时，因晚了一步，没有赶上南昌起义而是步行追踪，终于赶上了起义部队，或者像潘汉年等人一回上海就立即找到党的组织参加地下斗争）；他也没有像一些党员那样对革命完全失去信心，从此消极沉沦甚至退党，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是暂时“停下来独立思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进行一番历史的反思。

茅盾的上述表现，不仅是由于他的个人性格所决定，更是由于他作为一位学者型的文化人的思想特质所决定的。他的历史反思的具体成果，就是创作了以大革命失败前后的现实为题材的《幻灭》等三篇小说。我们正可以从这三篇小说中看出茅盾当时的对现实对革命的具体理解和评价，而这样的理解和评价又正好真实地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文化的人的思想特质。小说《幻灭》和《动摇》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和茅盾在武汉时期的经历大体上是同步的。小说的内容大都是他在那里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他作为报纸的主笔，接触到了很多生动具体的现实情况报道，他“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写下了那真实历史的一页。而这一页又是我们在当时的许多政治报告和后来的大量历史文件中所不曾见到的。茅盾的小说中，特别是在

《动摇》里向我们提供了许多真实的历史细节和形象的历史画面,包括革命运动中的种种负面情形:群众中的狂热、盲动和过火行为,投机者的无耻钻营,领导者的幼稚懦弱,新潮人物的罗曼蒂克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茅盾在武汉时就已亲身感受,回到上海后不能不痛切反思的。这种反思当然很难说已使茅盾改变了对革命和对未来的信念,但又不能说,已使他感到困惑、迷茫甚至悲观:革命究竟往何处去?中国革命的道路到底该怎样走?由于一时尚不能认清前面的道路,所以在前进的道路上,茅盾暂时停顿下来冷静地思考一番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五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所进行的这一番“思考”或称为“历史反思”对茅盾个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他当时以及后来的种种经历中又能够看到或者印证什么呢?

在此之前,茅盾不但是一位知名的文学活动家,而且是一位知名的革命活动家,一位激进的政治家。当这两种身份出现矛盾即当革命和政治需要时,他服从政治需要而基本上放弃了文学活动。从1925年冬天到1927夏天,他应该说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更为贴切。而从1927年下半年即在他“停下”了革命的步伐转入“思考”之后,文学家和政治家的角色实际上就发生位置的转换了,此后则以革命文学活动家为主业,在革命政治家的行列中,他已成了一位边缘人物,或者说只是一位配角了。当然,两种身份及其位置的转换,并没有什么上下高低之分,毋宁说茅盾后来所处的位置或许更适合于他个人的性格特点:习惯于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走极端。实践的结果也是于革命政治于革命文学都大有裨益的。在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内部的矛盾纠纷中,在40年代国统区的文学统一战线活动中,茅盾的积极而又独特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的。

从茅盾的历史反思中我们又能看出,他作为一位学者型的文化人在参加激烈的革命政

治斗争过程中,常常因为自己的独特视角与革命的汹涌潮流在认知上有差异,因而会产生内心的矛盾迷茫。例如在武汉,他亲眼目睹了各地农民运动中的许多消极资料,内心便深感困惑,他无法站到所谓政治大局的巅峰,忽视或无视现实中的阴影,因而做不出政治家可以大胆断言的那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的结论。因此他在小说《动摇》中写出了的那些幼稚盲动甚至荒唐的历史细节(如把地主的小妾、庙庵里的尼姑分配给光棍之类),让人们看到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某种疑虑与保留。反映了他即便在作为职业政治活动家的时候,先前已经形成的学者型文学家的性格仍在起着重要作用,即人们常说的“书生气”使他更多了一层与众不同的视角。这也可以说,在茅盾的身上,明显地反映出了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双重性格特征以及在某些时候的互相错位现象。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抽象概括,不妨说在茅盾的性格组合中是由文学人和政治人的两组重要元素构成的。他既不能像纯粹的文学人那样刻意保持着与政治的某种距离,又不能像纯粹的政治人那样只看重政治运动的谋略与结果,而并不在意其方式与过程的流弊。

历史实践表明,茅盾是一位热情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始终关注着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始终坚守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进退有度。他的这种双重性格特征在1927年的历史大转折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后来也一直被延续着和不断地展示着,直到晚年。不论在他的社会政治活动中,还是在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活动中都基本如此。如果拿他同时代的若干文化人相比(如郭沫若、周扬、巴金、沈从文等),那就更为清楚了。

(责任编辑 方实)

白族文豪赵藩

● 刘冠群

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悬挂着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对联以发人深省的内涵和端庄稳健的美感形式，使中外游客耳熟能详，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可是，联文的撰写人赵藩却逐渐地被忽略、淡忘。

赵藩，白族人，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正月初七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府剑川县向湖村一户书香人家。父亲赵联元是一位儒师。赵藩自幼从父博学经史，涉猎百家诗文，青少年时便成为乡里中出类拔萃的人材。在县、府、省的科举考试中，赵藩一帆风顺，以优异成绩补弟子员、补廪。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省试，举乙亥科第四名。但后来多次进京应试，他的真才实学因粥少僧多，璞玉难售，均遭失败。他从光绪元年第一次进京参加次年丙子科会试，到光绪十一年第五次进京应试，都落第而归。往返十二年，跋涉数万里，他没能跳过那通往蟾宫的龙门。然而赶考的失败不等于他人生的失败。由于他离开偏僻闭塞的山乡，长期奔走于滇京道上，饱览了中华大地的名山大川，开阔了心胸，目睹了民间疾苦，了解了民族和国家的灾难，结识了诸多人物，提高了认识，充实了头脑，这对于他一生的政治和文艺生活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赵藩从13岁开始写诗便崭露才华。他奔走仕途，官可为则为，不可为则弃，而诗则不可不作，直到77岁弥留前还赋七律八首。这64年间，从未辍笔于诗作。据《赵藩诗词选》编后记中介绍，赵藩“存诗七十余卷，不下万数千首”。但刊行的仅《向湖村舍诗初集》十二卷，《小鸥波馆词钞》八卷，《桐花馆梦缘集》二卷，现藏云南省图书馆。“其余手稿、抄本均于十年浩劫中被查抄，荡然无存”。他在诗中表达了热爱中

华、反对侵略、热爱人民、揭露清廷腐败的浩然正气。

1879年，赵藩进京应试期间所作的《观音土》与《小儿哭》，都是以白描手法刻画出河北、山西一带在大饥荒年间惨绝人寰的典型图像。

观音土

万落千村空雀鼠，树皮草根俱乏煮。
翳桑幸有观音土。观音慈悲悯尔饥，
食之一饱还西归。不食亦死食亦死。
且缓须臾对妻子。妻子号啕泪如雨。
顷刻彭亨腹如鼓。吁嗟呼，观音土。

小儿哭

小儿哭，泪簌簌，白日惨昏风刮屋。
西家杀儿啼声哀，东家小儿观之回。
回家娶媳告阿母：吾家可须儿作俎？
屠刀在颈儿心悸，果欲杀儿俟儿睡！

在那慈禧垂帘听政的年代，一片歌功颂德声中，赵藩能够如此淋漓地反映民间疾苦，实属不易。

同年，昆明苦雨近月，赵藩写了一首《喜晴》：

昆明城中几弥月，东南注下四庐没。
男襁女负踏波啼，老稚扶携上城堞。
城堞无栖雨不止，此时真美高门里。
高门清宴罗倚娇，镇嫌风雨妨笙箫。

这与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比，并无逊色。

赵藩还写过许多爱国主义的诗篇。如：

中法战争时，当他得知官兵在越南大破法军，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写下了绝句六首，今选其一：

露布飞来喜欲狂，出关此战最堂堂。
投签秘殿天颜喜，吹角连营士气扬。

赵诗中，对历史人物的描述评论，很能体现他的历

史价值观。如《汤阴谒岳忠武庙》：

长城南渡坏，遗庙故园新。宰相自谋国，孤臣宁惜身。
风波三字狱，忠孝一家人。松柏西湖远，蒹葭微雪春。

隆中谒武侯祠

高冈云气湿蒙蒙，卧龙犹疑尚此中。
大好溪山名士宅，不轻出处帝臣风。
立谈早定三分局，异代犹尊一亩宫。
祠宇西南瞻拜遍，参天松柏共青葱。

赵顺平侯祠

关张当代并英雄，簇拥真龙入蜀中。
破敌齐推名将胆，引君尤见大臣风。
三分割据归时命，百战勋名善始终。
仰止常山家庙在，停车人揖夕阳红。

这些诗篇中都洋溢着诗人崇敬的感情，爱憎分明的评论。特别是对赵云，不止褒扬他的战功，更赞颂了他以大局为重，对刘备直言进谏的大臣风范。这与一般只看到赵云勇冠三军的认识相比，更高一筹。

赵藩写得最多的是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赵藩对苏轼的人品才华十分钦仰。十二月十九日是苏东坡的生日。光绪丙戌年（公元1886年）的这一天，赵藩于昆明岑毓英幕府与文友在翠湖聚会，以诗词酬和为苏祝寿。赵藩作了一篇古风，开头两句便对苏轼作了极高评价：“大峨仙人翩然归帝乡，但见奎宿天上森光芒。”诗中对苏一生遭际深寄同情：“前年赤壁俯栖鹤，吊古迁谪浮轻航，……置酒为公作生日，趋拜遗像招提房。……生平遭逢谤誉一瞥春梦耳，完此忠孝大节亘古何堂堂。”

自这一次寿苏会后，赵藩在四川、在广州都常寿苏，终生不渝。

赵藩诗近杜甫。他像杜甫一样，想“致君尧舜上”，报效国家，又不能“立登要路津”，也找不到报国的机会，“弃繯请剑都无分”。他像杜甫一样走遍大江南北，深知民间疾苦，饱览中华山河，蕴集了厚实的生活体验，虽于政治上不得意又不能忘情于政治。由于杜甫与赵藩都曾客居蜀中多年，赵藩受杜诗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赵藩诗从诗风上看，也像杜甫的庄严、沉郁，讲究格律、喜欢用典（但少生僻），有的放矢，充满生活气息，多有描绘大好河山的作品。

赵藩也长于律诗，格律严谨，对仗工整而不以辞害意，举二例：



赵藩

晚望

独立向苍茫，危楼跨女墙。平沙芦渚白，斜日稻陂黄。
山瘦秋心老，天高雁影凉。村春何处发，百感集中肠。

月夜

素月侵阶上，虫吟一片秋。瓶花香自媚，窗竹影俱幽。
高阁独杯酒，客山谁倚楼。平生惜明镜，高照客边愁。

赵藩还善于填词，遗作有《小鸥波馆词钞》，于1943年付印问世。

赵藩的词风显然受到苏轼的影响，颇为豪放、飘逸。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词中也有表现。当他航行停泊扬子江中，目睹外轮往来，填了一首《丑奴儿》，批评清廷的海防形同虚设：

乘风破浪寻常事，整背朝阳，雁背朝阳。不信东溟一苇航。

坚昆未定仙槎杳，海上筹防，江上筹防，犹见轮舟过武昌。

对于滇诗史，赵藩做了一件大好事。

云南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从西汉开始的。汉武帝曾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史传滇人盛览曾受学于司马相如，返滇后传播了中原文化。其后，云南与中原又曾几度离合。云南历代诗歌，大都湮灭无闻。赵藩

整理文献,深感有必要理清滇诗的源流,写下了《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第一首是溯源:

古诗之流厥有赋,赋家之心靡不赅。

西汉词章溯初祖,长通亲受马卿来。

长通即盛览。接着是写《渡兰沧歌》、《焚道谣》、《白狼王歌》等民间歌谣。赵藩的诗像一根红线把散落的珍珠串连起来,理顺了滇诗的脉络,给中华文化献上了一份清单,为研究者指引了路径。

赵藩工律诗,自然就精于撰联了。

说到楹联,人们自然会想到成都武侯祠的那副名联。手头有一份剪报,是梁玉文先生十年前写的《赵藩与对联》。其中提到:“1958年3月毛主席在武侯祠看赵藩这副对联时,曾凝视良久,加以赞许。后来又曾嘱咐将赴四川就任的一位负责同志,一定要去看这副对联。随之,这副对联辗转传抄,轰动一时。”

赵藩对联的韵味无穷,在于他的立意高,眼光远大,见解卓越。他常撰联评论历史人物,爱憎分明,鉴别是非,寓意深远。所著《介庵楹句正续合钞》于民国十四年印行。

手边有一份剪报,是成都李金彝先生写的《赵藩三绝》,说赵藩既善于诗,还精于书法和绘画,评价至高。说到赵藩的书法,李先生对赵藩重写的昆明大观楼孙髯翁长联评价说:“写法上纯用颜柳笔法平正工整。意态端庄浑厚,确有平原神韵,是赵书的精品。”

赵藩除著述外,对中华文化的另一重大贡献是纂辑。

赵藩从小就受到重视传统文化的家教。他晚年致竹村的信中说:

藩自束发授书,稍有知识,其时滇乱孔亟,斯文将坠。先公推命,惟在文献。谓他日不望尔高科阮仕,但得辑学明理,留意吾滇掌故典籍,随时随地搜访哀集,尽我心力,公之乡人。藩谨服膺不敢忘。以故五十年来,虽戎马簿书,奔走颠沛,此志弗懈也。先后所获滇中先辈著述,或刊或抄,将二百种畸零,诗文四十余家,本意在蜀捐俸选梓告养亲亦携以自随;不意桑海变迁,迫促无暇,而已力孱薄,亦难举事。

民国三年,赵藩在昆明被推为孔教会会长,公请滇督唐继尧筹款辑刻《云南丛书》,并聘赵藩为总纂。他在一信中写道:

曩岁从事孔教国学时,每与当道谈及怱怱图成,幸承许可筹款开局,次第选梓百三十余种,杀青已竟,

未完者亦赓续写雕,每因款绌作辍,约计二年,可暂告一结束。其间最苦者,检、择、删、润皆须自为,分纂乏人,任劳已难,遑云任怨。即校对小节亦复惴惴,乌焉亥豕,触目而是。念已担任,诤谢非人,尤乖素心。此所以如盐车弩马,竭蹶上阪不告休,非弋虚誉,非恋餐钱,中夜抚膺而自怜亦自笑者也。蚕作茧而自缚,蠹食字以为甘,倘所谓天生劳人,是耶?非耶?(《遗稿》)

这使我们看到,赵藩对整理典籍的投入,不仅仅是为了遵庭训和个人爱好,而是有目标地为云南文化克服万难,尽力所能及地作出奉献,终其一生。

1921年,顾筱斋由四川回师云南赶走唐继尧后主滇,邀请赵藩襄政。赵藩回信说明情况:“编刊丛书,今已十有其七,再二、三年,浮图九级,当可合尖。藩视如家事,是以于役岭南,仍遥领经理,不敢懈怠,归后赓续进行。虽家难痛心,沈疴息偃,而订佚笺,谈国故,则眉轩意豁犹是乐此不疲也。虽老儒之结习有然,亦重赖邦人君子、贤士大夫提挈匡襄,庶几藏事,比承教言,尤兹注重。藩敢不仰体大君子德意,担任综理,始之终之。”

他同时给岑春煊的写信中谈到,“藩以逾七望八之衰翁,厉万兀千摇之险浪,饰巾待尽,及其未填沟壑,勉完滇云文献之责,他非昏髦所知,亦非孱力能及已!”

赵藩谢辞高官不做,为整理文献而鞠躬尽瘁,足见他的高风亮节。

由赵藩主编的《云南丛书》,按经史子集分类,网罗了有关云南历史、地理、人文、著述,经精心筛选、订正,从1914年起陆续编刻,计初编152种,1148卷;二编53种,254卷。1927年赵藩久病不愈,他痛感到“奢愿已看偿不得”,带着遗憾与世长辞。他还有部分已编成的稿本没有刻印,至今存于云南图书馆。这既使后人怀念赵藩,也发人深思:这七八十年,我们都没有一个人能继赵藩“合尖”,而上九级浮图缺一个顶吗?

《云南丛书》流传国内外,受到重视。1978年云南省图书馆作过一次总结,将已刻或未刻印的都编辑出简目,提供当前研究工作或其它方面的参考。

赵藩还纂辑了《咸同滇中兵事记》和一些年谱、词录、诗钞、传记、印存、翰札等十种三十八卷。

他一生为中华文化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杰出的。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毛泽东自传》的译者汪衡

● 沈仁干

《北京日报》今年5月9日第九版以整版篇幅介绍西安发现64年前出版的《毛泽东自传》。该书由美国记者斯诺撰写，汪衡翻译，潘汉年题写书名。斯诺与潘汉年均为人人熟知，熟知的人自然很多。“汪衡是谁？”“是否也是我党地下工作者？”该报记者向社会征求答案。作为汪衡先生的学生与朋友，受新闻出版署前署长宋木文同志的嘱托（汪衡先生退休前在宋木文同志领导下工作），我想把我所知道的汪衡先生向关心他的报界和有关人士简要介绍一二。

一

汪衡，男，原国家出版局版权处处长，曾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权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在1914年8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993年1月去世。他的祖籍是江苏省苏州市。其父汪凤瀛，曾做过长沙知府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主张实业兴国，民国初期做过大总统府顾问，于1926年去世。其母汪蔡氏，家庭妇女，1966年去世。汪衡四岁入家塾，读四书五经。12岁时，他考进苏州私立树德中学小学部读五年级。中学毕业后，1935年汪衡考进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转入经济系，从此走上了反蒋抗日的革命道路。

二

汪衡原名汪椿宝，同父同母弟兄五人，他排行第三。汪衡上中学时，大哥汪季琦已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是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他经常带一些

《唯物辩证法》、《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一类的书籍给汪衡看，使汪衡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了兴趣。“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打内战，汪衡积极参加。除受大哥的影响外，另一位共产党员顾衡对汪衡的影响也相当大。顾衡是江苏无锡人，与汪季琦同为当时南京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被捕后，家庭多方营救，只要写一纸自首书就可以被释放，但他始终不肯低头，结果年纪轻轻，就被国民党杀害了。在收拾他的衣物时，汪衡发现他的衬衣裤上有无数的小血点。为了纪念这位英勇顽强的共产党员，汪衡将自己的原名汪椿宝改为汪衡。

三

汪衡崇拜鲁迅先生，凡是鲁迅先生的作品，他都找来十遍八遍地阅读。汪衡认为，鲁迅先生是青年人和一切被鄙视、被迫害的人们的大盾牌，他的笔是打击黑暗的旧中国的最有力的武器。于是汪衡效仿鲁迅先生，拿起笔作武器，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夏，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先生在复旦创办了《文摘月刊》，邀请汪衡参加编辑工作。由于汪衡中、英文基础都好，工作又十分热情努力，出版三、四期后，他便成了孙教授的得力助手，担负起了编辑部的主要工作。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即《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出版了，汪衡以极大的兴趣把它读完了，认为这是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好书，便将其中部分章节翻译出来，编了两本书，一本叫《毛泽东自传》，一

本叫《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两本书都由黎明书局发行。汪衡在《文摘月刊》任编辑委员时，还出版过《周恩来抗战言论集》、《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日本的泥足》等二十多种小册子。汪衡因译《毛泽东自传》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被国民党当局列上了黑名单，陈立夫主管的“教育部”找复旦大学当局要人，孙寒冰教授便派汪衡去武汉办《文摘月刊》，随后又转往香港与重庆。1941年日本飞机轰炸北碚，《文摘月刊》编辑部被炸，多人被炸伤，主编孙寒冰先生被炸死。汪衡因外出校对，幸免于难。孙寒冰教授的遇害，使汪衡十分伤心，他决心北上抗日，为孙教授讨还血债。但他要求到延安去工作的申请未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批准，办事处的同志告诉他：《文摘月刊》是一个很好的刊物，应该有人在恶劣环境中支持它，汪衡只好继续留在重庆工作。

四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然又要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建国。汪衡不愿意为国民党做事，在复旦大学教授 Robert Payne（英国人）的帮助下，他将冯玉祥将军的自传《我的生活》译成英文，拟在英美出版。冯将军得知此事十分高兴，想收 Robert Payne 教授和汪衡为“门生”。经冯将军的秘书赖亚力先生从中协调，Robert Payne 教授与汪衡向冯将军递上了“门生帖子”，拜冯将军为师。1946年7月，汪衡应冯将军的邀请，作为英文秘书，随冯将军的水利考察团赴美。在美国停留期间，汪衡还在华中实业公司纽约办事处当过打字员和秘书。他积极组织“留美中国学生反帝反封建大同盟”，主编《留美中国学生通讯》，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分析祖国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形势，号召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革命，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汪衡于同年12月启程回国，1950年1月到达北京。

五

回到北京后，汪衡积极热情地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他先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随后在国际新闻局、学习杂志社、《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人民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和国家出版局从事编辑、翻译和版权研究工作。1978年应陈翰伯同志的邀请，年过花甲的汪衡先生从北京图书馆来到国家出版局。1979年下半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版权研究小组成立，汪衡先生出任组长，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小组，汪衡先生便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汪衡先生思想敏捷，学识渊博。在他的带领下，版权研究小组很快就收集、翻译了一批外国的版权法与国际版权公约，并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的指示，开展调查研究，着手草拟版权法。中国成立版权研究小组，开始草拟版权法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国际版权组织和国外版权产业界的关注，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为中国建立现代版权制度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培训版权专业人员。也有个别的外国人乘机指责中国“盗版”，甚至对我们如何制订版权法指手画脚。对于国外人士的友好建议，汪衡先生代表研究小组表示欢迎，并和他们商量组织落实。对于个别人士的无理指责或要求，汪衡先生用他丰富的国际工作经验和渊博的知识予以驳斥或耐心说明，使他们不得不服气。通过与汪衡先生的交谈，以及从别的美国人士处获得的信息，美国版权局前局长雷大卫先生警告西方人不要在版权问题上给中国人施加压力。1985年他在全美律师大会上讲：“中国人知道他们该怎么做，最好的办法是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他们。可以肯定，他们欢迎美国和其他人的帮助，但给他们施加压力，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是不明智的。在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前进并要求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应当努力去帮助他们。”凡和汪衡先生比较深入地讨论过版权问题的人，都为他渊博的知识、地道的英语和大国官员的风范所折服，一位国际版权专家送给他一个绰号：“中国的版权先生”。

汪衡先生是共产党的一位好朋友，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别人的宽厚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并不亚于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那种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的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与高尚情操，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并激发我奋勇前进。

（作者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出版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 程 度）

在美军监狱的中共党支部

● 张泽石

1951年10月,在韩国巨济岛上美军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有三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成立了一个地下党支部,领导了一场令敌人胆战心惊的爱国斗争。

当时被关押在这个监狱里的81名“刑事犯”,都是美军从巨济岛第86号战俘营抓来的“暴动分子”,罪名是我们在10月9日晚上“带头挑起了一场大规模流血斗争”。而事实真相是美方唆使我被俘人员中的叛徒在10月10日那天升起“青天白日旗”,企图以此证明中国战俘都心向台湾是不愿回大陆的。我们被迫组织爱国力量在头天晚上包围了叛徒操纵的“战俘警备队”,经过激烈搏斗,夺取并烧毁了那面青天白日旗。美军见势不妙,立即派了一个连的海军陆战队,强行闯入战俘营进行血腥镇压,叛徒们当着美国兵的面将共青团员王绍奇活活打死;我们这些斗争骨干则被叛徒搜捕出来,在美军喝彩声中逐个毒打后以“刑事罪犯”名义投入监狱。

在监狱中,美军C.I.D.(刑事审讯科)警官布莱克中尉对我们进行审讯,因C.I.D.没有汉语翻译,只得临时指派我担任译员。我趁机向他介绍了叛徒们在战俘营内实施白色恐怖,对不屈的战俘进行政治陷害、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以强迫他们背叛祖国、放弃归国权利的详情,争取了他的同情。当我向布莱克中尉了解我们这些“刑事罪犯”将如何处置时,他告诉我:在对我们拘留一个月后,将送回86号战俘营,甚至是叛徒控制更严的72号集中营。这对我们十分不利。因我们的政治面目已完全暴

露,无论是去“86”或“72”,都只能被叛徒们更严格地控制隔离,遭受残酷折磨,甚至消灭肉体。尽管我个人还可能在“翻译”的位置上免受皮肉之苦,但再想以“灰色”面目应付美军监管人员,并继续和叛徒周旋是不可能的了。

我把时占魁、曹明、钟骏骅、周铁行等难友找在一起,分析了我们面临的形势。大家决定为保存这批可贵的骨干力量,立即向管理当局表明:誓死不去“86”和“72”,坚决要求单独成立一个“志愿回国的中国战俘营”。

为了加强团结和增强组织领导力量,我建议把这81个难友中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地下党支部,以领导大家迎接更为残酷的斗争。由于当时条件特殊,党支部只对内公开,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建议。在86号战俘营时,大家是以“弟兄会”的名义组织起来的。“弟兄会”成员友爱互助,为维护祖国荣誉,总是走在斗争前面。经过“弟兄会”中的一段了解,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可能已经到来。但调查结果81个难友中只有时占魁、曹明和我是党员,钟骏骅、周铁行、余国藩、杨守让、袁朝模等十五六个人是共青团员,剩下的都是非党团群众。

我们三个共产党员当时商定,由担任过连指导员的时占魁任党支部书记,曹明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对外我们任81人的战俘代表。地下团支部由周铁行任团支部书记,钟骏骅、杨守让为团支委,他们参加党支部扩大会议,作为核心领导成员。

当天晚上,我们举行了由全体难友列席参加的地下党团支部成立大会。一张用铅笔头在烟盒纸上画的党旗贴在北墙上,同志们整齐地排坐在发霉的草垫上,三个共产党员站在“党旗”下,支部书记时占魁同志宣布大会开始,第一项议程:全体肃立,唱《国际歌》。难友们都跟着站了起来,室内安静极了,只听见远处传来的阵阵海涛声。我低声地起了个头,大家低声齐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有人声音哽咽,脸上淌着热泪。

大家坐下后,由我代表支部讲话。我先向着北方深深地鞠了一躬,面对着“党旗”说:“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我谨代表远离您怀抱的三名共产党员和您的被敌人囚禁在孤岛上的全体战士表示我们对您的忠诚!祖国啊!我们自从被迫远离了您,就像一群失去了母亲的孤儿。我们在苦难中每时每刻都深深感受到无依无靠的痛苦……”

我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背后响起的一大片压抑着的哭泣声更加揪疼着我的心,我的眼泪汹涌而出。顷刻间,战斗失利,突围不成,大批被俘,鬼子的淫威,叛徒的猖狂,一幕幕重现在我的眼前……

顷刻,一种责任感强使我忍住了眼泪,继续讲下去:

“今天,我们三个共产党员,81个爱国者,重新在您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做好准备去迎接更加残酷的斗争!我们深深相信祖国始终在关心着我们这些忠诚的儿女,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始终在支持着我们!我们将把党的理想化作我们的灵魂,用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燃起斗争的怒火,踏着那些在战场上,在突围时,在集中营的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战友们的血迹,继续和敌人战斗到底!”

“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现在,就在敌人的枪口下,在异国的孤岛上,我们这群炎黄子孙向自己的母亲庄严宣誓——”我举起了右手,握紧了拳头,领读誓词:

“茫茫大海,汹汹怒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宁做他乡鬼,不当亡

国人!”

宣誓完毕,我转过身来,先向难友们表示了我们党支部和大家共生死共患难的决心,然后讲了我们目前面临的险恶前途,要求大家紧紧团结在地下党支部周围,共渡难关。

紧接着,曹明代表党支部表扬了“弟兄会”的斗争精神,肯定了他们在斗争中的贡献,然后宣布“弟兄会”已完成其历史任务,从现在起停止活动,今后全体“弟兄会”会员将在党支部统一领导下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团支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也讲了话,他们激动地表示了坚决服从党支部的领导,绝不在艰险面前动摇,绝不向敌人屈服的决心。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监狱里的坚强核心领导,我们81个中华儿女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跟美军将我们送往被叛徒控制的72号或86号战俘营的图谋展开了殊死斗争。我们在用中、英文写给巨济岛美军军官的“血书”中明确表示:“如果美方一定要将我们交给被叛徒控制了集中营,只能是将我们的尸体搬进去!”

1951年11月10日,即我们“刑满出狱”的那天,美军竟然不顾我们的坚决反对,硬将我们押往72号那“阎王殿”。就在到达72号营门口的这一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党支部指挥大家手挽手紧紧围成一团,坐在马路中间,拒绝前进一步。当押队的美军少尉指挥他那一排军士持枪围上来准备威逼我们就范时,我愤怒地用英语向他喊:“少尉先生,你如果真下令动武,我就下命令我们81个人来抓你一个人,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一口气,咬也要咬死你!”

那少尉惊恐地后退了,急忙进了72号战俘营,用电话请示司令部,然后出来让对面71号战俘营打开营门,最后对我说:“我算是认识你们这些不要命的中国人了!你们胜利了,到‘71’号去吧,你们将成为一个独立的中国战俘大队!”我将少尉的话翻译给大家听,大家竟含泪欢呼起来。大家随即排成整齐的队列,开进了71号的营门。

(责任编辑 洛松)

八路军向国民政府领饷记

● 窦孝鹏

一

1940年4月，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终于收到了国民党政府愿意补发拖欠八路军半年的军饷的电报。他们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建成了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63万元。其中经常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费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以后几年虽有小小的调整，但总数却没有超过70万元。

那时物价飞涨，如一套军装1939年费用为2元，1940年涨到5元。同时，由于全民抗战的开展，全国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八路军人数剧增，1939年达到20万，1940年达到40多万，但国民党不但不增发相应的军饷，就连4.5万人的标准也千方百计进行克扣或拖欠不发。1939年冬和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除派胡宗南部向延安进犯外，还以阎锡山、朱怀冰等部进攻太行山根据地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对国民党的挑衅，八路军进行了必要的还击，消灭了他们的几个师，打退了他们的反共高潮。对此，国民党老羞成怒，找借

口停发了八路军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的军饷。为此，朱德总司令向行政院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出质问电，质问他这样做的用意何在？是想使饥寒交迫的八路军冻死饿死吗？或者另有什么深谋密计？与此同时，《新华日报》也就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四年来深入敌后，坚持苦撑，作战达一万数千次，牵制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敌人，夺回了广大失地，消灭敌伪盈千累万。然而八路军、新四军虽为抗战最力，建功最大，但其所受待遇则是全国军队最菲薄的。”这些，都使全国人民更加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限共、反共，破坏抗日、破坏团结的嘴脸。

经过我党我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国民党终于同意了补发所欠八路军的军饷。

根据达成的协议，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都是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这些钱对几十万八路军来说，尽管是杯水车薪，但半年下来毕竟是个不小的数目。怎样把这笔巨款通过层层封锁线，从西安安全地运到总部来，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为此，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与左权参谋长和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研究后，确定派后勤部供给部副部长周文龙（解放后曾任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国家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总后勤部顾问）去西安领这笔军饷。当时正好朱总司令要经西安去重庆谈判，周文龙可以同朱老总一起前往。

周文龙是老红军,他办事认真、机警,上个月才由抗大校务部长调到八路军后勤部供给部任副部长。杨立三陪周文龙一起来到左权参谋长办公室,左权笑着点点头说:“文龙同志,你刚来供给部,就派你出这趟远差。去时可以同总司令一路同行,关键是回来的时候,携带巨额款项,又要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占领区和日本军队的封锁线,困难很多,要把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困难充分考虑到前头,切不可掉以轻心!”最后,左权又说:“为了工作方便,总司令带去的电台可以留下来为你们工作,随同总司令的警卫武装,你也可以带回来,作为护送你们的监护连,希望你们严守秘密,提高警惕。”

从左权办公室出来,他们又到后院去见彭德怀。彭总说:“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艰巨。这些钱来之不易,关系到几十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此行真可谓任重道远,一定要多做几手准备,确保路上安全,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最后,杨立三又把周文龙请到自己的办公室,交代他捎带办两件事。一是供给部现有5万元的破旧币,要他带到西安,兑换成新币,派一名出纳员具体办理。二是在去年底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八路军设在晋城、阳城、高平一带的兵站被顽军打掉了,人员物资都受到很大损失,有些人被抓去关了起来;现在只剩下河南的浞池兵站和晋南的垣曲兵站办事处,这两处虽然还存在,但却被顽军围困着,岌岌可危。要他设法将被抓人员和这两个被围的兵站解救出来。将人员和重要物资尽量带回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杨立三作为八路军总部的后勤部长兼政委,同时还兼着兵站部的部长兼政委。当时从延安到华北抗日前线的兵站线有三条:北线从绥德、米脂、吴堡到山西柳林、离石,主要连接晋西北的一二〇师部队。东线从延川县延水关过黄河到山西的永和、大宁等,主要连接一一五师和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南线从延安南下经西安东去,过潼关到河南浞池,然后渡黄河北上到山西的垣曲、阳城、晋城、高平至晋东南,主要连接一二九师及驻

在这里的八路军总部。这次去西安,走的的就是这条线。这条线虽然被顽军破坏,但同行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已经有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头衔(司令长官为阎锡山),借着这个关系,沿途的顽军不会太猖狂的,解救兵站人员也是有希望的。

二

1940年4月20日上午,阳光灿烂。在朱德的带领下,一行四百余人从王家峪出发了。前面是150名老兵组成的警卫连;朱德、康克清,随行参谋、秘书及电台工作人员走在中间;周文龙带领供给部的人员走在后面,有科长、出纳和从兵站部调来的两个运输连,还有10匹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骡子,是专作驮运军粮用的。

周文龙跟着朱老总夜宿晓行,一路向南行进,先后经过黎城县、平顺县、壶关,来到了国民党军队占领的陵川县。这里驻的是第二十七军。二十七军是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节制的,军长范汉杰已接到卫立煌的电令,对朱德一行进行了热情的接待。

这天晚上,周文龙得到一个情报:去年12月我高平兵站遭顽军袭击后,有50多名官兵被抓起来,就关在二十七军军部,他们受尽了凌辱和苦役,有的还硬被逼着给顽军当了兵。这个情况就是被迫当兵的一个哨兵提供的。

周文龙想起杨立三部长临出发前的交代,当即向朱总司令作了报告。朱德说:“明天我就正式向他们提出这件事。”

第二天,朱德对前来探望的范汉杰说:“范军长,在去年底的反共高潮中,据悉贵部对我高平兵站进行了袭击,至今,被抓的50多名官兵仍关押在你部,遭受着非人的折磨。请问范军长,是否真有其事?”

范汉杰一惊,尴尬地笑着说:“我没听说过这件事。即使有,也是下面的人干的,他们没敢向我禀报过。这简直是乱弹琴!我马上就去查查,若确有其事,我一定严加惩办。”

很快,50多名被抓的兵站官兵被释放了,

他们见到自己人，一个个失声痛哭。朱德指示周文龙：这部分人编入供给部的队伍，一同随军南下。

又经过几天的行军，他们来到了阳城县的白洋泉河畔，这里紧挨着日伪军的白晋公路封锁线，为了避开敌人，他们连夜越过封锁线来到黄河岸边的白坡渡口。坐镇洛阳的卫立煌特派他的参谋长兼第九军军长郭寄嶠带着军乐队和大小汽车多辆，来河边迎接朱德一行。有了汽车，行军速度大大加快。5月7日下午，朱德、周文龙等来到洛阳，受到卫立煌的热情接待。卫立煌1938年曾到过延安，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对八路军的抗战精神十分敬佩，对朱德一行表现出了十分友好的态度。他向康克清赠送了一支精制的德国制小手枪和自来水笔；还找来裁缝，为朱德、康克清、周文龙等几个干部赶制了一套优质斜纹布的灰军装。朱德也把缴获的一匹日本大洋马、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刀和一件日式黄呢子大衣回赠给了卫立煌。

在洛阳的几天中，卫立煌安排朱德接见了许多军官和有关政界要人。因为这里是河南省政府和省党部所在地，卫立煌又兼着省政府主席，每天活动很多，朱德便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抗战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周文龙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听此地有无被抓关的我兵站指战员。几天后他们终于打探到：在去年12月，国民党第十四军陈铁等部，打掉了我陵川县和垣曲同关镇的两个兵站，抢走了大批财物，抓走各级干部46人，将这些人全部交给了第一战区长官部。但卫立煌并没有将这些八路军干部押送集中营，而是临时关在长官部的特务营。他留了个心眼，怕以后对八路军不好交代，所以对这些“俘虏”的待遇还算不错。

弄清情况后，朱德正式向卫立煌提出要人。卫立煌满口答应说：“即使你不提，我也准备把这些人全部归还贵部的，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还请朱副长官多多包涵！”

5月17日，朱德、周文龙离开洛阳去西

安，卫立煌率党政军要员亲自到洛阳火车站送行，并派他的副长官陪送到西安。火车行至灵宝车站，前面就要进入陕西的潼关了，却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呢？”朱德着急地发问。

随行的副长官打听后告诉说：从灵宝到潼关的火车，因经常遭日军炮火的袭击，造成很大损失，现在停驶了。

经过与驻灵宝的国民党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联系，他们为朱总司令准备了几匹马，并答应派一个骑兵连，护送朱德沿山路去潼关。周文龙因为带着5万元旧币，怕路上行走不方便，火车站便给他提供了一辆压路车，载他们去潼关。压路车是铁路上巡路用的一种小车，四个轱辘，靠手摇作为动力。周文龙和管理科长宋正古、出纳员吴福兴及几名警卫人员轮流替换着摇动手柄，警惕地躲过驻扎在不远处的日本军队的眼睛，疾速地向前驶去。由于心情紧张，加上要用力摇车，每个人的衣服几乎都被汗水湿透了。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努力，他们终于抵达潼关车站；又过了一会儿，朱德等一行骑马的人也都赶到了。朱德握着周文龙汗涔涔的手说：“没发生问题就好，这一路我的心一直悬在空里，现在可以放回肚子里了。”

这里，已经没有日本人的威胁，他们乘上火车，风驰电掣地向西驶去，于当天黄昏时分，安全抵达西安。

三

周文龙到达西安后，住在八路军设在西安市内七贤庄的办事处。这是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在国统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是全国各地与延安联系的一个主要联络点，在输送大批进步学生去延安、转送干部进出陕北、为八路军筹措物资采购军用品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七贤庄分前后几个院，前三院为接待室、办公室、客房，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都在此居住过。位于四号院的是后勤采购机构，有会计、采办、粮秣、运输等科室，军委后勤

专人雇了一辆人力车,把吴福兴送回了八路军办事处。

回来后,吴福兴向周文龙汇报了被绑架的经过:那天他先到西安南门外的中央银行去兑换旧币。他把一捆捆旧币递进去,对方一沓沓清点着。叫他在外边等候。一直等了两个小时,突然出来一个人,把他叫进后边的一个小屋里,冷冷地问:

“你这些钱是从哪里弄来的?”

吴福兴答:“是八路军在前线打了胜仗,群众捐的慰劳款。”

“你是怎么来西安的?”

“随第二战区朱德副司令长官一起来的。”

“兑换这些钱准备什么用呢?”

“购买一些药品,供前线将士急用。”

对方见问不出破绽,突然把脸一沉说:

“你带来的票子全是假的。必须严加惩办!”

吴福兴刚要申辩,从门外进来两个穿警服的人,不容分说,将他押走,钱款全部被没收。

吴福兴被绑架后,关在一个有60多人的大牢房里。他通过给哨兵做工作,机智地送出了信息,终于又回到了同志们中间。没收的款也被追要了回来。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外出办事,他们都是两人以上同行。第二天,吴福兴又去几家银行兑换旧币,均未遇到任何麻烦。

5月23日,朱德从下榻的西安行署来电,让周文龙去一趟。到那里后,周文龙汇报了吴福兴被绑架的情况,朱老总说:“西安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十分猖獗,驻在这里的胡宗南是搞摩擦的老手,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接着,朱德总司令告诉周文龙,他原定的去重庆谈判的任务,由从苏联养病回来的周恩来副主席去完成。他要返回延安去开会。临走之前有几件事要交代一下:“第一,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应领的军饷如数领到手,防止对方要花招以种种借口拖延和拒付。第二,领到的军饷要平安运回前方总部。这方面困难很多,路途遥远,腰缠万贯,又要途经日寇的封锁线和

国民党的防区,要开动脑筋,把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想在前头,以防不测。第三,我们来的路上,收容了一批干部,他们都是抗战的骨干,要想方设法把他们带回家去。我明天就要走了,你一定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冷静、沉着,祝你们胜利!”

按朱老总的指示,在西安办事处的协助下,周文龙再次对领军饷的每一个步骤、措施,都进行了反复研究和部署,使这项工作再也没有出现漏洞和挫折。到6月29日,他把该领的全部军饷已经领齐,共计257.795万元。加上以旧币兑换新币5.1万元,两项合计共263万元。堆起来像一座小山。

四

7月2日,周文龙一行离开西安回返。西安办事处派汽车载着人员和军饷,护送他们到洛阳。按说,他们应该从灵宝和洛阳中间的渑池县往回返的,但因为他们必须先到达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去办通行护照,所以只好走过头路。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答应给办,因为朱德总司令有交代。但具体承办时耽误了几天,周文龙急得天天去催。这段时间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为避免军款受损失,每天天不亮,他们就用麻袋装着军款驮到十多里外的乡下进行防空隐蔽,天黑后再驮回来,天天如此。

几天后,周文龙终于拿到了办好的护照,上面是这样写的:

兹有十八集团军上校军需官周文龙,携带军饷若干,人员马匹若干,返回十八集团军总部。望沿途军宪警卡查明放行,以防滋扰。

落款处盖有长官部大印和卫立煌的图章。

拿到护照的当天,周文龙便携款乘火车西返,来到八路军的渑池兵站。渑池兵站与黄河北岸的垣曲兵站办事处去年第一次反共高潮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第十五军六十五师所困,已与外界断绝来往半年多。周文龙来到渑池兵站后,才真正为他们解了围。大家激动得相拥而泣。

渑池兵站存放着大批军装和其他物资，他们趁夜就地坚壁，短短三天，全部处理妥当。然后带着兵站的百余人向黄河边赶去。守黄河渡口的是国民党的第十五军六十四师，是受卫立煌管辖的。为了保险起见，周文龙包了一条大船，人、物安全地到达黄河北岸的山西垣曲县关上村的垣曲兵站办事处。

被围困半年多的办事处主任姚一廷、政委曾仁文，像见到亲人一样高兴。被困在这里的除兵站办事处科室人员、警卫部队、骡马运输大队外，还有军委派去八路军总部的电台工作人员 30 多人，印度援华医疗队 30 余人，中共中条山特委书记李哲人带领的 10 多名干部，以及解救出来的特委的一个警卫连。现在全部人员加起来达近千人。

周文龙发电报将情况向彭德怀、左权、杨立三等领导作了汇报。总部发电指示：所有人员编为北上支队，周文龙任支队长，李哲人任政委，邹毕兆任参谋长，曾仁文任政治部主任。部队必须轻装，除电器材料、医药器械、兵工机器外，其他一概坚壁。部队迅速北返。

经过几个昼夜的忙碌，处理完各种物资后，7 月 12 日，北上支队在周文龙等人的率领下开始行动。

一天，部队来到了济源县境。从这里往东北从原路返回，已相当困难，因为日寇已在那些交通要道增布了兵力。若向北则必须经过国民党顽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等部的防地，而朱怀冰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已与共产党结下深仇大恨。究竟怎么办，周文龙发报向总部请示。彭德怀复电：可派人与朱怀冰交涉，若他答应掩护我们安全过路而不遭袭击，我们可将上次俘他们的人员及武器归还。

交涉的结果，朱怀冰只答应北上支队通过他的防区可确保安全，至于通过日军的防线，他不能做保。周文龙等经过分析认为：朱怀冰素与日本人有勾结，与八路军又有不解之仇。他很可能暗地把情报透露给日本人，借日本人之刀杀我们。总部也意识到，此举潜藏危机，随即便要他们停止与朱怀冰的交涉，必要时把部队带回西安，再经延安返回晋东南。但这样要绕

一个很大的圈子，会有更多的困难。正当大家犹豫不决时，总部再次来电称，经反复斟酌，令北上支队向济源西转移，经阳城、沁水、东峪，奔向我太岳军区回总部。

周文龙当即进行布置。为了麻痹敌人，他继续派人与朱怀冰谈判；同时派出一个便衣侦察队，开始向西北方向侦察。当夜 12 点，大队人马乘夜深人静，悄悄出发，向西北方向转移，进入一条黑森森的大深山。

第三天，部队进入山西阳城县境，由于部队行动隐蔽，他们已安全地通过了日本人防守的周林镇封锁线。前面就要进入沁水县，国民党第九十三军军长刘戡的军部就驻在沁水县张店。为了防止顽军互相勾连，周文龙令割断了沿途的军用电线。又抓了九十三军的两名便衣作向导，率部直奔九十三军军部，凭卫立煌的通行证，在此宿营一夜。

当夜，周文龙收到彭德怀发来的电报，称：总部已令太岳军区司令员黄新亭率步兵、骑兵各一团，前往沁水县境内接应。大家受到极大鼓舞。

第二天，部队继续北进。下午，在大家的热切期盼中，黄新亭司令员率骑兵团先头部队赶到，与行进中的北上支队相会。大家相见，激动异常。多少天来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大家一路唱歌，一路行军，当晚来到了太岳军区驻地。黄司令员安排大家在此休整了三天。第三天夜里，军区派 4 个团护送北上支队，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白晋公路封锁线，进入太行山根据地腹地。

7 月 20 日，周文龙率北上支队终于回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彭德怀、左权、杨立三和他们紧紧握手。彭德怀说：“这一趟出去了整整三个月，你们辛苦了，你们为总部办了一件大事。大家感谢你们！”

领完这次军饷后，国民政府又凑凑合合地向八路军发了四个月的饷。到 1940 年 10 月，随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掀起，国民党一手把持的国民政府当局则完全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供应。八路军的抗战进入了更加艰苦的阶段。

（责任编辑 刘文）

迥异的家庭 奇特的爱情 悲惨的结局

——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俞秀松及其夫人

● 高凤英

我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是 1920 年 8 月 22 日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诞生的。发起人有八个：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前六位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会议把青年团的名称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即 S.Y 青年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陈独秀也参加了会议，指派这八个人中最年轻的 21 岁的俞秀松为“负责人”，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提议称为“书记”。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次年 5 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选举俞秀松、高尚德、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五人为青年团中央执委，施存统为书记。党、团元老俞秀松的一生，还颇有传奇色彩。

俞秀松 1899 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溪埭村一个农民的家庭，17 岁考入省立第一师范。1919 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卷进浙江，省立一师成了浙江的“北大”。俞秀松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成了领导浙江运动的勇士。他和战友们先后创办了《十月》、《浙江新潮》杂志并任主编，旗帜鲜明地宣传新思想，抨击反动当局，刊物发行到两湖、北京、黑龙江，甚至日本。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著文大加赞赏“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向穷困和黑暗斗争”的锐气，“使杭州城地动山摇”。

1919 年底，俞秀松到北京见到陈独秀。经陈介绍到北大哲学系旁听，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在一封信中说：“我此后不想做学问家，情愿做个‘受人唾骂’的革命家！”

1921 年 3 月，俞秀松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和上海团组织的委托，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列席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亲耳聆听了列宁的讲演。回国后，他从事浙江的建党、建团和工人运动，到广州协助孙中山做军运工作，1925 年——1933 年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并任教，还担任了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委员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由苏共中央派往伯力任《工人之路》副总编。

当时，盘踞新疆的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他的土皇帝势力和蒋介石抗衡，提出了五大政策：

“反帝、亲苏、和平、清廉、建设”。他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和经济、贸易上的好处，装出一副十分“革命”的红色面孔，还亲自赴莫斯科拜会斯大林，请苏联扩大对新疆的军事、经济、外贸援助，并请求派出共产党员帮助新疆治理建设。斯大林欣然应允。盛世才还“热忱”地申请参加共产党，斯大林对此不置可否。

1935年6月，第三国际派出20多位中共党员来到乌鲁木齐做统战工作，由俞秀松（化名王寿成）负责。

俞秀松是中共老资格的优秀党员，且富有工作能力，盛世才对他很器重，聘任他担任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主编《反帝战线》，又任新疆督办公署边防处政训处副处长、航空学校和军官学校政治教官、新疆学院院长、省立一中校长，又请他做了小妹盛世同的家庭教师。

盛世同当时是个15岁的小姑娘，可谓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她容貌美丽，性格坚强。她十分热情地参加了中学的“反帝会”、“妇女协会”和“学联会”，并担任了反帝会小组长和学联会监察秘书，在工作上反帝会秘书长俞秀松经常接触。

俞秀松作为家庭教师，除了经常去她家讲课、辅导外，还给她讲解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使这位小姑娘受到了马列主义的熏陶。

俞秀松当时已经36岁。他那高尚的品格、成熟的才干、广博的学识、潇洒的风姿，使这位小姑娘非常入迷和倾慕，两人热恋了一年后，便决定结婚。

盛世同向父母和大哥盛世才提出这门亲事，他们都欣然赞同。俞秀松说：还需要报请第三国际和斯大林审批。斯大林也欣然同意。

1936年夏，16岁的盛世同和37岁的俞秀松举行了热闹的婚礼。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全体同志也来参加，领事阿必列索夫还带来了斯大林赠送的一箱衣服和化妆品，转达了斯大林对新郎和新娘的祝贺。领事馆特设了筵席，举办了舞会，把婚礼场面拍成了电影，在乌鲁木齐多次放映。结婚一周年时，斯大林又送他俩一架照相机。

斯大林赠送结婚贺礼，这在中共党员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对俞秀松的钟爱和器重。

婚后，俩人的生活十分甜蜜但又十分清廉。1937年，盛世才派省政府主席李溶给俞秀松送来任命他兼任省教育厅厅长的委任状，俞和妻子商量后又退回去了。他说：“我不为名，不图利，现在不是享受的时候。要想当官，我早回浙江省当教育厅长了，杭州的一些老朋友已经请了我好几次。”

俞秀松风趣地对娇妻说：“你这名字真好。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必然要胜利，‘盛世大同’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你要按自己的姓名的含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实现共产主义的‘盛世同’。”

他们夫妻俩在从事反帝、建设新疆工作中，还多次经盛世才同意，向延安支援了大批武器弹药、被服药品等物资，并培训了党派去的飞行人员，还积极组织了对西路军失败后入疆的李先念等400多名红军官兵的援救。

1937年11月，共产国际派中共驻国际代



俞秀松

表团正副团长王明、康生回国参加抗日。他俩途经乌鲁木齐时，盛世才设宴招待，并拿出由共产国际派往新疆的25位中共党员的照片，问他们认识不认识这些人。

王明、康生竟说：俞秀松，还有赵云蓉、张逸凡、吴德铭、郑一俊等十几个人都是“托派”，是“反对斯大林的”。又说：他们回国前见到斯大林，已汇报了俞秀松是托派。王明并示意盛世才，要他把这些“托派”逮捕起来送交苏联审问。

事实上，这全是卑鄙阴险的诬陷。原来俞秀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曾和王明在一起，对王明和米夫搞宗派主义很是不满。王明于是挟嫌报复，捏造罪名借刀杀人。

王明、康生离乌鲁木齐回延安后，盛世才为讨好斯大林，将俞秀松等突然逮捕。

12月下旬的一天晚饭后，俞秀松告诉妻子去反帝会检查工作。17岁的盛世同正在家温课，突来盛世才的四个卫兵，说是督办有事请俞秘书长速去。

9时多秀松回到家，感到情况有异，对娇妻说：“我去看看再说。你先睡吧，明天还要考试呢。”跟随4个卫兵而去。

盛世同次日考罢回家，厨师哭告：秘书长被公安处抓起来了，通知你把洗脸用品和被褥等送去。她立即赶到督办公署质问大哥：为什么无故抓人？盛世才诡辩说：俞秀松参加了阴谋暴动案要杀我，又说俞秀松与托派有关系。盛世同质问有什么证据？盛世才支支吾吾拿不出。

盛世同怒斥大哥：“如果没有证据，我就枪毙你！”

盛世才咆哮如雷，喝令卫兵把小妹抓起来。盛世同怒骂卫兵，卫兵也不敢动手。大哥只好答应小妹去监狱探望丈夫。

在狱中，俞秀松说：“说我是托派，又参加阴谋暴动，真是莫名其妙！这完全是诬陷，一定有人在捣鬼！”

关押俞秀松半年后，1938年6月25日，盛世才决定把俞秀松押往苏联交苏方处置。

俞秀松预感到苏联会凶多吉少，他也知道

王明、米夫等曾诬陷他是托派。在去机场的车中，他对妻子说：“我此去凶多吉少。你要挺起胸膛，不畏强暴。要相信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救星。”盛世同强忍着泪水频频点头。

他又感慨万端地对妻子说：“同妹，我们没能在一起革命、生活一辈子，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你要记住，为革命献身是光荣的。”

到达机场后，他们看到已停着一架草绿色的苏联飞机，几十名苏联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秀松紧紧拥抱住结婚才两年的娇妻，含着泪花说：“同妹，要坚强，多保重，但愿我们能够重逢。”飞机腾空而起，秀松手扬帽子在窗口不断向妻子招手，世同肝肠寸断，昏倒在地。

俞秀松被押到莫斯科后，关在内务部监狱。审问中，当问他是否反对王明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是反对王明的，于是又受到毒刑拷打。不久，他在严刑折磨下死于监狱。

自俞秀松被押到苏联后，盛世同一再找到大哥哭闹，愤然宣布和他断绝兄妹关系，随母亲的姓改名为“安志洁”，表示和军阀哥哥决不同流合污，志在独守贞洁。

她也不要大哥的物质接济，自己振作精神到女中附小当教员，自食其力，并被推选为反帝会直属四分会的负责人。随后，又进入新疆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继续读书。

四年后，盛世才错以为苏联要被希特勒灭亡了，撕下了亲苏的伪装，投向蒋介石的怀抱。

1942年8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到乌鲁木齐对盛世才进行“招抚”，盛世才把屠杀共产党人作为向蒋介石表示忠心的厚礼。经过讨价还价，国民党的军队开进新疆驻守，蒋介石封任盛世才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中央监委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2年9月，盛世才下令逮捕了应他热情邀请来新疆担任财政厅长的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等共产党员，一年后又以绳索勒死，秘密装进麻袋埋在荒山中，并拍了照片送给蒋介石。同时，把在新疆的全部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子女都抓进了监狱。

早在1939年秋天，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主任邓发调回延安时，就对前来接替当主任的陈潭秋说过：“盛世才不仅是野心勃勃的军阀土皇帝，而且是个狼种猪！”

1944年，盛世才不甘受制于蒋介石，又看到苏联红军要把希特勒打败了，又想投靠斯大林，以取得保护。他特地向斯大林写去一封言辞恳切的“悔过书”，表示要重新亲苏，并把一大批在新疆的国民党委员逮捕。同时却向蒋介石发电报说，这些人“都叛变了国民党，是共产党的间谍”。

斯大林当然了解盛世才的阴谋伎俩，把盛世才的“悔过书”转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大为恼火，令盛世才离开新疆，到重庆担任没有实权的国民政府农林部长。

盛世才万分不愿，只好于1944年9月携带32大卡车金银珠宝，带着老婆到重庆就职。

盛世同拒不跟大哥去重庆，仍和母亲住在乌鲁木齐。她听传说丈夫还活着，还到过新疆边境一带，她要留在新疆，等着和丈夫重聚。其实，这时丈夫已死去六年了。

后来，世同的母亲害病，盛世才一再来信请妹妹陪妈妈去重庆治疗，可能是失权之后有所忏悔，他向妹妹一再表示今后再不过问秀松之事，也决不干涉妹妹的自由，小妹愿意到哪里找寻秀松都行。这样，世同才陪母亲到了重庆，但不和哥哥住在一起。

不久，蒋介石、宋美龄向世同和世同的五哥五嫂（五哥盛世骥曾留学苏联东方大学）发来请帖邀请赴宴。世同犹豫再三后决定赴宴以弄清缘由。席间，蒋介石、宋美龄只和她“友



盛世同已改名安志洁在上海寓所

好”地拉家常，关切地询问她的生活、年龄，是否想进大学读书等。第二天，新疆驻重庆的代表张元夫来看望世同，转述了蒋介石的口信，原来是要给参加宴席的一个国民党将军做媒，并规劝世同忘记丈夫，回心转意。世同当即断然拒绝：“我已经结过婚，是有夫之妇。”表示决不再嫁。其时，她芳龄才25岁。

抗战胜利后，世同随母亲、五哥迁回南京，仍不和盛世才来往。1948年，秀松的父亲俞韵琴来信邀她去杭州暂住，并说一定能打听到秀松的真实情况。世同便同母亲去了杭州，但也没有得到俞秀松的确切消息。

大陆解放前夕，盛世才要母亲、小妹和他同去台湾，世同坚决不去，留在了大陆。

大陆解放后，盛世同即向中央写信询问秀松情况，但如石沉大海。后来，当年和俞秀松同机被押到苏联关押在内务部受审的张逸凡回国探亲，才告诉她俞秀松已死在苏联监狱。

1961年，秀松的父亲上书毛泽东，请求明察秀松的不白之冤。包尔汉等几位老同志也提供证明秀松不是托派，上海市委组织部批示民政局：“应当承认其为烈士”。1962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给世同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有毛泽东的签印。

直到1983年，康生死后，中组部才为俞秀松彻底平反昭雪。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这位被埋没43年之久的我党创业勇士才恢复了应有的光彩。

盛世同这时已经61岁，禁不住老泪滂沱。

（责任编辑 刘文）

二战初为犹太人开绿灯的中国外交官

● 伍法祐 伍法同

1938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逐步升级，在全国实行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奥地利境内的许多犹太人店铺都被纳粹军队捣毁，有的老板被关入集中营。这年11月7日，在巴黎，一名来自波兰的犹太人青年，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枪杀了德国驻法国使馆的三等秘书，使希特勒大为光火，于11月18日深夜，全德国及奥地利境内的党卫军和冲锋队肆无忌惮地冲击所有犹太人的住处、商店、医院，抓走2万多名犹太人，其中100多人死于当晚的浩劫中，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亿德国马克。德国法西斯头目戈培尔却给这次罪恶行动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帝国水晶之夜”。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大批奥地利籍的犹太人为了逃命，争相离境，据说维也纳就有13万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逃往国外。许多奥地利人前往美国或英国领事馆领取签证。后因数目限制，加之条件苛刻，很多人只好转向中国领事馆，希望得到一张去中国上海的签证。

此时，中国驻奥地利外交官何凤山，在人道主义精神的激励下，不顾个人安危，发给罗森伯格一家赴上海的签证，并在“帝国水晶之夜”的第二天一早，准备去送罗森伯格一家到火车站。临出发时，罗森伯格夫人突然来电话，暗示家里发生了事，要何凤山不要去送了。何凤山说，自己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要办到，他坚定如约前往送行。但是到了罗森伯格家，才知罗森伯格已经被盖世太保抓走，并正碰上前来搜查抓人的党卫军士兵。气势汹汹的盖世太

保用枪对着何凤山说：“你是什么人？”何挺胸反问：“我是什么人你们很容易查到，你们又是什么人？”他的坚定气度，竟把盖世太保给镇住了。何凤山走后，党卫军问罗森伯格夫人“他是谁”，罗夫人说他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是罗森伯格的好朋友。盖世太保听后吃惊地说：“你为什么不早说？”不久，罗森伯格被安全释放回来。他们一家凭着由何凤山签发的签证，登上了离开维也纳的火车。

从这以后，不管任何人只要提出申请去中国的签证，就能得到中国总领事馆的签发。有一位犹太人一时找不到任何理由去中国总领事馆，回家翻箱倒柜，找到一本中文书，他从书上剪了几个中国字贴在一个信封上，将自己的签证申请装进信封，急忙来到中国总领事馆门前，对卫兵说：“这是一封十万火急的挂号信，需要马上交给总领事。”卫兵看不懂中文，信以为真，立刻放他进去。于是，这位聪明的犹太人拿到了去上海的签证。在此后至1940年4月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何凤山一面与当地美国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秘密合作，用各种方法营救犹太人逃离维也纳；一面实施开放签证政策，无论男女老少任何犹太人只要申请中国签证，马上核发。这件事在犹太人社区中流传开来，中国领事馆前竟被犹太人排起长龙。有时一个月之内被中国领事馆批准入中国境内的签证达四、五百人之多。一次，希特勒邀请何凤山见面，被何拒绝，事后何凤山戏谑地称希特勒是个矮小的、留着可笑的胡子的野心家，我是在履行自己的公务，为什么要见他？据了解，

在何凤山任维也纳总领事直至1940年5月调离时为止，在128500名逃离维也纳的犹太人中有二三千名犹太人是持何凤山的签证离开奥地利的，大部分去了上海，使得上海出现许多犹太人。据说有些犹太人到了上海，为了打发时间，学会了中国麻将，麻将便在犹太人的生活圈子中流行开来。

由于何凤山大量给犹太人发放出境签证，法西斯当局借故以中国领事馆租用了犹太人的房子为由，硬将总领事馆的房子没收了。何凤山并未因此而退却，他将总领事馆搬到了另一处小得多的房子，继续给犹太人核发“救命签证”。

何凤山在签发中国签证时是否遇到其他阻力呢？当时中国政府因接受德国援助，如武器及军事顾问，与纳粹政权维持一定友好关系，为维持中德邦交，不能与希特勒唱反调。中国驻德国大使陈介，就在一次长途电话中，指示何凤山应对发给犹太人中国签证予以限制。何凤山一面唯诺称是，一面仍照签不误。此时有人向大使馆告密，说何凤山收取贿赂，出卖签证，贪赃枉法。陈介知道后，派遣参事丁文渊，在事先未通知的情况下由柏林来到维也纳。他首先调查卷宗，查明中国外交部是否有来电批示对犹太人的签证确实有“开放政策”的训令。当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公开对犹太人的遭遇表示同情，曾提出开辟海南岛以容纳犹太人的主张。丁文渊再查领事馆的签证账目是否有舞弊的情形，经过认真稽查，并无可疑之处。

说起来，何凤山与我们家还有一点“挂角”亲。何凤山的第三任夫人是我在美国二弟的亲家母的胞姐。我们都是湖南老乡。何凤山的第一任夫人为早年在湖南原配，1926年为何凤山生下一子名何曼德，现为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卫生研究院临床研究组主任；何凤山的第二任夫人是一美国人，因她经常虐待何凤山的儿子何曼德甚至拿皮带抽他，而与何凤山离异。何凤山的第三任夫人黄绶荣，湖南醴陵人，今年已有83岁高龄，住美国旧金山。1951年为何凤山生下一女名何曼礼。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家住在重庆城内，与何家相隔不远，二弟与何凤山的儿子同在南开中学念书，我则与何夫人的妹妹黄德荣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同学，好友加亲情，来往密切。多少年来，从未见他谈起过当年在奥地利任总领事为犹太人核发签证的事。何平时举止倜傥，讲一口标准的湖南话。1994年10月，我和爱人去美国探亲，由黄德荣、钟武雄夫妇陪同去拜望他二老，时何凤山已93岁高龄，坐在轮椅上，他拉着我的手说，我真想回到老家湖南益阳去看看，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作一点奉献。他夫人黄绶荣也是高龄，驼背、弯腰，起步都很困难了。最近我在长沙见到黄德荣、钟武雄两老，都是80几岁的老人了，刚从美国回来探亲。钟老说：抗日战争期间，他与何凤山同在情报司工作，是何的部下，也从未谈及在奥地利签证的事。

何凤山1901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县，7岁丧父，他和母亲、妹妹三人靠当时设在益阳的

挪威信义会的救济维持生活。信义会给了他母亲一份工作，让何凤山进了信义会办的学校。后来，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长沙美国教会学校雅礼大学（属大学先修班性质，后改为雅礼中学，为美国耶鲁大学在中国的分校）。1930年去德国慕尼黑明兴大学留学，专攻经济理论，回国后在湖南大学任教授。1933年春，代表湖南参加在美国举行的百年纪念博览会，并在芝加哥大学修习国际公法与英美文学。



1938年任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

1935年一个偶然机遇投身外交，被派往土耳其任职。1937年调到奥地利。何凤山在经历了40年外交生涯后，于1973年退休。在他所著的《我的外交40年生涯》一书中，只有一个段落提及在奥地利为犹太人发签证的事。

1997年9月28日，何凤山病逝于旧金山家中。在他的丧礼中，我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外交人员代表中国政府送去了花环悼祭。

一位中国外交官，用自己的无畏精神和智慧，挽救了数千名无辜的善良生命。他并没有将自己所做的一切向世人宣扬，就是在自己晚年所著《我的外交生涯40年》一书中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此事。这件事似乎已经就要被尘世湮没了。96岁的何凤山在美国旧金山去世后，他的女儿、曾当过《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的何曼礼为父亲写了一个讣告，讣告中提了一句：父亲在维也纳任总领事期间为犹太人发过签证。讣告在报纸上刊出后不久，何曼礼突然接到一位名叫艾立克·索尔的犹太裔历史学家的电话，艾立克自我介绍后问：“你父亲当时真的给犹太人发过签证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这位历史学家于是给许多纪念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博物馆打电话询问此事，都没有着落甚至是否定的答复。不久，经过他不懈努力，终于通过一个犹太人组织，找到了一位持有当年何凤山亲笔签发的去中国上海签证的幸存者。从那以后，不断有新线索被发现，越来越多的幸存者或其子女主动与那位犹太裔历史学家取得联系。其中包括伊斯雷尔·辛格，他是一位

美国亿万富翁，现任全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辛格含着泪水对艾立克说：“我的生身父母是何凤山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我一定要把他介绍给全世界的人。”艾立克对来访的中国学者说：“何凤山将成为一个让中国人骄傲的名字。他不仅是中国人的英雄，也是犹太人、西方人的英雄。”

2000年4月2日，由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11个组织共同合作之下，举办了一个“救命的签证：正义与高贵的外交官”纪念展，推崇在1938年到1945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期间，英勇拯救犹太难民的各国的外交官，而何凤山是其中惟一的一位中国外交官。展览会场上，何凤山的照片放在正中，十分耀眼，犹太人全国基金会同时在展览会场颁奖表彰何凤山等10余位各国外交官。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代表已于1997年9月病逝的父亲接受这份荣誉。同时，以色列外交部表示，将对何凤山颁发“国族正义”勋章。这项勋章自1953年设立以来，共有16000人获得，但其中只有19位是外交官，何凤山是惟一的中国外交官，也是全体受奖人中惟一的中国人。亚洲还有一位日本外交官也获得这项人道勋章的殊荣。何凤山获奖后，他的名字将镌刻在耶路撒冷郊区“正义公园”内的荣誉墙上，让所有犹太人知道，这些人士曾经不顾个人安危拯救过他们，这些人的名字将永垂青史。

（责任编辑 舒元璋）

“一大”闭幕日期尚有争议

最近读《炎黄春秋》第7期周而复同志为纪念党的诞生而写的关于一大的文章，其中对于一大闭会日期，周老认定为7月31日。这点，似乎尚可斟酌。

董必武是一大代表，他在1929年12月31日写给何叔衡的信中，说在李汉俊家出事后，“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这是离1921年时间距离较近的回忆。张国焘是会议主席，1971年他在《我的回忆》中也说，“第二天停会”，

“另觅开会地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则认为，“闭幕日期是八月一日或二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1页）。据当时具体操办人李达的爱人王会悟几次回忆（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都说是8月2日。据上海《申报》载，8月1日这天下午嘉兴有暴风雨，南湖翻船多艘。在这样的气候中开会，似无可能。

所以闭会日期，尚无确论，如按权威部门认识，则是八月一、二日，周老可能不知道。

故将以上情况提供，供参考。

读者 黎平

2001年7月6日

我们潜入河南获取第四次“围剿”计划

● 李 云

1932年春节，当时我在中共上海浦东区委担任青工工作。突然接到组织通知，要调我和我丈夫徐强前往河南开展工作。具体工作说要到目的地时，再详细告诉我。

不久，我们到了河南开封。同时调去的还有李文德、老傅、陈家兴、老王、徐振甲等，都由徐强领导。

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对象是国民党八十师李思朔部的少将副旅长兼该师学兵营的营长惠东升。他是江苏宜兴人，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曾任黄埔军校第一期教官。据说北伐攻打惠州时，救过蒋介石的命，且为人耿直，对国民党的腐败现状，深表不满，牢骚较多。所以，不为上司喜欢，升迁较慢。由于他在黄埔军校的经历，学生很多，交游较广，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有影响。1931年秋冬之交，他到上海看望他的老朋友冯三昧，谈了他看不惯贪官污吏和他们的横行霸道，内心很苦闷。徐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通过一直同情革命的冯三昧去做他的工作。谈了三个晚上，把他说通了，使他从不满国民党转为同情支持共产党。他要求我党派人到 he 部队做基层工作，条件成熟时，把部队拉出来，投奔革命。

当时负责上海特科工作的陈云同志听了汇报，先派徐强去河南实地考察一下。徐强回来汇报了情况，陈云当即决定由徐强率人前去

开展兵运工作。

到开封后，我作为惠东升的“侄女”，住进座落在开封保定巷一号的惠公馆，徐强则作为惠妻朱绮云的“表哥”也住到公馆里。其他几位同志，由惠东升将他们安排到许昌学兵营。李文德任学兵营的文书，陈家兴和徐振甲做总务，老傅被派到惠的老朋友梅治超的游击队司令部任文书，老王未担任具体工作，临时住在旅馆里领导学兵营工作的几位同志。

惠东升的公馆，是一座四合院，颇有点文人氣息，客堂正中挂着一幅山水画，两旁还有一副对联：“三尺青萍千里马，两行红粉一妆书。”据惠东升说，这里指英雄与美人。惠的夫人朱绮云是浙江义乌人，年轻美貌，外表文静。

我的任务在上海已经定好，专任密写情报。惠东升提供的情报为数不少，有许多是“剿匪”的消息，还有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斗与地方头头之间的矛盾等，最主要的他获取了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听说是他去探望国民党政学系的头面人物、蒋介石侍从室的杨永泰，通过杨的秘书（此人是惠的学生）弄到的。徐强拿到这份计划后，喜出望外，急忙交给我。我连夜用药水抄在一本线装的古籍书背后，连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密码本，再将河南全省的军用地图放在一条棉被絮里，打成行李。当时天气还有些冷，这样可以不会引人注意。后

来这些密件，徐强交给老傅急送上海党组织。我们以后回到上海时，中央特派员李竹声（中共中央秘书长）为取得这些重要情报，对徐强口头给予表扬。

大约七八月份，惠东升出人意外地调到驻潢川的国民党二十军张钫的部队，当时徐强对此调动十分警觉，而惠东升却因他与当时河南省主席、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关系比较好，认为没有问题。惠很快准备好一切，把四岁的儿子和奶妈（惠妻的嫂嫂）送到老朋友、军需官朱升谦的家里，还留下一位姓朱的勤务员（惠妻的亲戚）照顾孩子。他自己带上妻子、徐强和我一起去了潢川，临时住在潢川一家旅馆里。第二天上午，惠东升被请到光山张钫司令部，一直到下午四五点钟不见回来。徐强不放心，怕出问题，请惠夫人打电话到司令部。惠东升接电话时告诉她，他有事在司令部，请不要挂念。并嘱咐她，一定不要让“表哥”走了。徐强听了惠妻讲的电话内容，认为很可能出问题了。旅馆不能再住下去，得马上转移。惠妻说此处有一位张钫的侄子，是惠的好朋友。于是让警卫员包克忠带我们去张家。当张钫的侄子听了情况，慌忙商量办法，他建议马上更换服装，明天天亮由潢川北门出城。因为当时商城红军已撤退，很多还乡团和一些百姓要回商城。你们可以天蒙蒙亮混在老百姓中，从北城出去。事情非常凑巧，张钫侄子的家眷，都回娘家去了，家中没有什么人，他要我们在厨房里随便吃一些馒头后，拿出妻子的衣服让惠妻和我换上。

天微明，我们正准备动身，惠妻突然想起身无分文，就叫警卫员包克忠回旅馆取钱，约定在北门外碰头。我们三人向城门走去，这时路上已有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拿着大包小包涌向北城门，我们混在他们里面一起顺利出了城。大约走了三里光景，太阳出来了，只听后面有人在叫“太太”，回头一看，包克忠带了一个身穿军装的年轻人，包说：这位中尉，要太太去司令部。惠妻很不高兴，打了包一个耳光，一言不发地就跟着走了。包克忠等他们回转身时，把手中的30块大洋交给了徐强后，跟着那

中尉走了。

这时，徐强认为去商城这条路线已经暴露，必须另择一条路。我们找到一位老乡，请他带我们沿着潢川城外直奔张钫司令部所在地光山，这是敌人决不会想到的。我们花了十块大洋跟着这位农民沿着潢川城走向光山，大约下午四五点钟到达。俟带路的农民走后，我们继续慢慢地向前走。傍晚时，找到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半夜有军人来查夜，徐强告诉他们因为妻子发病，要带她就医，查夜的看了一下，也就走了。天亮后，我们再经光山走向信阳火车站，走了一天，才到达车站。准备购买赴开封的火车票，一计算还差一块钱，原想把身上的一支钢笔折成一块钱。当我将20块钱交给售票员时，却不料她给我两张火车票外，还找给一块多钱，后来我才知道坐夜车要比白天便宜一些。第二天到达开封，因情况不明，不敢随便乱走，就找了间空屋暂时休息。这是老百姓磨麦子、小米、高粱的地方。歇了一会儿，徐强要我去朱升谦家了解一下情况。朱是浙江人，此人思想进步，惠的好朋友。惠的独生子由惠妻嫂嫂带着，和勤务兵朱某都在朱家。不料，我刚走到朱家门口，碰上勤务兵朱某，他见到我时，很惊讶地说：“你怎么来了？”他告诉我，“原来在惠公馆巷口的黄包车夫都被派出去到处找你们，你赶快走吧。”并说，“明天上午十时左右你再来，我给你一些衣服和钱。”说罢，他走进了屋里，我赶快离开。当我回到磨坊时，屋内空无一人，老徐为了预防万一，离开了那间磨坊，在斜对面蹲着，好像在休息。他看到我时，见后面没有人跟踪，装作偶遇似的，走了过来。我们走到一个墙角说了朱家的情况后，便一前一后地走了一段路，在一个小摊上吃了一碗苞米粥和一个烧饼，吃完走到一个人少而静的地方，商量怎么办？为防止出意外，决定明天不再去朱家。傍晚时，徐强带我去找惠东升的朋友王子清，他是河南省绥靖公署的高级谘议，平日同情我们，估计惠的事情他也知道，而且他不会出卖我们。准备去他那里借钱回上海，加上他的住处，是刘峙的绥靖公署对面，不会引人注意。就这样，大约在下午五六点钟光

景,天快黑了,去了他家。敲门进去,徐强自报姓名,并说明是惠东升的朋友,要求见王子清先生。不一会儿,出来一位年轻人,自称是王子清的弟弟。他说:

“家兄不在家,有什么事情尽管对我说好了,我会帮助办理的。”徐强提出借钱回上海的路费,同时提出借宿一夜,他都答应了,并带我们到厨房里去用餐。厨房很大,饭菜都准备好了,我们用过餐后,正在休息,王子清弟弟拿来了赴上海的火车票,是明天清晨的,另外又拿出二十块钱给我们,并在厨房旁边一间房内,临时搭了一张床,让我们赶快休息,明晨设法送我们走。其实两天确实很累,但我们一直惦念着其他同志的安危,心神极不安定,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恨不得一步能飞到上海,向组织汇报。

第二天一早,我们用完早餐后,外面竟下着倾盆大雨,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利的。王子清弟弟叫了两辆黄包车,预付了车钱。因为雨大,上了车后,车夫用油布将车子围起来,一直送到车站。由于下雨,行人中许多人拿伞,有人把油布披在身上,手里拿着大小包袱。我们跟着人群一起上了火车。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分开坐,装成不认识,如果发生问题,只逮捕一个人,另一人可以回上海向组织汇报。

我们是在陇海铁路上东行,到了徐州转车,坐上京沪线的火车时,徐强才同我讲话。到达上海后,我们回到家中,徐强与组织联系。

徐强写信到联络点,很快接上关系。党中央派李竹声与徐强会面,他代表党中央除对获取的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等重要情报加以口头表扬外,并告诉徐强,惠东升出事后,梅治



晚年的李云和丈夫徐强

超怕出事,请老傅到司令部,送了他数十块大洋,要他赶快离开。所以老傅比我们早到上海。在许昌学兵营工作的李文德和陈家兴因为生活不习惯,在学兵营工作不久已回到上海。至于在学兵营工作的徐振甲和老王情况不明。

几个月后,朱升谦来到上海,见了冯三昧,因为是朋友,他把河南发生的情况一一向冯谈了。原来河南省的党组织派人在许昌学兵营开展工作,有一人叛变,向国民党告密,因此学兵营中的中共组织全部被破坏,牵连到惠东升,认为他勾结共产党。徐振甲和老王一起被捕后,马上给活埋了。刘峙与惠东升关系好,一直想救他,但由于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示:“就地枪决”,刘没有办法,行刑前,先请医生给惠打了一针,然后枪毙,以减少痛苦。惠妻已怀孕,释放回家,不久生一子后,回到浙江老家。又谈及惠妻在潢川北门外被叫回光山司令部,他们得知老徐和我向商城方向走的,立即派出马队追赶,因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当然一无所获。

(李云:上海政协原副秘书长,现年86岁)

(责任编辑 刘家驹)

目击中国远征军 救援英国盟军

● 王楚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在缅甸创造了闻名于世的仁安羌大捷。我是亲身经历过仁安羌大捷的老兵,当时担任指挥入缅中国远征军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的联络参谋,奉派同美军少校梅里尔一道向新三十八师孙立人师长送达史迪威的命令,要该师除留第一一四团卫戍曼德勒外,主力速赴仁安羌救援被困在该地的英军,并责成我们两人监督孙师长执行上述命令。

日军对仁安羌垂涎三尺

仁安羌位于仰光北约450公里,是缅甸的大油田,年产能力达百余万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侵缅日军物资匮乏,一直对之垂涎三尺。驻缅英军受其统帅阿奇博德·韦维尔的“弃缅保印”战略方针的影响,一直没有对仁安羌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只派一支武器装备低劣、士气低落、人数不足800人的第五国境警备队守卫油田区,显然无法抗拒装备精良的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的进攻。就连英缅第一军也没有履行他们对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和史迪威的承诺,该军由阿兰谬退到因河以南,未在新榜卫、米昌耶、缅拉、萨斯瓦、东敦枝等重要地设防,致使日军第三十三师得以乘虚而入,轻易地于4月12日占领了上述各地。

此时,史迪威正积极地组织“平满纳会战”,决心举行反攻,先歼灭中路的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和第十八师团。为此正以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与日军第五十五、十八两个师团在平满

纳以南的斯瓦河一带进行激战,极力迟滞日军前进,消耗其有生力量,掩护第九十六师余韶部和第二〇〇师戴安澜部在平满纳准备反攻,并计划于16日前后举行反攻。现萨斯瓦、东敦枝和米昌耶均已陷敌,这就不但使正在斯瓦河与日军激战中的新二十二师顿时陷入极其危险的困境,而且使正在平满纳附近准备反攻的第九十六、二〇〇两师的右侧背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将会导致“平满纳会战”中途夭折,引发整个缅甸战局逆转。杜聿明鉴于西线战局急转直下,给全局带来了极不利的影响,便于13日清晨赶到马格威会晤英缅第一军军长威廉·斯利姆,要求英军务必坚守因河一带阵地并尽力收复东敦枝,以保中国军右侧背的安全。不料斯利姆竟借口“英军士气低落,军官的威信已下降到了最低点,难以进行坚守”,表示:即将撤出马格威。而且向杜聿明建议:将中国军撤到东沙、敏铁拉、塔泽之线与日军决战。这就是亚历山大于4月16日深夜向史迪威提出的“斯利姆计划”的主旨。杜聿明断然予以拒绝。他返回叶新第五军指挥所后,即命第九十六师派二八七团(刘宪文)第三营(陈国武)收复东敦枝后加以固守。同时建议史迪威、罗卓英至少应由新三十八师派一团进至皎勃东、纳貌附近,防止英军突然退出战线。

14日,斯利姆果然放弃了马格威,并下令炸毁油田。英缅第一军军部便退至归约,第一师率第一、二两旅向披孔退却,第十三旅向仁安羌撤退;第十七师主力和装七旅退至东敦枝以北地区,该师第十六旅退至纳貌附近。此时,英军

司令亚历山大便要求史迪威速派新三十八师进出宾河一带接应英军,另派一个团赴纳貌、东敦枝接应英十七师。史迪威一听勃然变色。他强压着满腔怒火对亚历山大说:“请将军放心,东敦枝已由九十六师陈国武营攻克,贵军第十七师现已退到可柄、纳貌,安然无恙。不过,英军这样地快速后撤,第五军的右侧背已受到严重威胁,看来我们正准备发动的“平满纳会战”就要被英军断送掉,对此,我不能不深感遗憾!皎勃东方面我顶多只能派一个团去。”

英军遭日军全力围击

这时,第六十六师军军长张轸率新二十八师(刘伯龙)和军部到达腊戌,其新二十九师(马维骥)尚在滇西永平、大理地区,新三十八师属该军建制。史迪威遂决心要张轸率新二十八师主力推进到曼德勒,而将新三十八师由曼德勒南移。正在研究调整部署时,15日英军爆炸了仁安羌油田,顿时声震大地,火光冲天,浓烟蔽日,油田区变成了火海。日军第三十三师团长樱井省三见状,心急如焚,即令第二一四联队第三大队(队长高延隆中佐)附轻装甲车队、山炮、速射炮各一中队乘汽车向宾河大桥及北岸疾驰,于15日深夜占领了宾河北岸和大桥,并封锁了一切渡口,切断了英军的全部退路,只有英緬第一师所属十三旅及其配属部队抢在日军到来前,逃到了宾河北岸,并以一部占领大桥后,被日军击破,弃桥而逃。樱井省三另派第二一四联队(队长作间乔宜大佐)主力附山炮第三大队(队长中井正少佐)、工兵第四中队、轻装甲车第二中队强渡因河由新甸、纳貌间钻隙扑向仁安羌东北地区,堵击英军,扑灭油田大火,于16日正午到达仁安羌东北三叉

路口,与退却中的英军相遇,激战多时。日军又派第二一五联队(队长原田栋大佐)附轻装甲车大队主力、独立速射炮第十一中队、山炮第四中队独立二十一旅团炮兵队、高射炮第五十一大队在独立工兵二十六联队协力下,由米昌耶乘船向仁安羌突进,于16日午后2时许占领仁安羌及沿江村落,立即投入围击英军和抢救油田设备的战斗。这样,英緬第一师和战车营就被日军第二一四、二一五两个联队重重包围,压迫在仁安羌东北白塔山和妙峰山之间地区,反复突围,均被日军挫败,处境十分危急。

16日深夜,我为史迪威开车,刚刚从罗衣考(Loikaw)回到瓢背总部,亚历山大在马丁少将陪同下已在这里等候。他一见史迪威便诉说英緬第一师被困在仁安羌内,断粮断水,陷于绝境,请史迪威速调新三十八师前往救援。同时提出举行“曼德勒会战”的所谓“斯利姆计划”,请史迪威考虑。史迪威原来一直坚持要在平满纳举行反攻(通称“平满纳会战”或“史迪威攻势”),现在听到亚历山大这番诉说和建议,他的决心已开始动摇。他决定调新三十八师一二和一一三两个团分别驰援英緬第一师和英印十七师,调一一四团进驻塔泽和卡劳地区作为第五军的机动部队,而将原驻该地的第六军五



梅里尔(右2)向孙立人师长(左1)传达史迪威救援被困英军命令。左2为作者王楚英

十五师第三团(团长李文伦)用汽车运往棠吉布防;并调已到腊戍的新二十八师主力进驻曼德勒师部及第八十三团(团长相励初)卫戍曼德勒,第八十二团(团长梁少雄)守腊戍,第八十四团(团长薛健仁)守梅苗、庙项车站、沙干大铁桥;当即派梅里尔少校和我连夜向孙立人送达命令并监督其实施,我先用无线电报将命令要旨密告孙立人,嗣用有线电话按约定暗语同孙立人联络,得知该师第一一三团已由副师长齐学启率领正向皎勃东前进中,孙师长将亲率第一一二团(团长陈鸣人)乘汽车前来,我们相约在皎勃东会面。

我远征军出奇兵救援

4月17日晨,我们两人在两名中国宪兵陪护下,仍然由我驾车(因梅里尔眼近视且患有心脏病故由我开车),一路急驰,到达皎勃东时,孙师长正好由曼德勒赶到。这时一一三团业已到达,正在休整做饭;一二二团部队尚在途中,团长陈鸣人则率第一营先到。我即向孙师长面交由罗卓英签署的作战命令和史迪威将军写给孙师长的亲笔信(当时按蒋介石4月7日在梅苗宣布的规定,史迪威全权指挥入缅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为史迪威的执行官,凡史迪威向部队下达的命令均用罗卓英的名义发表)。孙师长认真阅读命令和信件后,即召集副师长和各团、营、连长开会,说明情况和任务,要求大家就达成任务的方案各抒己见。陈鸣人主张用两个团由宾河上游坎纳特偷渡,直趋仁安羌东南510高地,从敌军背后发动进攻,可收出其不意以奇袭取胜之效。刘放吾则认为陈鸣人的意见固然可望出敌不意、用奇袭取胜,但我军避开正面之敌,孤军深入敌后,万一敌军由正面出击,断我后路,对我实施反包围,那时,我军将陷入绝境,而难以自由活动。因此他主张夺取宾河大桥,乘敌全力抢救油田设备和分兵围困英军而造成守卫空隙之机,集中全力一举夺501和510两个高地,便能控制整个油田区,日军就可不攻自破,英军之围自能立解。他还建议:“为使正面作战容易并确保左翼和后方安全,

应派强有力一部进出坎纳特和纳貌附近,向仁安羌之敌积极侧击,借以迷惑敌军,并阻止敌军向坎纳特、皎勃东窜犯。”孙师长向与会干部广泛征询意见后,决定采纳刘放吾的作战方案,遂派齐学启指挥一二二团立即乘汽车驰往坎纳特、纳貌占领阵地,派出多股突击队分途深入油田区扰袭敌军,并竭力阻敌渡河北犯;并应与英十七师沟通联络,促其固守待援。另派副团长赵狄率一一三团第三营、师工兵连、搜索连、谍报队、战炮连乘汽车先行出发,在肯耶以南占领掩护阵地,侦察敌情地形,相机夺取大桥。孙师长偕刘放吾团长率一一三团主力和师直属队随后跟进,于当日午后二时到达距宾河大桥约4公里处的小镇肯耶,忽闻前面枪炮声大作,孙师长、刘团长即驱车来到肯耶东南一座小山下,随即攀上山顶,用望远镜四处瞭望,观察情况,命部队在小山附近占领阵地准备应战;令通信连立即与赵狄建立联系,旋即接到赵狄的报告:“占领大桥亘老渡口间约三千公尺正面的日军至少有四、五个步兵连,并有迫击炮、速射炮、山炮十余门,日军的装甲车分别停在大桥和老渡口,估计在10辆以上。我第三营蒋元连和师搜索连分别在大桥和老渡口附近与敌军遭遇现正交火中,现在敌用炮火掩护,出动了两个连和近10辆装甲车,向蒋连扑来;我已将工兵连、战炮连和第三营主力在公路东侧展开,令蒋连沿公路西侧后撤,诱敌前来,予以歼灭。”刘放吾得报,即欲指挥主力由公路东侧抄袭敌后,乘势夺取大桥,肃清北岸之敌,以便渡河进攻仁安羌。正在这时,英缅第一军军长斯利姆在韦尔斯上校陪同下也爬上山头找到了孙师长。他听见刘放吾团长的上述意见后,极表赞成,并恳切地要求孙师长予以采纳,马上实施。他还诉说,仁安羌内被围的英军已断水断粮,处境危殆,请孙师长迅速行动,孙师长很平静地对斯利姆说:“本人和全体官兵要救英军脱险的心情都很急迫。但因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我军只能以奇取胜。现在最重要的是摸清敌情地形,迷惑敌人,第一步是夺取大桥,肃清北岸敌军;第二步便进攻仁安羌,救出英军。”孙师长希望斯利姆鼓励英军务必坚守待援,切勿投降。斯利姆见孙师长胸有

成竹，战术巧妙，计划周全，便很放心地对孙师长说：“我已感觉到在仁安羌被困的英军会在贵军救援下脱险，请接受我真诚的谢意！昨（16）日我率第十三旅进攻大桥想去救援他们，结果却失利了，损失坦克2辆，伤亡官兵80多人。现在我正期待着将军的胜利喜讯。”他说罢，就叫韦尔斯上校留下，自率卫队驱车遄返归约。孙师长见斯利姆一走，便告诉刘放吾不要向前线增兵，立即着手准备夜战和明日拂晓的全面进攻；对于当面来犯之敌，仍由赵狄去对付。

孙师长向刘团长交代清楚后，便带着指挥所和我们一起（我与梅里尔，韦尔斯三人）于15时30分来到位于肯耶南方2公里处、公路东侧一座森林茂密的小山岗上，赵狄与三营张琦营长的指挥所。我看见张营和师直属队已按赵狄的计划在公路东侧森林里、小山上进入伏击阵地，各种火器都处于待命发射中，日军的进路已埋了地雷，在右前方公路及其西侧，数百名日军跟在装甲车后面，借着密集炮火的掩护，正向边打边退的我军蒋元连如潮涌般扑来。时针指向15时56分，赵狄见蒋元连退到了安全区，日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区，他便对着手中的话筒大喊“打”！顿时地雷爆炸，枪炮齐鸣，日军被打得抱头鼠窜，死伤枕藉，有些则负隅顽抗；冲来的装甲车半数被毁，余者便掉头回逃，在宾河南岸的各种敌炮便向我伏击阵地猛轰，弹如雨下，使我军无法还击，敌军残部乘机夺路回逃，激战至16时40分，战斗开始沉寂，清扫战场，发现敌军弃尸112具，还有许多武器弹药。敌军经此一击，士气受挫，方知道是中国劲旅来援英军。是夜，一一三团第一、二两营乘胜袭占敌前沿阵地，积极准备次日的进攻。



——三团团长刘放吾

18日黎明前，赵狄亲率第二营从公路西侧秘密接近桥头堡，第一营从公路东侧秘密逼近老渡口，工兵连准备了渡河器材随后跟进，第三营置于公路交叉口为预备队。孙师长刘团长的指挥所就设在这里，我们中美英三个联络参谋也相随在侧。这时师搜索连、谍报队附工兵一排，已由老渡口东侧在缅甸向导引导下安全偷渡到达南岸，隐蔽在宝塔山中。5时，三颗红色信号弹射向天空，瞬间密集的炮火和轻重机枪猛烈射向敌阵，突击队便乘势冲入敌阵，敌仓惶应战，非死即伤，幸存者相率泅水逃命。至11

时许始将北岸残敌肃清，控制了大桥。但因南岸日军火网严密，射击猛烈，使我军多次强攻受挫，孙师长见状，立命部队暂停强攻，准备夜袭。这时，斯利姆乘坐装甲车来到大桥北岸找到孙师长，声称英军已断粮断水两日，恐难支持，他恳求孙师长立即率师渡河进攻。孙师长再次向斯利姆说明我军只能利用夜战取胜的主客观条件。这时，英缅第一师师长斯考特将军，竟不顾泄密危险，直接用无线电向斯利姆呼救，请求中国军队速来救援，否则就会出现悲惨的局面。孙师长见此情景，便从斯利姆手里拿过话筒，用英语对斯考特说：“中国军队包括我本人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人，也要使你们能在明天脱险，务必请你们再坚持下去。”话筒里又传来了斯考特惊疑地问：“有把握吗？”孙师长斩钉截铁地答道：“请你等着吧！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见面了。”斯利姆在孙师长身旁听见他这番壮语，心情非常激动，顿时面露微笑，连声称谢，并怀着深深的感慨，观看了被日军击毁的英军坦克以及被新三十八师缴获的日军装甲车（仍然涂着英军标志）后，仍然有些忧心忡忡，无可

奈何地只得向孙师长告别。

仁安羌是一个有四、五百幢房屋的市镇,紧靠伊洛瓦底江边,北距宾河大桥约10公里,南至马格威约35公里,宾河在它的西北角与伊江汇合,在马格威南面也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因河,油田区便在宾河与因河中间,区内沙丘起伏,干涸无水,高高井架竖立在长着稀疏灌木丛的沙漠中,只在沿宾河南岸有一条勃固山的支脉横在油田北部,在大桥南岸为白塔山,主峰高501公尺,此山南面还有一座妙峰山,主峰高510公尺,成为区内的制高点,两山间形成了一个有五、六公里宽的盆地,仁安羌居盆地之西,所有炼油厂、给水厂、泵站、储油罐、修理厂、发电站、输油总站等生产设施均在盆地之中。沿着江边还有些渔民、油田工人居住的村落,整个油田区纵横各达30余公里。由平满纳经萨斯瓦、东敦枝至皎勃东的铁路支线从油田东部穿过。日军二一四联队控制着501高地和仁安羌以北地区,成为一一三团进攻仁安羌的主要敌手。日军炮兵群集中在501高地西麓通大桥的公路两侧面,是阻碍一一三团进攻的大障碍。日军二一五联队则控制着仁安羌和沿江地区,成为一一三团攻占仁安羌解放英军的第二道障碍。孙师长摸清这些情况后,命赵狄指挥一一三团一、二两营为右翼队,于午夜后经大桥及其两侧面分途潜渡到南岸,秘密逼近敌炮阵地,以一部袭占白塔山,对守敌及炮阵地予以猝不及防的突击,彻底摧毁后,全力攻占仁安羌,包围二一五联队就地歼灭;第三营为左翼队于午夜后由老渡口潜渡,在搜索、工兵两连配合下,从501高地东侧突击,将二一四联队就地歼灭后,南取510高地,救出英军;各队以第一次炮击为号发起突击。

午夜刚过,斯利姆派英军第十三旅旅长柯迪斯准将率坦克10辆,山炮4门,步兵三营来向孙师长报到,由参谋长何均衡按计划分别予以安排。

19日拂晓,孙师长一声令下:“打!”霎时间炮声隆隆,枪声骤起,隐蔽在敌阵前的各突击队,便在机枪扫射、手榴弹连续爆炸的硝烟中,勇猛地冲进敌阵,用刺刀、枪弹、手榴弹消灭了

一堆堆敢于抵抗的敌人,迅速分别占领了预定的目标。放列在白塔山南麓公路两侧日军第三十三炮兵联队30多门大炮,被一一三团第一营突击队炸毁大半;一部分用汽车拖着大炮向仁安羌逃去的日军,也受到一一三团第二营的堵击,死伤过半;原在白塔山占领阵地掩护敌炮阵地的第二一四联队第三大队(该大队17、18两日在宾河北岸已被我歼灭三分之一),又被我第二营歼灭大部,其残部随敌炮群南逃途中再次遭我第二营堵击,死伤殆尽。正在这时敌二一四联队第一大队(队长德重房夫少佐)在18辆装甲车、4门速射炮支援下,乘汽车由仁安羌赶来救援敌炮兵联队,刚刚驶进仁安羌北方3公里处一个小村庄时,就遭到我追敌已到该地的我第二营和第一营的伏击,击毁其装甲车3辆,烧毁汽车5辆,敌不支,又乘车回逃,赵狄立即指挥所部奋力追击,于上午10时我第一营首先攻占仁安羌,并俘获停在伊江中的敌轮船三艘及汽车30余辆。第二营接着也攻占了拉农、但萨等据点。残敌纷纷经水上或乘汽车向马格威退去。

同日拂晓,在首次炮兵齐射时,第三营张琦营长率搜索连、工兵连和全营一举突入敌阵,正逐步向501主峰挺进时,6时30分被敌狙击射手开枪击中,伤势严重,血流如涌。他在流尽最后一滴血时,仍拼尽最后的力气喊出了“弟兄们,冲啊!”的呼声,闻声赶来的蒋元连长见状大恸,万分悲愤地振臂高呼:“为营长报仇,向鬼子讨还血债!”带着全营官兵一举攻占501主峰和四周敌阵,用刺刀和手榴弹击毙敌二一四联队第二大队长杉浦健太郎少佐以下官兵359人。孙师长、刘团长在战斗指挥所闻讯极感悲痛,由刘团长立即赶往501高地亲自指挥。他一面派人将张营长遗体护送至师指挥所再转运后方,同时命蒋元指挥两个步兵连和工兵、搜索两连在重机枪、迫击炮、速射炮(俘获4门)掩护下,从东侧进攻510高地,经过激战,于9时45分完全占领510主峰和附近敌阵,又击毙敌200余人,敌二一四联队长作间乔宜带着残部南逃。孙师长即命在纳貌的一一二团火速向坡孔前进,堵击逃敌,并电令尚在曼德勒的一一四

团兼程前来仁安羌,以便于明(20)日向马格威进攻,寻找敌三十三师团予以歼灭。并叫我与梅里尔、韦尔斯将战况分告史迪威总部、英缅第一军和罗卓英长官部后即去仁安羌东北英缅第一师被围地区,给他们送去食物和饮水,用汽车将英军全部撤至归约。这时孙师长他哪里知道,当他攻克仁安羌,并准备集中全师兵力向马格威进攻时,史迪威已下令放弃“平满纳会战”,接受了亚历山大的“斯利姆计划”,将第五军撤到敏铁拉、塔泽地区,并已开始从平满纳逐步后撤,却无人向孙师长透一点风。史、罗、杜三人没有这样做,就连当时对孙师长感恩戴德、后在其所著《反败为胜(De-seatinto Victory)》一书中盛赞孙师长“机警、有干劲,优秀的战术家,冷静有进取心,维吉尼亚军校应以有孙将军为荣。在任何国家都是最好的指挥官”的斯利姆(后擢升至元帅,任英帝国参谋总长及澳大利亚总督)也未曾向孙师长透风,只是拖到20日傍晚,英军早已退远,他才通知孙师长撤退。现在回想起来,对当时孙师长的处境之危险(其正是孤军远悬敌后),仍然是不寒而栗的。

被救英军官兵感激涕零

19日上午10时许,我们三个联络参谋(既是聋子又是瞎子,完全被总部出卖了)便随新三十八师输送连乘汽车给仍困在501和510两高地间的英军,送来食物、饮水和医药(卫生队随行)。当我们出现在这些忍饥挨饿了三天,十分疲惫,惊魂未定的英军面前时,他们都高兴得像孩子似的,乱喊乱跳,激动得泪流满面,有的把衣帽抛上天空,有的抱作一团,大多数则是跑来拥抱着我们,亲吻我们,把中国兵抱起来向上抛,狂欢达到极点。这时使我深深感到当一个人面临死亡到来却突然获救时的心态和神情是多么的奇异啊!这些英军在饥渴和死亡威胁中煎熬了三天三夜,他们几乎是奄奄一息,人的求生本能驱使他们应该以食物饮水为第一需要。可是当时他们竟置食物饮水而不屑一顾,却是那样主动而狂热地紧紧抱

着我们这些同他们素不相识的中国兵,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狂欢。此情此景,使我不禁为之动容。尤其是师长斯考特准将,在人丛中找到了我们三人更是同我们的手合在一块紧握不放,他热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地说:“快带我去见孙将军。”经我们一再说明,孙师长正在指挥部队追击逃敌,清扫战场,部署防务,很忙很忙,叫他赶快整顿部队,速乘汽车去归约,向斯利姆报到。他却全不理睬,固执地要见孙师长,而让赶来接他的第十三旅旅长柯迪斯准将收容整顿部队。他带着第一旅旅长法威尔,第二旅旅长波凯随我们爬上501高地。他一见到孙师长,三人同时肃立敬礼,随后拥上前去张开双臂,把孙师长紧紧地抱住,声泪俱下地道谢。孙师长的军上衣都被斯考特的泪水染湿了一片。我们站在他们身旁目睹其情,深为感动,至今难忘。

这天下午3时,综合各部队报告,发现敌军弃尸达1200多具,我军也伤亡了522人。救出英缅第一师官兵7000多人,大炮30多门,坦克60多辆,汽车300余辆,马骡千匹。还有被日军俘去的英美的记者、教士等500多人。俘获的日军武器、弹药、器材、粮食、药材、车辆、舰船甚多。此役成了轰动英伦、饮誉全球的仁安羌大捷。后来英国政府给孙师长、刘团长等有功官兵分别颁授了勋奖。各国的新闻媒体对仁安羌大捷作了广泛的报道,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几十年后,仍使不少历史学家、战史研究人员都把目光投向仁安羌大捷。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甚至感到愤慨的是:英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在其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竟只字不提仁安羌大捷。另一位英国记者、作家亨利·莫尔在他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一书中,他只写了“英帕尔”和“仰光”,却没有写仁安羌,更没有写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之战。而台湾的战史巨著《抗日御侮》一书,对此也只作简略的概述。如今,我已是此役的亲身经历者中尚存的一人,有责任向世人说出真情,以存历史之真实,而慰先烈于九泉之下,故作如上略述,以补遗缺。尚望知情者给予补正,以臻史料达于完整真实之境。(责任编辑 刘文)

写好自己的“起居注”

● 刘恩启

宋代司马光著《涑水纪闻》，保存了不少正史没有记载的珍贵资料，其中有关宋太祖赵匡胤几则轶事，看了就很有“嚼头”。且看这一则：

有一天，宋太祖没事偷着乐，在后宫苑里用弹弓打雀玩。忽有侍御史张靄说有急事要见，皇上听罢汇报，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事情，很是扫兴，愤而质问为何小题大做？这老张是个直肠子，便实话实说：臣以为这些小事，也比打雀要紧。皇上更老羞成怒，抄起柱斧柄敲掉他两颗门牙。张慢慢俯下身，捡起落齿揣在怀里。皇上怒问：你想以此为证，告我的状吗？张吐了一口口水答道：为臣不能状告陛下，但自有史官将此事写进史书。宋太祖听了为之悚然，立马转怒为愧，对张靄好言抚慰，还赏赐了一大堆金银财帛。

你道那赵匡胤为何一听“写进史书”就害怕了？原来，封建社会里皇权虽然至上，皇帝老儿可以为所欲为，但一些较有作为的帝王为着延续其“千秋基业”，还懂得检点自己的言行，采纳臣下的正确意见，对史官不得不有所忌惮。这还有宋太祖另一则轶事为证：一次早朝后，太监问他为何闷闷不乐，他说，你以为当皇帝就那么容易吗？今儿早上我图一时痛快，下诏办错一件事。他生怕史官把他的过失记下来。

历史确实是无情的。前边说的宋太祖错打张靄这件事，尽管宋太祖采取了补救措施，并且“不耻下贿”，想用变相送礼来堵住张靄的嘴，但史官并未“为尊者讳”，他这档子事，还

是被记载于“起居注”，由《涑水纪闻》流传下来。

史官记录帝王言行的“起居注”，在我国由来已久。商周时已有史官记事，春秋时对帝王言行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的说法，此后历朝历代，几乎都设有专职史官，侍从皇帝，职掌记录其言行，编撰起居注，作为修史的重要依据。他们中不少人像晋董狐、齐太史那样秉笔直书拒粉饰，不隐欺，还历史本色，给正史增加了分量。

贞观年间，唐太宗问褚遂良：爱卿掌管起居注，都记载些什么呢？身为皇上能不能看一看？褚对他说：如今的起居注，即是古代的《左传》，记录皇上的所言所行，并且还要评判是非善恶，作检点警示之用，以求皇上不行非法之事。因此之故，没有听说皇上要亲自审阅的。唐太宗又问：“我有不良之事，你也要记录在案？”褚又答：守道义不如坚守做官的本分，我的本职工作就是记载起居注，你的言行必定要如实记下来。此时站在一旁的大臣刘洎也进言：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必定要记。这件事见于唐刘肃《大唐新语》，说明即使像唐太宗这样颇具文韬武略的英主，对起居注也是心怀敬畏的。

话又要说回来，封建社会毕竟是封建社会。纵观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史，诛杀史官者，篡改史事记载者，迫使史官“隐恶扬善”者，比比皆是。不过，凡这么干的，迟迟早早难逃历史的惩罚。恶行可隐瞒一时，无法隐瞒永终，一旦真相暴露，留下的便只有千秋骂名了。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主张“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毛泽东语）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身边，当然不会有人随时记载我们的言论行动。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写自己的历史，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写自己的历史。一个人的历史是光彩还是阴暗，是光荣还是耻辱，都由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写就，谁也逃不脱历史的考核。

我以为研究和借鉴一下古时的起居注，提

副部长与院士

● 李 晋

《我与石油有缘》，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侯祥麟的自传，刚刚出版，他送了我一本。我们是六十多年的老朋友，我读过他的原稿。书中他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香港化学会与中国化学学会联合召开关于精细化工的学术报告会，邀请我和唐敖庆做报告，我做了充分准备，会议先在香港后在广州举行。我申请赴港，但港澳办不同意我去，他们说副部长级干部去做学术报告，规格是否太高了？”结果两人都没有去成。侯氏当过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唐氏也担任过副部长的职务。

包括院士在内的学者专家与政府的部长、副部长本来各有所司，也各有所长。虽然政治家不可太无知，外行领导内行难免出错，但是从政与从事学术与科研毕竟是两码事，打锣卖糖各有一行，是不必相提并论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比的。举例来说，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两个大错，一个动员全民打麻雀的千古大笑话和一个人口越多越好的千古大祸害，当政者缺乏有关的专业知识不要紧，不必深责，只要咨询专家并且尊重专家的意见，这两个大错本来都可以避免。

倡领导干部“写”好自己的起居注，对领导干部是有好处的。

一是，管住自己，战胜自我。古时皇帝的“起居注”由史官来写，是被动的、他律的，我们提倡用自己的言行写好自己的“起居注”，是主动的、自律的。哲人有云：“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我们的干部有了自审意识，做到自省、自警、自重、自励，“戒慎恐惧地工作”，（周恩

但是，如果偏要把这两者连在一起，偏要比一比的话，我就很赞成侯氏的意见。他接着写道：“这种事我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发生。一个身为副部长的科学家参加国际学术界的活动并应邀做学术报告，应该是一件提高国家声誉的好事。”

侯氏这样说很有道理，我想我们还不妨算一笔简单的账。试看新中国建国以来，当过副部长的人有多少，如果再加上部长，数量更大；另外统计一下，我国这两院的院士一共有多少。然后拿这两个数字比一比，差距该是很大很大的吧。这差距，是不是可以说，部长副部长人数很多很多，可谓人才济济，要多少有多少。相比之下，能取得院士称号的就少之又少，真正应该说是凤毛麟角，他们不是什么什么官，不是只要有人任命，人人都可以当得的。

这几十年人们越来越看重做官，重视官位。这是我国封建的老传统，古已有之，不过于今为烈罢了。把各行各业都纳入文官系列，有个现代名词，叫做官本位。佛门本应六根清静，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料竟也出现了处级和尚、科级尼姑之类。我不知道这官本位是不是妨碍他们和她们潜心修行，这事无伤大雅，不必多说了。我想着重说的是，如果这种体制和心态不快快改变，驱使着年轻人个个只想当官，大家沿着仕途奔竞而去，不愿下功夫做学问、不愿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科教兴国”的大业可就要落空，在飞速到来的信息时代我国就更要落后了。

从上到下，快快醒醒吧，快快把那封建的东西官本位丢到东洋大海里去吧！

来语）就不愁走不好人生的每一步。

二是，管住小节，防微杜渐。一个人的变坏，总有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赵匡胤正是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不久又统一中国、建立大宋王朝之后，一度滋长了骄奢之气的。好游猎、喜燕饮、尚嬉戏，因此而怠朝政，轻国家。这就不再是小事了，因为其中潜藏了极大的危险。

（责任编辑 洛松）

列强畏忌的 清末刚烈名臣李秉衡

● 魏文华

百年前,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在强逼清政府签订的《辛丑和约》中,借口以针对义和团与洋人作战、杀洋人,提出一份“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的12人名单,更为荒谬的是,竟把根本与义和团无关、且在条约签订前一年已去世的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名列其中。因人死无法用刑,条款竟要清政府“追夺原官,即行革职”。

李秉衡为何如此遭八国联军和李鸿章之辈的痛恨呢?因是他从中法战争起,对付侵略者无所不在,为英、法、日、德等列强所畏忌,人死了也要列入“首祸诸臣”而追罚。

李秉衡1830年出生在奉天海城,未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但却博览群书,兼习武艺,他惯使一把铜锤,号“铜锤李”,但后来他却一直是在文官道路上起伏。

李秉衡在太平天国时期到清军的江北大营听差,以军功受保举为直隶省知县,升过知州、知府,由于清廉刚正,号称“北直廉吏第一”。在蓟州任上,朝廷刑部派来的一群官吏在办案中索取贿赂,李秉衡在劝阻无效之下,痛笞了那些“小钦差”,为此惹下大祸,不久被革职丢官。

李秉衡在朝野享有清廉刚正的名声,几年后被人举荐为山西的知府,尚未到任,又升为广东的道台,接着又调任广西按察使,正逢中法战争爆发,他全力投入到反侵略战争中。

中法之战中国打了胜仗,清廷却与敌国订立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引起朝野群声指责。在国际上,各国嘲笑中国打了一场“不败而败的战争”。从此列强视中国软弱可欺,纷纷向中国伸出了掠夺之手。

中法战争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场陆战大胜逼使敌人主动求和的战争,李秉衡对胜利起过重大作用。他初到广西时,法军已占越南全境正向广西边境逼近,清军节节败退。李秉衡来到前线,面对如此紧急的形势,他加紧筹运军粮,不分本省的主军和从外省调来的客军,都一视同仁。他命令下属自奉刻苦,节省钱物赏给有功者和抚恤伤亡者。总兵杨玉科在前敌阵亡后无人过问,李秉衡亲自迎回尸棺,设祭吊丧,使诸军无不感泣。他又创立医药局,为伤兵裹伤治病。

经过李秉衡调治,各军退有所归、伤有所恤、守有所养,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扭转了混乱局面,军心民心稳定,使龙州一带成为向敌反攻的基地。

当1885年3月23日法军分三路又向关前隘攻击,李秉衡以代理巡抚的文官身份亲临前敌,与武将冯子材一起督导各军奋勇反击,攻克了文渊、界牌,直趋谅山。

在谅山攻击战中,李、冯二人兵分两路,秉衡从正面攻驱驴,子材出右翼奇袭谅山,于3月29日晨击败法军以后,二人同时进入谅山城。是为著名的谅山大捷。当时的前敌最高统帅钦差大臣彭玉麟向朝廷奏捷时称赞李、冯二人的功劳说:“两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秉衡因功升任广西布政使代理巡抚。

正当谅山大捷,又在临洮击败法军的时候,李鸿章奏请朝廷“当藉谅山一战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朝廷遽纳其议,立命停战。李鸿章签约后,令诸将皆退还边界,将士皆扼腕愤痛,不肯退兵……

李秉衡既恨战胜后退兵,又痛于为了输

送粮食接济部分应越南国王挽留不肯撤退的中国军队，而受朝廷责备，更反对李鸿章派来的勘界大臣慷国家之慨出让土地的卖国行径，气得吐血后忿然辞官，回到河北满城隐居。

1894年，李秉衡在满城隐居地接到要他担任安徽巡抚的诏命，他借病不肯赴任。但当他听见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后又接到朝廷改任他为山东巡抚的诏旨时，李秉衡立即受命起程，9月中旬抵达山东省会济南接印后，下旬就驰赴战云密布的胶东，视察沿海防务。

李秉衡在视察中发现海防薄弱，奏请朝廷立即成立一支野战精兵，以巩固北洋水师威海的基地，但未被朝廷采纳；他又再三呼吁增兵山东，而总统北洋水师大军的李鸿章反而把山东的一支精兵抽去支援辽东，结果辽东没有保住，反使胶东的水师基地后防更加空虚。李秉衡当即动用山东本省的财力招募20营新兵，尚未训练完毕，胶东就已烽火报警了。11月24日，日军侵占了辽东旅顺后，又指向山东。1895年1月25日，日军从龙须岛登陆占领荣成，1月30日占领威海，切断了北洋水师后路。北洋水师在敌水陆两面夹攻下，全军覆没，水师提督丁汝昌自尽。

威海失守和北洋水师覆没以后，李秉衡看出了日本援军不济、财力不厚无法坚持长期

战争的根本弱点，坚决反对李鸿章赴日议和，力主整军再战。特别是当他听到日本所提割让辽东和台湾列岛及二万万两赔款等无理要求时，从4月19日至25日，七天中连续两次上疏，力阻和议，提到与其赔偿巨款，不如“用此巨款以养战士，以二十万人计之，每月只一百余万，多计亦不过一千数百万，如能战胜则赔款可以不给，而中国可以自强”。他还愿意带兵杀敌：“臣虽老疲，愿提一旅之师，以伸天讨，即捐糜顶踵亦所不惜……”他还指名参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与倭交好甚密”。苟安的朝廷当然不会听他的意见，仍由李鸿章、李经方父子二人一字不易地接受了日本的条件，签订了割让宝地赔偿巨款的《马关条约》。不出李秉衡所料，条约签订后果然助长了“各国覬覦之心”，很快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潮，5年后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惨祸。李秉衡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又一次气得吐血，再次上奏朝廷请求辞职，朝廷只给假一月养病，假满后又奏，只准续一个月假。

甲午战争两年后，德国军队借口山东巨野县两个德国教士被杀而在胶州湾大举登陆，驱逐中国驻军，抢占青岛一带港口。这时，李秉衡已经于一个半月前奉旨调任四川总督，正向新任山东巡抚办交接手续，在这紧急关头，他



黑旗军抗法镇守北宁图

毫不犹豫地负起守土卫边的责任。他一面从本省就近调兵增援胶州海防,一面致电朝廷分管外事的总理衙门,表示如果外交交涉不成便以武力驱逐德军的决心。

正当李秉衡积极调兵准备收复失地之际,他却奉到朝廷总理衙门发来的命令:“敌情虽横,朝廷决不动兵。”李秉衡复电总理衙门竭力陈述:“现在教堂布满天下,一处如此,处处效尤,中国何以自立?其患一。中外交涉,全凭条约,被无端据我要害,逐我防军,揆其情势,即盗案办结后,胶澳必不肯退。此地为各国所垂涎,若竟以畀德,他国群起纷争,条约无凭,恐各海口皆非我所得有,大局何堪设想?其患二。朝廷取将,全凭赏罚,我军驻守之地,守将节节退避,任敌人据我营垒,封我炮火,如入无人之境,朝廷不加之罪,恐各处将领皆以不战为顾全大局,设有战事,谁肯为朝廷出死力?其患三。在朝廷本以不战杜后患,衡以为战之胜败虽不可知,而患只在一国,不战则各国皆思攘夺,患更不可胜言……”巨野教案处理以后,并向德国作了赔偿,而侵占胶州的德军果然不但不退兵,还向四处扩充占地,并由此引起了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和九龙、法占广州湾,形成各国瓜分中国的狂潮,两年后又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巨变,完全证明了李秉衡上项电文中预料的各点。清廷以李鸿章为首的总理衙门,不但拒绝李秉衡的正确抗战主张,而且任凭敌军指地为界,与德国签订了出让胶州和青岛的协定。李秉衡一怒之下,上疏奏辞了四川总督,赴河南安阳隐居养病,心灰意冷地脱离了腐朽的官场。

李秉衡最后一次起伏,是在从山东辞官到河南安阳隐居2年以后,此时列强纷纷强占租界、划势力范围。1899年11月18日,他忽然接到了朝廷任命他为“长江水师巡阅使”的诏旨,他立即以“拙庸衰惫”及不懂水师为名,上奏“恳求收回成命”。在接到又一道诏旨“著不准辞”的时候,他在“奏谢”的奏折中讲出了心里话:“臣素养性迂拘,不善办理洋务,久荷圣明洞查。在臣初心,岂欲为朝廷多生枝节?此番奉命巡阅长江,沿江一带人心浮动,毁

堂闹教之案层见迭出,痞棍必假臣之姓名,洋人必以臣为口实。惴怀不安,意实由此。”虽然不敢明白拒绝任命,但随后另具奏折请病假,在两次请病假未能获准辞官以后,才不得已,接受了朝廷任命。

1900年3月,李秉衡带几名亲兵,乘一叶扁舟,从武汉沿江而下,一路查看水师舟船和炮台,于5月24日行抵江苏省会所在地苏州。

此时,八国联军于6月17日攻占大沽炮台后又向天津进攻。19日清廷决定宣战,并招抚义和团抗击敌军。李秉衡虽然与江南五省的总督巡抚联名反对招抚义和团,并在发往朝廷的电文上名列首位,但他也反对江南总督们勾结英美谋划的划江独立即所谓的“东南互保”,决定遵照朝廷宣战的诏旨,从长江反击敌军的入侵。他从苏州赶到江阴炮台,对将士们说:“江阴为长江门户,我们务必守好这扇大门,不放敌军一艘一船过境!”他不知道,在他到来之前,炮台官兵已奉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密令将所有的炮栓一律拆除了。他扶疾视察炮台,并在炮台边安设营帐以示与将士同守江阴,生死不离之决心。

但他在炮台只住了一天,当天深夜,李秉衡就接连收到两份来自南京的内容相同的急电,让他速去南京商议紧急军事。李秉衡当即登舟,冒着暴风骤雨溯江而上,抵达南京。

两江总督刘坤一告诉他:“现在津京形势甚紧急,朝廷有旨,令各省派兵勤王入卫京师。兄弟本当亲自带兵北上勤王,无奈贱躯多病,又加守土有责不便擅离职守,惶恐无计,特邀鉴翁降尊莅宁,当面聆教,请问鉴翁如何是好?”

“我去!”耿直的李秉衡不知道这是刘坤一的调虎离山计。由于李秉衡在上任途中,沿长江视察防务时已经向朝廷参劾了刘坤一的部下大将水师提督以下数员贪官,引起了刘坤一的惶恐和忌恨。昨天又闻报李秉衡要从江阴拦截外国船只,使联英独立的刘坤一更加恐慌,决心要把李秉衡赶出江苏,故意用勤王计来诱激李秉衡。

刘坤一听李秉衡这样一说当然非常高

兴,准备拨亲兵二百名随行护卫。他问李秉衡何时动身北上?李秉衡说:“救兵如救火,我明天就到扬州,从那里直接北上。”

时当盛暑,从江南带来的二百名护勇,有一半人吃不得辛苦返回江南去了,年过七旬的李秉衡带病赶路,到北京时天津已经失守。京

都形势十分紧张,他接受了武卫军帮办的衔名,奉命到京东去收集溃兵迎击八国联军,收复天津。他向西太后请求从京城拨些兵随他出征。可是武卫军总统荣禄当即推辞:“京中的兵保卫内城还不够用。”李秉衡就请求召募一万人再赴前敌。荣禄说:“形势紧急,临时募兵来不及了。”秉衡无奈,再请求给他拨些枪炮子弹,荣禄说:“弹药可以向山东搬取。”可是下朝以后,李秉衡到荣府请荣禄书写令山东给拨子弹的札谕时,荣禄说:“我说过到山东搬取弹药的事吗?到山东路途遥远,恐怕来不及吧?”李秉衡说:“到山东来不及,就请中堂在京中拨些弹药给我。”荣禄说:“京中的弹药还不够用,哪有多余的给你?”

李秉衡没有领到弹药,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借用天津、大沽口的地图,得到的答复是:“没有!”

李秉衡1900年7月27日抵达京都,奔波十日,仅凑起一支500人的亲兵和幕僚,于8月6日誓师出征。可是到京东,想与几个带兵的将领宋庆、马玉昆等开个军事会议都无人听令,名义上拨归他指挥的四个总兵也都不知去向。他在羊房拦住从山东来的旧部夏辛酉军,马上组织起这支部队与八国联军的前锋部队打了一仗,并将敌击退。但因为没有援军,夏



清军与义和团在杨村抗击八国联军图

辛酉军也被迫后撤。李秉衡看见大势已去,决心以身殉国。部队退到张家湾后,李秉衡停下来,写了一份揭劾诸将不听调度的“遗疏”,对儿子说:“你留下给我收尸,但不许从殉,从殉无益,是大不孝也!”他把随身带的毒药从容吞下。对留在他身边的幕僚和家人说:“我这一次北上勤王,明知是自投罗网,但却没有想到世事如此沧桑冷漠。我明知有陷坑,而鼓勇上前自陷此坑,是为国家争一口气而已。我死不足惜,可叹国事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步,我也顾不得了。张家湾是我的最后归宿地,诸君各自为计,自投生路去吧!”

李秉衡死后,有幕客3人从殉。一为编修回族人王廷相,先已放山西学政,在京中因为景仰李秉衡的为人,带着儿子一同参加李军,始终不愿离去,看着李秉衡气绝后,父子二人携手同时投河自尽;另一人为汉军旗世袭子爵叶钟祺,随李秉衡从长江入京勤王,帮助李秉衡的儿子李可亭把老人的尸体运回河南安阳城西原隐居处安葬后,上吊自缢以殉李公。

当时有人写诗颂李秉衡曰:

南越东鲁建战功,北国勤王疾如风;
白发孤臣满腔血,死后请军化沙虫。

(责任编辑 方 隍)



林则徐还是个抗洪英雄

● 刘葵华

民族英雄林则徐抗御外侮，销烟禁毒，在我国几乎无人不知，妇孺皆晓。但他在治水抗洪，为民除患的斗争中亦屡建功业却鲜为人知。笔者最近访问了开封郊外黄河下游的“林公堤”，参阅了林则徐抗洪治水的历史资料，访问了有关专家、学者，了解到这位民族英雄同时也是一位抗洪英雄。

从河南开封市北行9公里，就能看到黄河下游著名的防洪工程——柳园口险工。险工地段用大石块镶嵌的坝、垛、护岸一道接着一道，约束着滔滔的黄水，向东流去。险工的第39坝以下有一段9公里的堤段，就是168年前洪水泛滥时由林则徐率领士卒民夫堵口抗洪修筑的大堤。这段堤坝经过解放后几十年的整修加固，已形成一道“月牙形”的大堤，屹立在黄河南岸，成为开封市一道防洪屏障，护卫着古城开封，岁岁安澜。为了纪念林则徐的功绩，1992年，开封市政府将这段黄河大堤命名为“林公堤”，并在堤上塑立林则徐雕像，作为对开封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古时的黄河并不从开封流过。公元前361年，魏国迁都这里，兴建大梁城垣。那时黄河由大梁城西100多里的荥阳（今郑州市郊区）从东向北经河北、天津入渤海，行洪1000多年。北宋建都开封称东京。当时的开封十分繁荣，汴水、金水河、五丈河、蔡河横贯城区。

但到金、元以后，黄河经常溃决改道，逐渐逼近开封。自公元1128年到1855年的元、明、清几百年中，黄

河河床不断淤高，时常决堤泛滥，河道南移，经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夺淮入海。开封一带是平原沙质土壤，河床越淤越高，成为地上“悬河”，设防水位高出开封市内地面达13米之多。据记载从公元1128年到1855年的700年间，黄河在开封一带决溢最频，其中6次洪水灌入城内，“庐舍荡析，沙淤漫衍，汴水等河流被洪水淤没”。据史料记载，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黄河大堤决口，开封全城覆没，淹死30多万人，开封东南“泛区六七百里，尽成巨浸”。昔日繁华似锦的北宋东京皇宫遗址，被泥沙掩埋于地下九米之深。

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黄河再次堤决城破，这次溃决，是历代6次水淹开封城较严重的一次。《汴梁水灾记略》记载了当时的惨象：“祥符（开封）四郊居民淹毙者十之四五，附堤居民皆奔赴堤上，多半不及携带衣粮。其他村落或升屋聚号，或攀树哀鸣，往往数日不得食，无人拯救，饿死树上屋上，或有饿极投水死者”；“受灾地区有河南、安徽两省5府23州县，泛区800里”；“洪水流过，人烟断绝，有全村数百家不存一家者，有一家十数口不存一口者，凄惨不堪言状。”

水淹开封城，形势万分危急，道光皇帝派大学士王鼎赴东河主持祥符大工。王鼎深知林则徐对治河抢险有研究，经验丰富，办事认真，就想请他出来帮助治水抗洪。但这时林则徐已因虎门销烟抗击外侮而遭到投

降派的诬陷，被革职发配往新疆伊犁。王鼎再三上奏请道光皇帝，恳留戍遣伊犁的林则徐襄办祥符堵口事宜。皇帝允准林则徐“折回东河效力赎罪”。祥符绅民闻“林制军将来，无不喜跃，额手称庆”。这时林则徐正在戍遣途中，他在江苏扬州接到道光皇帝谕令，就从扬州日夜兼程赶到开封，住下汛六堡（今开封郊区小马圈），协助大学士、钦差大臣王鼎堵塞张湾决口。他目睹洪水肆虐，生灵涂炭的惨象，悲愤难抑，夜不能眠，奋笔写下血泪诗句：“鸿雁哀声流野外，鱼龙骄舞到城头”，“狂澜横决趋汴城，城中万民皆哭声！”

当时开封城已被洪水围困数月，有些官吏对堵口失去信心，提出迁城主张。对此，林则徐斥之为“咄哉此论乘舆评，三诰奚必同盘庚”，坚决反对那些人模仿商朝盘庚多次迁都的做法。决心率领士卒和民夫，抢堵决口，保住开封城。他卸下行装，背负着国难与水患的双重创痛，立即奔向张湾黄河决口处。他“朝夕驻坝”，“与士卒同畚鍤，一切事宜，在在资其筹画”。他查看张湾决口，决口口门达303丈，决口原因是汛期形成湍激横河冲开河床高滩，激溜冲向大堤造成的。他决定先在被冲开的河床高滩处开挖挑河，堵住激溜冲向大堤口门。然后，在张湾决口处分左、中、右建三坝向中间抢修“埽工”。他带领民众经过几个月的抢修，正当决口即将合龙时，突然上游一场凌汛急冲而下，冲开口门。林则徐毫不气馁，坐镇工地，率领士卒和民夫继续抛石压埽护坝。到第二年（公元1842年）2月，历经8个月的努力，率众修筑了从马头到小马圈的防洪新堤，并在张湾村北不远的柳园口胜利合龙，堵住了决口，使黄河重回故道，解救了被洪水围困的开封城。这次堵口，共修筑大坝303丈，其中正坝埽宽15丈，上水边埽宽7丈，下水边埽宽5丈。两坝上边埽及金门抛石4段，坝外厢做护埽6段，共长81丈，抛护石一段。这次堵口共支出白银600多万两。

张湾堵口成功，黄河重归故道。王鼎奏请皇帝嘉奖堵口有功人员，并请求给予林则徐“立功赎罪，免遣伊犁”的奖励，但道光皇帝没有“恩准”，下旨令林则徐“仍往伊犁，效力赎罪”。王鼎及其他获奖官吏都木然了。王鼎在柳园口含着热泪给林则徐送别时，林则徐却坦然赋诗：“塞马未堪得与失，相公且莫涕滂沱，公身幸得千钧重，宝剑还期赐上方”，随即动身赴伊犁上任去了。

据史料记载，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曾担任过专职

河道官员。《河南黄河志》记载：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十一月，林则徐被任命为河东河道总督，管辖山东、河南两省黄河、运河修防事务。为治理黄河和运河，他上任后首先视察运河，又西行由曹州、考城厅上堤，循着黄河北岸，对各厅逐一视察。然后，由黄沁厅渡河至南岸，沿着南堤一一检查。林则徐深知河官偷工减料、中饱私囊历来都是从治河料物上做文章。料埽为修埽防汛的“第一要件”，“修防第一要件即为河工第一弊端”。他沿堤检查时“无一垛不量，无一厅不拆”。当查出兰义厅蔡家楼料埽虚假有弊时，当即撤销兰义厅有关河官之职，令其赔偿损失。道光皇帝说：“向来河工查验料埽，从未有如此认真者”。

林则徐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当他听到“险工紧急，溃坝塌堤”，用碎石“力加抛护，即不至于溃塌，功效甚著”时，就亲自到“坝前有石之处，细心测量，悉心揣度”，并自己动手试验，证实了治河官吏及河工此说的正确性。他总结说，埽工过陡，则大溜湍急时，“易于淘深，是以埽前之水辄至数丈，埽工难免有坍塌之虞”。如果埽前抛以碎石，在水中“铺作坦坡”，则可以“假护堤根，并可迂回流势”，肯定了群众的创造。此后，黄河修堤筑坝和抢险中都大量使用石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曾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的徐福龄，称赞林则徐是“黄河修筑石坝护堤的创始人之一”。

据记载，林则徐从公元1824年夏秋之际总办江浙两省七府水利起，直到公元1841年秋至1842年春到河南祥符襄办堵口的10余年间，他汗水洒遍长江、淮河、黄河、汉水流域及运河两岸的灾区和河工工地。先后治理了海塘；指挥了洪泽湖高家堰黄河大堤堵口修坝；规划了江浙七府水利；并在湖北修筑堤防，制订了“修筑堤岸章程十条”，处处表现了他卓绝的治水才干，

他在开封抗洪治水成功，但仍被道光发配到伊犁后，在戍疆三年中，仍不忘为边疆兴修水利，造福各族人民。三年内，他行程2万多里，踏遍天山南北和伊犁河畔，共查勘土地68万多亩，率领各族群众和士卒兴修水利，开挖“坎儿井”，引水灌田抗旱。至今伊犁地区各族人民还把“坎儿井”称为“林公井”，表达了广大群众对林则徐的深切感激与怀念之情。

（责任编辑 林 耀）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

● 李 凌

清王朝第四位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公元1711年,1735年即帝位,翌年改年号为乾隆。乾隆帝享寿89岁,在位60年加上3年太上皇,可称是中国历史上享寿最高,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了。

乾隆承其祖康熙、其父雍正的余绪,仗全盛的国力,平定边疆,为我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史称“康乾盛世”。

文坛上关于记述乾隆的野史、文章很多,特别是近年来“戏说”的电视连续剧广泛传播,把乾隆开明宽厚、风流倜傥夸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本文专写乾隆残酷制造文字狱,以便读者真实地了解这位爱新觉罗·弘历

文字狱腥风血雨之举例

乾隆自称“朕一书生皇帝耳”,这是不错的。他自幼聪明伶俐,6岁就学,在名儒指导下,饱读诗书,深得其祖康熙的欢心。康熙弥留之际,之所以传位给胤祯(雍正),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在胤祯之后传位给爱孙弘历。

乾隆自幼爱好文学,一生写诗四万余首,可称亘古少有。可惜的是,他的文化素养也成为他摧残文化学术的武器,乾隆时期数得上来的文字狱130多起,其捕风捉影之荒唐,株连之广泛,处理之严酷,均超过了其祖和其父。

1、孙嘉淦伪奏稿案。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工部尚书,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奏,因此社会上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他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赏罚不公等)。乾隆大怒,说这

“全属虚捏”,他下令各省督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以为“无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人犯即行免释”,乾隆阅后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书成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被革职服苦役,此后无人敢谏。

在继续追查中,有挟仇诬告,有畏刑妄承,有株连扰累,总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容泰,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斩决,家属照例连坐。办案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职拿问,连两江总督、漕运总督也被牵连问罪。

其实此案疑点很多,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所供,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只是负责此案的官员怕担当“查处不力”的罪名,就仓促判决定案了。

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心惊肉跳,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己名写伪奏稿。乾隆十八年,孙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傲首俱丧,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2、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乾隆十八年,有人将胡所著《坚磨生诗抄》送乾隆处告密,说《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乾隆大怒,认为这是

“悖逆诋讪怨望之词”，日月合写为明字，是胡有意恢复明朝，指斥胡诗：“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诗中还有“穆王车驾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认为是胡讽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据此推理，胡的整部诗抄就成为有系统的反清的书。

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满族人，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因胡曾任广西学政，二人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没有及时举报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发现鄂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批示：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白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鄂尔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贤良祠。乾隆又传谕八旗，应保持满族人骑射尚武传统，不得沾染汉人诗词习俗，玩物丧志，云云。

3、王锡侯《字贯》案。王锡侯，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他心灰意冷，专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证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的功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洸南告发，说他删改《康熙字典》，贬毁圣祖。乾隆一看，该书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讳，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烨、雍正帝名胤禛、乾隆帝名弘历等字样时应如何改写以避讳。王锡侯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规定，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还认为该书没有按更严格的避讳方法（如“弘历”二字

应写成“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厶从日”等），于是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王被斩立决，家属按例受株连。江西巡抚满人海成，当初在接到王洸南控告后，立即上报，拟革除王锡侯的功名。乾隆认为海成判的太轻，“有眼无珠”，被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以前因查缴出禁书8000多册，曾受到乾隆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沦为阶下囚。从此以后各省督抚大员及各级官员，遇到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拟具处理意见时，就宁严勿宽，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加罪。

4、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徐为江苏东台县举人，生于康熙中叶，约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子孙因而获罪。该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与“胡儿”谐音）搁半边”；“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等句都被乾隆认为是“叛逆之词”，说“壶儿”是讽刺满人；“清风”一句是指满人没文化。诗集中还有两句，“明朝期振翅，一举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说是指“明代”，因此这两句便被说成是怀念明朝。最后判决：徐及其子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最冤枉的是其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发成濯”四个字，乾隆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



乾隆狩猎图

草木凋零也”，遂认为此二人的名字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

此前，江苏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树的告发，陶认为蔡是挟嫌倾陷，令其幕友陆琰批文将此案交扬州府查办。案发后，乾隆对如此处理震怒异常，陶被押解出京，被判斩监候，不久瘐死狱中。陆琰完全是办理上级交的公文，但也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曾为徐的诗文作序的、被认为办案不力的俱被杖一百，或革职或流放。

5、石卓槐，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所著《芥圃诗抄》中，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经仇家告发，乾隆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没落之理，更焉用外人维持？”于乾隆四十五年下令将石凌迟处死。

6、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发为以古讽今，判斩立决。

7、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晋朝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渐迁入中原居住的情况，建议把他们迁徙回原处，以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魏塾对此加批注，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弩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斩立决。

8、江西省德兴县祝庭诤为教儿孙识字并学点历史知识，手写成一本《续三字经》，经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该书“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这样几句：“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被乾隆认为是影射清朝，“明系隐寓诋清”，结果已故的祝庭诤被开棺戮尸，其子及16岁以上的孙辈均被斩立决。

9、乾隆四十四年，安徽和州的戴世道被人告发其已故的曾祖父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和已故的祖父戴昆所著《约亭遗诗》中有“悖逆”句，如“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被乾隆认为

怀念明朝，咒骂本朝强迫剃发，“卜太平”一句被认为是“暗指今日不太平，不然何用卜乎”？就这样，戴移孝、戴昆虽死去数十年，仍被开棺戮尸，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斩立决，其子侄多人亦被斩监候。

10、清初浙江仁和县人卓长龄亦因诗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等句。被人告发，乾隆判为逆诗，乾隆四十七年卓及其子虽已死多年，仍被开棺戮尸，其孙卓天柱等被斩立决。

11、乾隆二十一年，江苏大灾，庄稼歉收，米价暴涨，灾民无以为生，而贪官污吏只顾自己享乐，置灾民于不顾。常熟人朱思藻十分气愤，乃将《四书》凑集成文，题为《吊时语》，抨击贪官。乾隆认为这是“侮圣非法，实乃莠民”，朱被杀，凡看过《吊时语》而未告发的也被严惩。

背弃即位之初的诺言

雍正在位13年，制造了查嗣庭等十多起文字冤狱。乾隆可能是为了记取历史教训，在他即位初年，颇表现了某些开明。大学士鄂尔泰曾奏请回避御讳。乾隆说：“避讳虽历代相沿，而实文字末节，无关大义也。”他宣布：“嗣后凡遇朕御名之处，不必讳。”如遇“弘曆”二字，“上一字着少写一点，下一字将中间禾字，书为木字，即有避讳之意矣”。

乾隆还曾说，“（朕）自幼读书宫中，从未与闻外事，耳目未及之处甚多”，要求群臣“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毋欺毋隐”，“即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顾之陋习，而庶政之不能就绪者鲜矣”。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向群臣公布，真是不容易的。

乾隆元年，监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请宽妖言禁诬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时期文字狱的弊病：“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

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时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违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

曹御史冒犯陈言,对清王朝康、雍两代的文字狱造成的祸害条分缕析,切中时弊。也可能受曹御史此奏疏影响,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文字狱较少见,但在乾隆十五年以后,即孙嘉淦伪奏稿以后,他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只不许臣民“据实直陈”他的“错误之处”,而且对臣民的诗文吹毛求疵,断章取义,随意附加“影射讥讽”等罪名,杀人无数。乾隆言行矛盾,于此可见。

一般认为,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文网稍

宽,对下面官员或因邀功或因畏罚而送上来的文字狱案,乾隆有时批示:“朕凡事不为己甚,岂于文字反过于推求?”“毋庸深究”等。也有人侥幸逃过此难的。

但纵观清史,康熙、雍正、乾隆相比,在制造文字狱上,应说以乾隆为最甚。

按《大清律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还有史料说:罪人家的十五岁以下男幼童可免死,但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之前,俱应先予阉割,十分残忍。上述许多以“悖逆”罪判决的文字狱,大都是按此处理。御史汤先甲曾上奏折,建议:凡收藏野史之类的案件,不宜视为大逆而过分诛求,结果被乾隆严加申斥,将原奏折掷还。自后无人敢再

琐议“父母官”

● 马悦

古时将州、县的地方官叫作“父母官”,此称谓世传始于宋代,但“父母官”这个词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汉代。据《汉书》记载,西汉时,召信臣在南阳任太守期间,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且视民如子。因此南阳老百姓尊称召信臣为“召父”(“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汉书·循吏传》)。到了东汉,有个名叫杜诗的,也在南阳出任太守。杜诗对南阳同样施行过不少的“惠政”,亦备受老百姓的拥戴。所以杜诗被南阳的老百姓尊称为“杜母”。召信臣和杜诗都先后职居南阳太守,为民兴利,名昭南阳,广被时人所称道:“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后汉书·杜诗传》)“召父杜母”本是旧时颂扬有“惠政”的地方官的一个美称,但经过长期演变,“父母官”也就用作地方官的专用名词了。

然而,近些年来有的领导干部乐于以“父母官”自居,乐于拿“父母官”取代“公仆”。

首先,“父母官”是封建官吏的称谓,其核心思想是“官本位”。固然,封建时代也出现过“爱民如子”的清官,但更多的是贪官、昏官、混官。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百姓对自己的官只有服从权,没有选择权;更为重要的是“父母官”的心态不利于科学决策、依法行政。“父母官”往往带有“家长作风”,以权力对抗民主,以“土政策”代替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时,“父母官”心态对人民群众有负面影响,它弱化群众的自主行为,不利于群众行使民主监督权利,不利于群众发挥开拓创新精神。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父母官”这一概念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因此,我们要克服“父母官”意识,树立公仆意识,公仆是法治精神的体现,“领导就是服务”;公仆为群众办好事,主要靠民主与法制来规范。

提。

乾隆更一再下令各省督抚大员和各级官吏,搜查禁书。对于有积极表现的,就奖励升官;对于不积极的,就予以申斥治罪。因此各级官员都战战兢兢,到处搜查禁书,翻箱倒柜,弄得各州县乡里骚然。官员们在处理案犯时也就无限上纲,宁枉勿纵,而何谓“悖逆”,何谓“禁书”,又没有个标准,所以奸人就可以乱加解释,挟嫌诬告,或因敲诈不遂而告发。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势必产生一批文化鹰犬,如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报:“为查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臣谆飭各属,不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官府尚且如此,一些无耻文人更

为虎作伥,用各种卑鄙手段获取告密材料,以为自己升官发财进身之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鲁迅也说:“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不敢干涉朝廷,都是些“贾雨(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为了躲过残酷的森严文网。当时的士人绝大多数也终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过日子,更不敢言创新和改革,只能谨守“祖宗之法”,终日揣摩上意,歌功颂德,唯唯诺诺。(责任编辑 舒元璋)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百年聚焦(上中下)	史义军	59.80	6.00
陆定一传	陈清泉 宋广渭	29.80	4.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			
分析与反思(上下册)	张 化 苏采青	59.80	5.00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纪希晨	49.00	4.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张湛彬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15.00	3.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	29.80	4.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斯大林秘闻——			
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	爱德华·拉津斯基	39.00	4.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16.00	3.00
野百合丛书(共六册)(邮购全套六册邮寄费减半)			
之一 王实味——野百合花	黄昌勇	14.60	3.00
之二 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	晓风 梅志	18.80	3.00
之三 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	叶永烈	15.00	3.00
之四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	罗银胜	16.60	3.00
之五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谢 泳	14.80	3.00
之六 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	谢泳	16.60	3.00
知情者说第二辑(共八册)(邮购全套八册邮寄费减半)			
之一	肖思科	15.70	3.00
之二	张树德	13.90	3.00
之三	魏敬民 徐 林	15.10	3.00
之四	程 瑾 朱 仁	14.50	3.00
之五	万 须 木 心	13.90	3.00
之六	山 椿	15.10	3.00
之七	庄 园 郑宏颖	14.50	3.00
之八	范广群 霍 岩	13.90	3.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本书将告诉您: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请求的原因;邓小平坦言他也犯过错误;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的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赵树理与陈伯达相近的感受。

《史无前例的年代》作者是人民日报的老记者,“文革”中目击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采访了包括叶剑英、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华国锋在内的许多当事人,并参加了审判“两案”的采访。他撰写的这个纪实作品,从1965年起围绕历史事件依次展开,记录了大量真实情节,是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回首文革》上下两册各自汇集了三十六七篇文章,上册侧重总体分析,下册偏于事件介绍。作者阵容整齐,皆为高层当事人和权威级研究者。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 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

邮 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庆祝《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庆祝会会场全景。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黄孝道教授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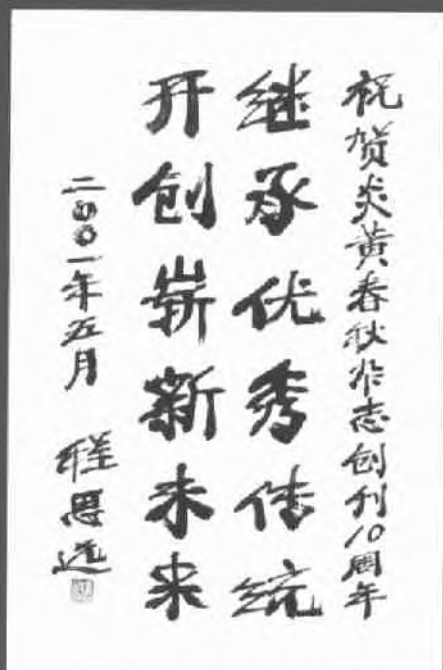
《炎黄春秋》顾问杜润生讲话。



社长杜导正作汇报讲话。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
石峰讲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
题词：继承优秀传统，开创新未来。

封二、封三照片均为彭璋庆摄
篆刻作者为王军生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在西路军
目击中国远征军救援英国盟军
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
迥异的家庭 奇特的爱情 悲惨的结局
清末刚烈名臣李秉衡
献“常林钻石”姑娘的曲折人生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